

专刊

五四运动回忆录

WUSIYUNDONG HUIYILU

本书收录了『五四』运[illegible]质者吴玉章、邓颖超、许德珩等[illegible]的回忆录，共41篇。文章按照[illegible]运动的酝酿爆发、运动在全国各地[illegible]先进知识分子在五四时期的作用[illegible]编排，具体生动地反映了伟大的[illegible]爱国运动的历史过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译室 主编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封面题字：郭沫若
责任编辑：兰涛
封面设计：智兴设计室 · 段维东



专刊

《近代史资料专刊》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持编辑的专题性近代史资料的总称。

《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以整理发表近代历史最新资料为职志，自1954年以来，先后编辑出版了《近代史资料》期刊120余期、《近代史资料专刊》二十余部及《北洋军阀》等多部大型史料集。《近代史资料专刊》选题精道，内容充实丰富。这些史料的整理出版，为推动相关领域的研究发挥过重要作用，已成为该领域研究必不可少的基础史料。

上架建议：历史类





ISBN 978－7－5130－1810－4/K · 170

(4658) 定价：39.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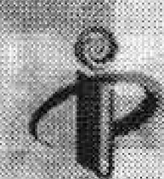
专刊

五四运动回忆录

WUSIYUNDONG HUIYILU

本书收录了『五四』运动[illegible]吴玉章、邓颖超、许德珩等人[illegible]忆录，共41篇。文章按照『五[illegible]的酝酿爆发、运动在全国各地的[illegible]进知识分子在五四时期的作用等[illegible]具体生动地反映了伟大的『五[illegible]运动的历史过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译室 主编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内容提要

本书收录了五四运动的亲历者吴玉章、邓颖超、许德珩等人撰写的回忆录，共41篇。文章按照五四运动的酝酿爆发、运动在全国各地的发展、先进知识分子在五四时期的作用等顺序编排，具体生动地反映了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的历史过程。

责任编辑：兰 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五四运动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1

（近代史资料专刊）

ISBN 978-7-5130-1810-4

Ⅰ.①五… Ⅱ.①中… Ⅲ.①五四运动—史料 Ⅳ.①K261.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05436号



近代史资料专刊

五四运动回忆录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译室　主编

出版发行：知识产权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1号　　邮　　编：100088

网　　址：http://www.ipph.cn　　邮　　箱：bjb@cnipr.com

发行电话：010-82000860转8101/8102　　传　　真：010-82000860转8240

责编电话：010-82000860转8325　　责编邮箱：lantao@cnipr.com

印　　刷：知识产权出版社电子制印中心　　经　　销：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3

版　　次：2013年1月第1版　　印　　次：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字　　数：193千字　　定　　价：39.00元

ISBN 978-7-5130-1810-4/K·170(4658)

再版前言

《近代史资料专刊》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持编辑的专题性近代史资料的总称。《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以整理发表近代历史最新资料为职志，也是国内从事近代史料整理编辑工作最早的机构。自 1954 年组建以来，经过几代学者不间断地努力，先后编辑出版了 120 余期的《近代史资料》刊物、数十部《近代史资料专刊》及《北洋军阀》等大型专题史料集，为新中国近代史学的建立和发展、为新中国史学工作者的成长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在海内外均具有较大影响。

《近代史资料》编译室最初叫《近代史资料》编辑组。近代史研究所成立初期，为推动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在所长范文澜先生主持下，于 1954 年成立了以荣孟源先生为主编的《近代史资料》编辑组，负责近代史料的搜集整理，编辑出版《近代史资料》期刊。郭沫若院长亲自为《近代史资料》题写了刊名。除“文革”时期曾一度被迫停刊外，数十年来《近代史资料》编译室坚持为近代史学术研究与教学服务为宗旨的办刊理念，陆续整理刊出 1840 ~ 1949 年间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的档案文献史料，受到广大读者的肯定和欢迎。因《近代史资料》期刊每期的容纳量仅有 20 万字左右，针对篇幅较大、期刊无法容纳的专题性史料，从 1957 年开始又创办《近代史资料专刊》，专门发表专题史料，不定期出版。以《近代史资料专刊》名义出版这些专题史料，不仅选题精道，而且篇

幅容量较大，内容充实丰富。某个专题的新史料一次性大量公布出版，往往会对于相关领域或专题的研究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如《太平天国史料》、《山东义和团案卷》、《辛亥革命先著记》以及《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等。可以说，这些《近代史资料专刊》的整理出版，都曾为推动相关领域的研究发挥过重要作用，许多都已成为该领域研究必不可少的基础史料。

因为种种原因，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近代史资料专刊》的编辑出版一度中断。但是实际上编译室的同仁并未曾停止专题性史料的整理工作，也陆续整理出版了《梦蕉亭杂记》、《民国人物碑传集》和《翁文灝日记》等，只是未加以专刊之名。近年来，在所领导的支持和学界朋友的鼓励下，我们在坚持编辑《近代史资料》期刊的同时，尝试着恢复了这项传统工作，先后又以《近代史资料专刊》的名义出版了《抗战时期西北开发档案史料选编》和《倪嗣冲函电集》。然而，对于那些由于出版年代较久，如今已流传较少的专刊史料，精选其中部分重新再版，于学术研究及文化保存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此次重新整理再版的《近代史资料专刊》，最早出版的一本是1957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辛亥革命先著记》，距今已超过半个世纪，最晚的是1984年由齐鲁书社出版的《太平军北伐资料选编》，距今也近三十年了。因为出版时间较久，特别是早期的版本现在存世很少，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对历史文化的重视、中国近代史研究者的更新换代，以及研究思想与方法的变化等因素的影响，许多旧的历史结论已经成为陈迹，在审读史料中重构历史，解读其中未曾被重视的历史信息，已经越来越为新的研究者们重视。因此重新整理发表这些珍贵史料，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此次再版《近代史资料专刊》，不是简单的旧籍重印，而是将过去50余年中陆续刊出的史料予以重新整理，并按照近代历史发展时序重新编排。各卷目次、初版时间及出版社名称如下：

《鸦片战争时期思想史资料选辑》，中华书局1963年版。

《太平天国资料》，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

《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太平军北伐资料选编》，齐鲁书社1984年版。

《山东义和团案卷》（上、下），齐鲁书社1980年版。

《义和团史料》（上、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筹笔偶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庚子记事》，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中华书局1978年再版。

《杨儒庚辛存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

《辛亥革命先著记》，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

《鄂州血史》，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

《云南杂志选辑》，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

《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

《辛亥革命资料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华侨与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徐树铮电稿》，中华书局1963年版。

《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版。

《秘笈录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五四爱国运动》（上、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五四运动回忆录》，中华书局1959年版。

《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辑》，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

以上凡22种25册，约1000余万字。

再版整理工作采取极为审慎的态度，并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1. 初版之时的序、前言或编者说明之类的文字原则上不再重印，由再版整理者重新撰写编辑说明，对初版整理工作给予必要的介绍和说明。

2. 对于原稿或初版时因印刷等原因存在的明显讹误之处，再版整理者径加改正；对于校勘修订之处，均于舛误文字后加正文，并以〔 〕号标明；脱字或无法辨识者，标以□号；漏字增补者，以【 】号标明；疑问处加（?）标明；原稿文中加注之处，原为双行排印者，均改为单行排印，或加（）标明，或用小字排印；原始资料行文或署名中并列双排者也均改为单行，个别文件除外；疑有脱字或衍文者，于页下脚注标出。

3. 个别史料中，同一人名、地名前后用字不统一的现象，记录史实前后矛盾或表述不一致的现象，均保留原样未予擅改；清朝或北洋

政府文献中对革命党、起义民众等污蔑诋毁之词，也都一律保留原样，以存历史之真，均请读者使用中注意。

此次能将几十年间陆续出版的《近代史资料专刊》重新整理出版，要特别感谢知识产权出版社这种嘉惠学林的眼光与勇气。兰涛编辑不辞辛劳，往来联络指导，以及各位编辑的认真工作，都应该得到学界和社会的掌声。

参加此次再版整理编辑工作的有，《近代史资料》编译室的刘萍、卞修跃、孙彩霞和李学通。由于整理者水平有限，其中如有不当之处，尚请读者批评指正。

李学通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译室　主任
2012 年 9 月

编辑说明

《五四运动回忆录》是为纪念五四运动40周年，由本室（当时署名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第三所）编辑，中华书局1959年4月出版的。

本书收录了五四运动的亲历者吴玉章、邓颖超、许德珩等人所撰写的回忆录，共41篇。这其中有23篇是此前曾经在报刊上发表过的，也有18篇是首次发表的特约稿和采访口述记录。这些回忆录，按照五四运动的酝酿爆发、运动在全国各地的发展、先进知识分子在五四时期的作用等顺序编排。稿件都是五四运动的亲历者所讲所写，因而不仅具体生动地反映了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的历史过程，而且对于人们了解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和进行科学的历史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帮助和史料价值。

稿件发表之时，初版编者对曾经发表过的回忆录中属于纪念性的文字，以及采访口述记录中与五四运动关系较少的内容，做了部分删节；也有一些稿件还重新拟换了标题；大部分稿件都是经作者本人修改审定过的，编者虽也有文字的润饰，但也力求符合作者的原意。由于时间较久、记忆不确等原因，有些稿件在具体事件的情节、时间的

叙述上，与史实或有出入，还望读者使用中注意。此次再版，基本是原文照录，未加删改。由于编者水平有限，编辑中的不当之处难免，还望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2012 年 12 月

目 录

回忆五四前后我的思想转变

吴玉章

一、流亡法国，接触社会主义思潮

从 1911 年辛亥革命起，到 1919 年五四运动止，这是一段艰难困苦的斗争岁月。当时，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所篡夺，革命党的组织陷于土崩瓦解，中国天空上满布着黑暗的阴云。在辛亥革命以前，我们曾经抱着一个美丽的幻想，以为革命后的中国一定是一个民主、独立、统一、富强的国家。但是现实嘲弄了我们，中国人民所碰到的不是民主，而是袁世凯的专制独裁；不是独立，而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欺凌、蚕食和鲸吞；不是统一、富强，而是军阀们的争权夺利、鱼肉人民。

1913 年 7 月，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下，南京、上海、江西、安徽、广东、四川等地的国民党军队发动了反袁起义。我们深悔从前未能坚持建立革命政权，而把政权轻易地让给袁世凯，现在不得不在力量悬殊的情形下起来作斗争。我们还想凭着勇气和热情来挽救流产了的辛亥革命。但是起义各军准备不足，心志不齐，又未及时号召民众起来反对袁氏违法乱纪，只把注意力集中在军事行动上，结果，在袁世凯的强大军事压力下，起义好像昙花一现而失败。仅存在南方几省内的一点革命军事力量也被摧折殆尽。

起义失败后我还留在上海。我并不认为革命从此就完了，我相信

袁世凯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所以想隐蔽在上海，继续为革命做一点工作。但是袁世凯并没有放过我，指名说我是四川重庆熊克武反袁起义的策动人，对我下了通缉令。我在上海站不住脚，于1913年11月亡命法国。

我在法国巴黎居住了两年多，思想上非常苦闷。“中华民国”成立了只有一年多，中国的政治局面就弄得那样糟糕，革命爱国之士或死或逃，我也被军阀撵到了外国，革命失败得真是再惨痛不过了。我时时刻刻惦念着中国的情形，希望革命火焰会再一次迅速地燃烧起来，把丑恶的军阀统治烧个干干净净。1914年春季我没有入学，痴心指望着很快地能再有一个回国参加斗争的时机。但是过了半年，国内没有一点革命发动的迹象，而且袁世凯还修改了民元约法，解散了国民党以及国会，担任了终身大总统，许多北洋派爪牙也纷纷爬上了各省都督的位置。看起来袁世凯气焰嚣张，不可一世，我的归国希望暂时也不能实现，于是决心先埋头读书。辛亥革命以前，1903年我初到日本时，决心要学一门科学，选的是电气工程，由日本成城中学毕业，考入第六高等学校，边学习边作革命工作，1911年毕业，未入大学即回国参加辛亥革命。我原来学的是工程技术，但由于国事日非，只得经常从事革命活动，深深感到“所学非所用”，于是进了巴黎法科大学，改学政治经济学。

亡命巴黎的两年多，看到了不少事情，接触了不少人物，长了不少见识。这时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交战的两个帝国主义集团，彼此疯狂地屠杀，整个欧洲沉浸在血泊中，好像一个大屠宰场。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已暴露无遗。同时，社会主义思潮风起云涌，各色各样的社会主义思想流派，盛行一时。1903年我在日本东京曾经读过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感到这种学说很新鲜，不过那时候一面在学校紧张地学习，一面着重做革命的实际活动，对这种学说也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就放过去了。这时，又从新看到这种学说，感到格外亲切。社会主义书籍中所描绘的人人平等、消灭贫富的远大理想大大地鼓舞了我，使我联想起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三民主义和中国古代世界大同的学说。所有这些东西，在我脑子里交织成一幅未来社会的美丽远景。这个远景虽然是美丽的，但是如何能够实现

它？我们当前应该做些什么？我仍旧是茫然的。我曾经和无政府主义者李石曾谈起这些问题，李石曾认为："我们只要搞教育，宣传互助、合作，传播这种美丽的理想，努力去感化别人就好了。至于总统、皇帝及其他官职和议员，让人家去当没有关系。"我不同意他的意见，我说："教育、宣传工作固然要做，但是组织工作也要做，没有强有力的组织，团结和培养人才，是干不了革命的，你不去侵犯皇帝、总统，人家就要侵犯你。"李石曾的思想是典型的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主张，我从以往的革命实践中感到这种不要组织革命团体的主张根本是行不通的。仅仅有一个美丽的理想，而没有一套实现理想的革命方案和革命策略，那又有什么用呢？因此，我在法国虽然接触了一些社会主义的流派，但是它们并没有给我指明一条拯救中国的光明大道。

二、军阀腐朽统治的一个实例

1914 年以后，中国的政局发生了变化。日本帝国主义趁着欧洲大战的机会出兵山东，并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件。袁世凯为了换取日本对他称帝的支持而接受了这些条件，秘密地签了字。1915 年底袁世凯假弄公民投票，强奸民意，而公然称帝。结果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在他逐步地往上爬的时候，反对他的各种社会力量也在逐步地集合起来。1915 年 12 月 25 日云南护国军首先起义，各地纷纷响应，袁世凯的皇冠不久就滚落在尘埃里。1916 年 6 月 6 日，这个窃国大盗在全国人民的反对声中活活地气死了。

袁世凯统治垮台，对我的通缉令自然失效。随后，南北和议达成，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我就和蔡元培一起从法国回国，1917 年 2 月我到达北京。我到北京有一个任务，因为欧洲大战开始以后，法国人力不足，需要大招华工，袁世凯政府和法国订立了一个关于招募华工的条约，内容对中国工人非常不利，经手人梁士诒从中捞了很多钱，根本不顾工人的利益。这时侯我们已在法国组织了华法教育会，主持人有蔡元培和我，目的是要在到法国去的大批华工中进行教育，并希望国内贫苦学生能出来留学，还组织了勤工俭学会。由于

袁世凯政府与法国所订的条约对工人很不利，我们出来力争，费了很大周折，与法国改订条约。规定中国工人和法国工人同工同酬，总算为工人们争回了一些权利。我就携带这个条约草案回国，要求北京政府批准。

回到北京一看，中国的政治局势还像从前一样。袁世凯虽然死了，但是北洋军阀继承着袁氏的衣钵，并分化成大大小小的派系，展开了争权夺利的斗争。政府中贪污腐败风气，依然如故。华工新约送到外交部，足足等了4个月还没有批准的信息。

有一天，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来访问我，他问我："听说你带回一个招募华工赴法的条约，批准了没有?"我说："还没有批准。"接着我详细地给他解释了这个条约比前一个条约要好的多。他说："你没有在北京住过吗？你是学生吗？真是迂夫子！这里的事，非钱不行。如果有钱，再坏的条约也能批准。如果没有钱，再好的条约也批不准。你这种事至少可以赚几百万，你就是拿一二百万出来也不算什么?"我说："我们就是为了反对赚工人的血汗钱，才辛辛苦苦争回了一些权利。我们没有钱，不但不愿拿钱去运动，就是人家拿钱来运动我也不行!"说着说着两个人就大吵起来。他临走时说"你执拗得很，让你看看吧!"事后才知道，这个人是北京政府外交部的一位科长派来的。在军阀官僚统治下，什么好事也办不成，不铲除军阀统治和官僚制度，中国决无得救的希望。这是对我的一次严重教训，我立志要和恶势力斗一斗。当时我没有任何其他办法，还幻想通过个人关系去说服外交部长伍廷芳。我想：伍廷芳是一个同盟会员，总不会和贪污官僚一样。他身为外交部长，是会有批准条约的权力的。那里知道：官僚机构，重重叠叠，相互牵制，伍廷芳虽然答应批准条约，可是外交部内上上下下的官僚们都想捞一点油水，仍旧拖延不动，事情就这样拖下去，没有得到结果。

我这时一面在交涉条约的事情，一面又进行第二个任务，就是办留法勤工俭学，设立了一个留法预备学校，同时又给四川同事去信请他们也成立留法勤工俭学分会。1918年留法勤工俭学的消息传到了湖南以后，四川、湖南等地掀起了留法勤工俭学的高潮。我们希望在这个动乱的环境中能够培养出一些人才。但是这时我目睹国内的混乱和

腐败，眼前一片黑暗，不知出路何在？

不久又证明，在军阀统治下，连教育工作也不会让你安定地做下去。这时北洋军阀正在进行争权夺利的斗争，总统黎元洪和国会议员站在一边，背后有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国务总理段祺瑞和大多数省份的督军站在另一边，背后有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他们之间围绕着对德宣战问题，展开了勾心斗角。段祺瑞嗾使督军团包围国会，胁迫黎元洪一定要通过对德参战案，以便借此机会，大借外债，扩充实力；黎元洪为了对抗段祺瑞，勾引顽固派张勋进京。其实张勋和段祺瑞暗中也有勾搭。1917 年 6 月张勋进了北京，就搞了一出“宣统复辟”的丑剧。当时，北京城内，兵荒马乱，到处抢掠捉人，凡是与辛亥革命稍有点关系的人都纷纷避难出京，我也只得暂时放下教育工作，避往天津。随后段祺瑞又玩弄手段，以“恢复共和”为名，赶走张勋，独揽政权。这时辛亥革命所遗留下来的“民元约法”被军阀完全撕毁了。南方为了护法，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下，成立了军政府，于是出现了南北两个政府对立的局面。

三、“南与北一丘之貉”

1917 年 7 月，伍廷芳和海军部长程璧光率领海军南下，孙中山先生也到了广州，主张“护法”，在广州组织军政府，非常国会选孙中山为大元帅，联合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湖南等省，对抗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1917 年年底熊克武驱逐了刘存厚，统一了四川，要我代表四川省参加军政府，我于 1918 年 2 月到广州见了中山先生，随即又回北京把所负华法教育会的工作进行了交待，6 月才去广州任职。原来军政府初成立，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桂系和滇系军阀的力量，我们当时以为滇桂军阀与北洋军阀有矛盾，可以利用他们来为革命服务，而且他们实力较小，不像北洋军阀那样跋扈难制，有可能团结他们，使他们服从中山先生的领导。不久就证明：这种想法是十分错误的。军政府成立后，野心勃勃的桂系军阀陆荣廷、莫荣新暗中一直在和北洋军阀勾结，并且跟我们大闹幕后摩擦。军政府成立不到一年，中山先生终于被排挤，1918 年 5 月由广州回到上海。他在辞

职通电中痛斥桂系军阀说："南与北一丘之貉。"中山先生这时真是伤心忿恨到极点了。

当1918年6月我再到广州的时候，孙中山先生已经到上海去了。7月间军政府改为七总裁制，中山先生也被列为七总裁之一。我当时曾到上海劝中山先生就职，他未同意，我又劝他可派代表去应付。他答应了。我们当时仍想团结各方面的力量来抵制桂系，以图补救大局于万一。我们所能团结的力量有南下的国会议员和海军，有各省军的代表，有中山先生的嫡系部队——陈炯明所统率的粤军，还有广东的一些地方派军人。桂系特别把陈炯明部视作眼中钉，千方百计想消灭它，陈炯明部被迫退驻在福建的漳州，不能回粤，情形很危险。这时军政府内部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我们揭露桂系和北洋军阀勾结的事实，反对桂系排挤粤军，极力保全陈炯明部。在会议上，我常常和站在桂系方面的政学系政客争吵起来。桂系军阀恨我入骨，要求四川省撤换我的代表职务，到了1919年他们策划成南北和议时，我就不再当代表了。

参加护法，使我十分深刻地体会到中山先生所说"南与北一丘之貉"的名言。而且就是我们当时苦心孤诣所要保全的陈炯明又何尝不是与南北军阀同属"一丘之貉"呢？不久以后，陈炯明利用国民党和中山先生的威信，驱逐桂系，重返广州，并且随后又背叛了中山先生。这个叛徒要知道当时中山先生如何苦心扶植他，我们又如何竭力保护他，他真应该惭愧而死。在当时军队是私人的财产和工具，军队的活动完全听命于他们的统帅，不知道有国家民族。我们也没有可能去根本改造旧军队，使它成为革命的工具，而只是看到个人的作用，力图争取有实力的统帅。从辛亥革命起，我们为了推翻清朝而迁就袁世凯，后来为了反对北洋军阀而利用西南军阀，再后来为了抵制西南军阀而培植陈炯明，最后陈炯明又叛变了。这样看来，从前的一套革命老办法非改变不可，我们要从头做起。但是我们应该依靠什么力量呢？究竟怎样才能挽救国家的危亡？这是藏在我们心中的迫切问题，这些问题时刻搅扰着我，使我十分烦闷和苦恼。

四、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带来了光明和希望

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给我们带来了光明和希望。十月革命刚发生的时候，1918 年我在广州，由于帝国主义和北洋政府封锁消息，我们还不知道俄国已发生了一个开辟人类历史新纪元的伟大革命。但是消息是不可能长期被封锁住的，后来我就读到了约翰·里德写的《震动寰球的十日》，这本书对十月革命的过程描写得很生动。通过这本书，我了解到我们北方邻国已经建立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一个劳农政府，伟大的俄国人民已经摆脱了剥削制度，获得了真正的自由解放。从前我在法国接触了社会主义各种思想流派，深深为社会主义理想所吸引。今天这个理想居然在一个大国内开始实现了，心中感到无限兴奋和鼓舞。1919 年，我资助几个学生到苏联去学习，希望他们能为中国带来新的革命理想和革命方法。但是后来联系中断了。直到 1920 年，我一度去北京，碰到了王维舟同志。他本来在四川军队中工作，由于四川军内部要打仗，他不愿意参与，便交出了所率领的军队，到苏联去工作和学习了一年。1920 年 8 月间，他回到北京，对我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苏联的状况，使我对这个新起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和更深厚的感情。当时苏联正处在国内革命战争的困难时期，物资非常缺乏。王维舟同志和我就在北京东安市场召集许多青年学生，开了一个俄灾救援会，向各方募捐，一下子就捐募到几万元钱，买了许多面粉和日用品寄往莫斯科。后来王维舟同志又到上海募了几万元。那时候中国人民对十月革命非常同情，人人都希望能出一分力量来支持苏联，所以我们的募捐能够有这样大的成绩。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1919 年发生了划时代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前夕，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巴黎和会召开的时候，中国以“战胜国”的资格参加和会。大家希望可以通过巴黎和会，收回日本在山东所占夺的权利。美国总统威尔逊也发表了花言巧语的“十四条”，其中也有主张民族自决的词句，伪装同情殖民地人民的悲惨遭遇。当时中国人民对巴黎和会大多抱着幻想。可是和会上帝国主义的

弱肉强食、毫无公理和阴谋欺诈等等再一次地从反面教育了中国人民。日本帝国主义蛮横地坚持要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和我卖国贼订定的一切条件，伪善的美帝国主义不仅帮着日本说话，反怪中国何以在山东问题上有“欣然同意”的签字，以逃避他的责任。结果，和会决议：德国在山东权利一概让与日本。中国以“战胜国”的资格却得到“战败国”的待遇。

山东问题交涉失败的消息传来，全国愤激。1919 年 5 月 4 日，北京首先发生了爱国示威运动，惩罚了卖国贼，各地纷起响应。雄伟的工人和学生的队伍走上了街头，全国范围内激扬起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浪潮。这是真正激动人心的一页，这是真正伟大的历史转折点。从前我们搞革命虽然也看到过一些群众运动的场面，但是从来没有见到过这种席卷全国的雄壮浩大的声势。在群众运动的冲击震荡下，整个中国从沉睡中复苏了，开始散发出青春的活力，一切反动腐朽的恶势力，都显得那样猥琐渺小，摇摇欲坠。以往搞革命的人，眼睛总是看着上层的军官、政客、议员，以为这些人掌握着权力，千方百计运动这些人来赞助革命。如今在五四群众运动的对比下，上层的社会力量显得何等的微不足道。在人民群众中所蕴藏的力量一旦得到解放，那才真正是惊天动地、无坚不摧的。特别是一向被人轻视的工人群众也发出了怒吼，像上海那样的大都市，6 月 5 日开始一声罢工、罢市令下，整个城市的繁华绮丽顿时变成一片死寂，逼得北洋军阀政府不得不于九日免去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官职。工人阶级的奋起，这是一支真正能制一切反动派于死命的伟大生力军。这时中国工人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革命的性质完全不同了。

处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伟大时代，我的思想上不能不发生一种非常激烈的变化。当时我的感觉是：革命有希望，中国不会亡，要改变过去革命的办法。虽然，这时侯我对中国革命还不可能立即得出一个系统的完整的新见解，但是通过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教育，必须依靠下层人民，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这种思想在我头脑中日益强烈、日益明确了。

五、新道路的起脚点

1919年，我被西南军阀排挤，退出军政府，十月底回到四川。就在这一年，我读了一本日文叫“过激派”（日本对布尔什维克的恶意的称呼）的书。

人读一本新书，通常总是根据自己过去的思想意识和生活经验来吸收新书中的内容，作出判断和选择。所以同样一本书对于不同环境中不同的个人，往往会发生不同的影响。当时中国革命已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革命实践的发展使我日益明确地感觉到旧民主主义道路走不通。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发生给我启示了一个新的方向和新的途径。我渴望了解苏联革命的经验，“过激派”这本书，恰恰满足了我的需要，我反复地阅读它，结合着自己过去的经历，深深地思索，把以往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作了一次详细的批判和总结。我体会最深刻的有以下四点：

第一、工人和农民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他们用辛勤的劳动哺育了整个社会。但是他们自己却“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世世代代过着贫困的生活。而地主、资本家，游手好闲、不事劳动者，却过着奢侈的生活。如何能使这些人绝迹？布尔什维克主张“不做工，不得食”。我非常拥护这个主张。的确，对于这些社会上的寄生虫，一定要强迫他们去劳动，让他们“自食其力”，社会才能够安定和繁荣。

第二、布尔什维克认为：工人阶级是最革命的阶级，工人阶级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够得到解放。这个道理在从前我是不可能理解得深刻的。从前虽然对下层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寄予极大的同情，搞革命就是为了要解救民众的苦难，但是总以为革命只能依靠少数知识分子职业革命家，没有看到广大人民中所蕴藏的伟大革命潜力。经过十月革命，世界上出现了第一个工人阶级的政权；经过五四运动，中国工人阶级发挥了冲击旧制度的伟大力量。在国际和国内的新形势下，读了这本书，深深感到工人阶级力量的伟大。辛亥革命只在知识分子和军人中进行活动，恰恰是没有把下层民众动员、组织起来。所以革命显得软弱无力，反动派一旦反攻，就陷于土崩瓦解。今后一定

要改变办法，革命新办法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依靠工人阶级，依靠下层民众。

第三、我从前读无政府主义的著作，觉得他们不要组织的做法是不可能成功的。1915 年听到孙中山先生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党员要有绝对服从的义务，不能自由行动，组织手续很严格，入党时还要按手指印。我觉得他的办法比无政府主义强的多，但是党员入党时要打手指印的做法又太落后，有点旧式会党的气味。究竟怎样才好呢?我始终抱着疑问。布尔什维克主张由工人阶级中的先进分子组成一个坚强的、有纪律的、有战斗力的共产党，作为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的革命队伍。这个主张使我多年以来所未能解决的疑团，涣然冰释。

第四、辛亥革命时，我们对掌握政权和改造国家机器太不注意了，当时为了迁就袁世凯而让出了政权。有些人（如宋教仁）还幻想用议会斗争的方式来控制住旧的国家机器，结果反动派就能够利用现成的政权和旧国家机器向我们进攻。布尔什维克认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工人阶级在革命中必须粉碎旧的国家机器，代之以新的国家机器，才能够巩固革命的胜利。这正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像中国这样一个几千年相传下来的以官僚制度为核心的旧国家机器，是许多罪恶的根源，其势力根深蒂固，即使经历许多次的革命风暴，但在官僚国家的荫庇下，万恶势力仍会死灰复燃。以往我也常想这个问题，模模糊糊地想不出一个道理。布尔什维克关于政权和国家的理论，解决了我的问题。

我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主要就是在这些问题上有了一点新的体会。这些体会当然是很笼统肤浅的，但却形成了我的新道路的起脚点。说起来真是可怜，我那时渴望能够看到一本马克思或者列宁的著作，但是我东奔西跑，忙于应付事变，完整的马列主义的书又不易得到。所以只好从一些报刊杂志上零星地看一点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介绍。那时候，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还是不多的，阶级观点也不明确，还不能用科学的方法来分析社会各阶级。我当时只是认为：重要的是要把这些知识贯彻到行动中去，身体力行，为革命做一点贡献。

六、利用“自治”讲台做宣传工作

1920年南方各省掀起的“自治运动”的潮流，给我提供了初步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机会。“自治运动”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当时的政治局势是十分混乱的，在全国范围内，是北洋政府和广州政府南北对峙的局面；在北洋政府内部有皖系、直系、奉系的对立；在广州政府内部有革命派和滇系、桂系军阀的对立，甚至一省之内也有许多小军阀割据称雄。当时北洋派大军阀以“武力统一”为名，攻打南方各省，发生连年混战的局面，社会秩序十分混乱，人民生活极为痛苦。特别是湖南省受战祸最惨。段祺瑞的爪牙张敬尧作了督军，横行霸道，连小学都封了。因此，湖南群众起来组织了驱张运动，逐走了这个蟊贼，出现了要求“自治”的潮流。所谓“自治”，就是由本省人制定省宪，选举省长，管理本省事务。这种主张当然不是挽救中国危亡的根本办法，因为当时人民群众没有发动起来，本省人治理本省，其结果仍不外是本省的上层分子压迫本省的下层人民，但在北洋军阀“武力统一”的叫嚣声中，它却不失为是抵制北洋军阀的一个有效武器。由于当时人民群众对北洋军阀最为痛恨，因此这个反对北洋大军阀的“自治”口号，受到人民群众一定程度的支持。当时各省参加运动的人很复杂，有马克思主义者，有急进的民主主义者，有资产阶级，但也有为保全并扩充自己地盘的地方军阀和政客。

我回到四川以后不久，“自治”潮流就卷进了四川。当时四川情形也十分混乱，1920年2月，属于国民党的四川省长杨庶堪及谢持等为了争夺权力，联合了滇军、黔军，攻打同属于国民党的督军熊克武，熊败退至保宁。下半年熊克武又联合旧川军刘湘、杨森等部进行反攻，驱逐杨庶堪等。胜利后熊发表了解除四川督军职务的通电，经协商后分为三军，以但懋辛、刘湘、刘成勋为一、二、三军军长，协同维持川局，使局面暂时安定下来。刘湘及其所属的杨森各抱野心，随时企图夺得全省政权，主要是反对熊克武，四川全省弄得各军面从心违，四分五裂，动荡不安。北洋军阀的军队这时驻扎在陕南、鄂西，注视着四川的形势，随时准备大举入川。在这种具体形势下，

"自治"就变成了人民要求自己作主来统一全省以反对北军入川的政治运动。

我对于四川"自治"的态度是：不同意把"自治"当作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但是在当时具体形势下，应该抱赞助态度，并积极参加这个运动。因为：

第一、"自治"可以抵制北洋军阀，也有利于制止本省的混战，创造一个比较安定的环境。第二、"自治运动"提供了向人民进行宣传教育的机会，不应该拒绝这个机会，应该利用它把群众的觉悟引向更高的水平。第三、假使革命派不参加这个运动，那末，地方军阀就会去控制这个运动，使运动成为他们达到私利的工具。因此在运动中对于地方军阀一定要进行揭露和斗争。

1920年底，我们开始了组织活动，1921年4月1日成立了"全川自治联合会"，一百多个县每县都有一、二个代表来参加，我们通过这个组织系统，了解了四川各县的许多情况。我也借着这样一个公开的讲台，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经常写文章，做讲演。"全川自治联合会"的宣言和十二条纲领就是由我起草的。其中以"建设平民政治、改造社会经济"为总目标。强调民主政治以反对军阀专制；提出"不作工、不得食"以反对社会寄生虫；提出"民众武装"以反对军阀武装；提出"合作互助"以改善工农生活。十二条纲领是："全民政治"、"男女平权"、"编练民军"、"保障人权"、"普及教育"、"公平负担"、"发展实业"、"组织协社（即合作社）"、"强迫劳动"、"制定保工法律"、"设立劳动机关"、"组织职业团体"等，每一条纲领都详加解释，许多观点开始摆脱了旧的束缚，初步反映了马克思、列宁的一些主张。这个宣言和纲领曾经登载在当时创刊的《新蜀报》上，各县进步青年看了，十分欢迎。我从前许多老朋友看了，也感到我的见解变得更新奇了。

我通过这个自治机构，初步传播了一些进步思想。大会开幕时，全省人心振奋，可容千余人的重庆商会大礼堂，座无虚席，门窗外还有许多人伫立而听，许多人都说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盛会。可是会开不过十多天，刘湘、杨森就企图收买自治联合会，以作为他们的御用民意机关，自治联合会中的成员本来就很复杂，有些卑鄙的人已经

被他们收买。我觉察到这种情况后，就把大家发言拥护自治、起草省宪的意见作成决议通过，并宣布“我们联合会的宗旨是促成省宪，不能代替民选的省议会，我们大家已决议实行自治，起草省宪，任务已经完成，至于起草省宪的权力应该交给省议会”。这个意见得到多数人的赞同，于是就把起草省宪之权移交给省议会，而把自治联合会解散了。我当时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省议会还在国民党多数的控制下，还不至被反动军阀随意操纵。军阀刘湘、杨森费了很多心机，用了许多钱收买代表，结果仍旧是人财两空。他们因此恨我入骨，下令通缉我。

四川“自治运动”本身，并无成效可言，但这个运动却使我有了一个面对广大人民讲话的机会，使我把新近体会到的一些想法得以倾吐于广大人民之前，而且得到了热烈的反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收获。而且通过“自治”的失败，使我又有了两个教训，第一是进一步体会到在军阀统治下毫无民主可言，要拯救中国，必须首先用武装的革命来推翻封建军阀统治。第二是自治联合会那种地域性的临时的组织极容易为敌人破坏，必须要有一个坚强的革命的战斗的组织，来领导革命。这时候我心里非常强烈地要求组织像布尔什维克那样的政党。其实恰恰在这个时候，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正在上海秘密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不过我远在被封锁的四川，并不知道。

全川自治联合会解散后，我就到成都把制省宪任务交给省议会，然后又到南充、绥定等地讲演，1922 年初我又到了成都。

七、整顿成都高师，组织工人农民

1922 年夏，成都高等师范学校闹风潮，校长去职，学生和当局请我担任高师校长，我义不容辞地担任了这个职务。我在校内进一步展开了宣传和组织活动。

我费了很大力量来办这个学校，从前学校中纪律非常松弛，课程内容也陈腐不堪。我到校以后，采取革新的措施，聘请了许多具有新思想的人来担任教师，并加强学校纪律，扭转了散漫的风气和革除了落后的封建陋习。对教师和学生的学习、生活尽力关心照顾。经过一

番整顿，学校面貌大大改观，师生员工团结得很紧密，树立了一种崭新的学风。同学们有秩序，有朝气，追求知识，孜孜不倦，议论政治，意气焕发，成都高师成了进步势力的大本营。

五四以来，四川省的新文化运动很快地就开展起来。除了成都高师学生创办的《星期日》等刊物进行鼓吹新文化、新思潮以外，许多外地的新书报也纷纷传入，先进的马克思主义者恽代英等都曾到四川进行宣传活动，我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随着形势的推移而逐步深入。

我利用同盟会老会员的身份，尽可能地推进新思潮的扩展，除了在校内工作外，并利用个人与四川上层社会的历史关系，为革命同志作掩护。如1922年，恽代英同志在泸州被川军赖心辉部所扣押，我知道后就打电报去泸州，保释代英同志，并请他到成都高师任教将近一年。恽代英同志是最受学生欢迎的教师，他在成都高师期间，把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活动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

在这时，我们还派人深入到工人和农民中去做宣传和组织工作。成都市有一个兵工厂，工人很集中，此外市内还有许多分散的丝织工人，我们派学生去分片联系，组织工会，发动罢工。另外在成都近郊和某些乡村的农民中，也有学生去进行活动，组织农会。当时成都经常发生罢工事件，我的一个老朋友跟我开玩笑地说："只要把吴玉章捉来杀了，罢工就不会发生了。"的确，当时四川的一些军阀对我很头痛，但是因为我和同盟会、国民党的历史关系，更因为当时群众伟大力量的支持，反动派也奈何我不得。

当宣传和组织工作开展到工人、农民中去以后，成立无产阶级政党的要求也就愈来愈迫切。这时成都高师内已有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我当时年已四十四岁，当然不能参加，于是与杨闇公同志等二十多人秘密组织了"中国青年共产党"，作为领导革命斗争的机构，并发行《赤心评论》，作为机关报。由于四川地处僻远，一直到这时候，我们还不知道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也不知道国共合作的新时期即将开始了。

八、参加中国共产党

1923年，刘湘、杨森勾结吴佩孚进攻四川，1924年1月杨森攻占成都，派人接收成都高师，我就交卸离校。当时五一劳动节快要来到了，我们一些人怀着兴奋的心情筹备一次盛大的纪念会，许多青年人通过工会组织在工人中做了许多宣传鼓动工作，纪念大会一切都已准备就绪。突然，四月二十九日，有人告诉驻在成都的军阀杨森，说“五一”纪念会是吴玉章的“阴谋”，要组织工人、农民和学生推翻杨森，夺取政权。第二天，成都市内实行戒严，空气非常紧张，杨森的军队纷纷从各地调回成都，我们预定的会址“少城公园”也被军队看守起来了，并且扬言要捉拿吴玉章。

在这紧张的时刻，成都工人阶级表现了不畏强暴、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精神，他们不顾反动军队的武装威胁，仍在公园内召开了纪念大会。我当日本欲参加大会，由于同志们力阻，未能亲身参加；近郊农民也被反动军队阻止，未能入城会师。

“五一”事件以后，我在成都立不住脚了，随即离成都和刘伯承同志一起离开四川，取道贵州、湖南到上海。到上海一看，全国工人运动的浪潮汹涌澎湃，国共合作已经开始，广州革命政府日益巩固，革命局面蒸蒸日上，真是感到无比的兴奋鼓舞。当时孙中山先生为召开国民会议的事已赴北京，我也于1925年2月赶到北京去。本拟见中山先生，他因病重不能接见，不久他就逝世了。

我到北京后，见到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负责人之一赵世炎同志，才了解到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经过和活动情况，我就在这时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写信去四川，要杨闇公同志等把“中国青年共产党”取消，个别地参加中国共产党。

我入党的那年已经四十六岁，我的前半生一直在一条崎岖不平的道路上摸索行进。从我少年时代听到中日甲午战争失败起，就为国家的忧患而痛苦、而焦虑、而奔走；我们在豺狼遍地的荒野中想寻找一条出路，许多我所敬仰的、熟习的同志为此而献出了生命，但是直到五四运动以前，还没有找到一条光明出路。感谢十月革命，它的万丈

光芒照亮了殖民地人民的前途，我们找到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这个理论武器一经与中国工人运动结合，立即发挥出无坚不摧的伟大力量。在这个新的历史条件下，我才能够通过自己的具体历程完成个人思想上的革命转变，参加了共产党，从一个民主革命者变成了一个共产主义者。

“五四”运动已经过去了四十年，这四十年国际国内的历史，生动地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和生气勃勃。现在国际形势方面，东风已经压倒了西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正在大踏步地奔向共产主义的前程；在国内方面，社会主义建设正在一日千里地跃进，伟大的祖国日益强大，日益繁荣了。让我们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斗旗帜吧！它已经引导我们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它正在引导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并将引导我们走向建设共产主义的更加伟大的胜利！

五四回忆

许德珩

由于1914年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美、英、法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一时放松了对中国的压榨，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一时抬起头来；也是由于欧美资本家一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近邻的日本，就加紧的向我们进攻。第一次欧战开始的时候，日帝就以对德宣战的名义，诱胁北洋军阀对德宣战；更借参战的名义，侵占我们的东北，攫取德国所侵占在山东的“权利”。为达到这个目的，他就用种种的方法，帮助当时的中国军阀进行内战。

1917年，伟大的苏联十月革命，推翻了他们国内的反动政权，退出了帝国主义战争，与德国媾和。日本军阀就以国际帝国主义在远东看家狗的身份，对西伯利亚出兵，包围苏联，企图借此来吞并我们的满、蒙、山东，灭亡中国。为着这个目的，他就大量的借钱给中国军阀，收买他们，先后借款达两万万多元，供给他们的军火，使他们自相残杀，并还订立了出卖中国的中日军事秘密协定。1918年初，奉直战争进行狂热，这年5月，卖国的中日军事协定被留日的中国学生知道了，他们在东京开会反对，被日本警察拘捕的、打伤的好几十人，引起了全体留日的中国学生的愤怒，他们于是全体回国，国内学生因此也受到了激动。5月中旬，回国的一部分学生代表到了北京，奔走运动了一些时日。5月21日，北大、高师、高工、法专、医专、农专、中大等校学生两千多人，为着反对中日军事协定，举行了一个破天荒的游行请愿运动，这就是中国学生第一次的游行请愿运动，为五

四运动的前奏。

这次的游行请愿运动，虽然没有结果，但是北京和天津的学生却因之组织起来了，北京一部分学生组织了学生救国会（最初的名称是学生爱国会），联络南北各地的学生。7 月中，我们代表北京学生救国会南下联络，过天津时，会同天津代表工专学生马骏、张传琦（这个人很激烈，开会时，一刀砍掉自己的手指头写血书），到济南、南京、上海各地向学生去进行联络。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组织了近乎全国性的学生团体——学生救国会。为便于联络，学生救国会筹备出版一个定期刊物，取名叫做《国民杂志》，由南北各地学生和国民杂志社社员两百多人每人摊出大洋五元作为基金，这样一下筹得了一千多元，在当时不能算是一个小的数目。社员的名字，凭我的记忆所能写出的，有邓康（中夏）、黄日葵、高尚德（君宇）、陈宝锷、陈钟凡、马骏等，教员方面聘作导师而且经常写文章的，有李大钊同志，另外还聘请了邵飘萍先生做这个刊物的顾问。我们在这里特别来谈这个问题，是为着说明五四运动不是突然爆发的，也不是无组织的，相反，是由于有了这些准备，五四一经爆发，才能很快的成为普遍的运动。只因为这个杂志是学生会一部分人举办的，它只注意于反军阀、抗日的政治运动，没有尽力白话文的宣传，所以在当时新文化运动的狂潮中不为人所注意。

再来谈谈当时的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

为说明这一问题，不能不说到当时的北京大学，尤其是蔡元培先生做校长时的北京大学。

蔡元培先生是 1917 年 1 月到北京大学来做校长的，当时袁世凯已死，曾因反袁而流亡海外的人们又纷纷回来，蔡先生就是其中一个。他到校后，宣布他的办学宗旨是“兼容并包”，提倡“学术思想自由”。蔡先生的学术思想自由，当然是资产阶级的，可是，在当时确实发生了一些进步作用。

由于他的“兼容并包”，北大在他来以后，就包括了几种类型的人物：

第一是无政府主义的思想者，教员中属于这一方面的有李石曾、吴稚晖等人，蔡校长本人的思想在当时也有点倾于这一方面。李石曾

当时在北大教生物学，吴稚晖学校里发表了他做学监他不就职。这些人原来在巴黎开豆腐店，办了一个刊物叫做《旅欧周刊》，大汉奸褚民谊做这刊物的编辑，这刊物里面时常介绍普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人的思想，鼓吹无政府主义。由于当时中国的政治太坏，学生们社会科学的水准不高，又有社会上这些“知名之士”来鼓吹提倡，所以在最初倾向于这种思想的很有些人，还能记忆的有凌霜（黄）、声白（区）等人，他们在当时都是主张不要国家、不要家庭的人，所以他们的名字上多半不冠姓。那时有些脱离实际的空想家，看不起大伙同学的爱国运动，以为“爱国”是落后的思想（如上面所讲的学生爱国会，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改为学生救国会的），所以象刚才讲过的 5 月 21 日的请愿运动，北大学生中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人们是不参加的。

第二是《新青年》和《新潮》方面的人物，即新文化运动的人物。1917 年初，蔡校长聘请了陈独秀来做北大的文科学是（文学院长），聘请了章行严来做图书馆长，章到校不久辞职，推李大钊（守常）自代。李大钊是日本留学生，民三，章行严在日本办《甲寅杂志》（《老虎报》），李大钊和陈独秀都经常在《甲寅》上面写文章，陈独秀以后又在上海办一《青年杂志》。到北大不久，就把《青年杂志》改名《新青年》，主张白话作文，鼓吹文学革命。李大钊、鲁迅在《新青年》写文章。大概是在 1917 年秋，胡适由美国回来，到北大任教，《新青年》里面一方面有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同时也有胡适、王星拱、刘半农、周作人诸人，他们虽然都是在《新青年》里面的新文化运动人物，可是在思想上当时彼此是有距离的。尤其是胡适与李大钊同志，这时在思想上就有很多冲突。如李大钊同志讲《庶民的胜利》，胡适就讲民主主义战胜军阀主义；李大钊讲马克思主义，胡适就讲多谈问题，少谈主义，同时他又宣传他的实验主义；李大钊站在学生一方面参与学生运动，而胡适则站在远远的，并且主张二十年不谈政治。在胡适影响之下的学生，有傅斯年、罗家伦、毛子水等。他们办了一个《新潮月刊》，响应白话作文。这刊物，在主张白话作文，响应文字改革上是有他一定的功劳的，可是对于 5 月 21 日的请愿运动，他们也是不参加的。

第三是《国故》派的人物，教员方面有辜鸿铭、刘师培、黄侃，这些先生，他们抱残守缺，少谈政治（其中辜鸿铭、黄侃两先生，也谈政治，不过只是发发牢骚，骂骂人而已），所以在思想上没有可叙述的地方。

这是五四运动以前北京大学在蔡校长“兼容并包”之中思想分野的一个概略。其中学生方面有从事爱国运动、反帝反封建的，如国民杂志社一班人；有参加新文化运动的，如新潮月刊社一班人；有发扬旧文化，如国故月刊社一班人。他们在五四以前一个时期，还是各自为政，不相为谋的，真正是叫做“自由发展”。这其中，从事新文化运动，站在学生群众一起，努力抗日爱国运动，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迎接新思想新科学，使学生们走上团结之路，催生五四运动的人物，是李大钊同志，而实现这团结的时期，则在欧战结束以后。

我们在前面不是说1918年5月，因留日学生归国，北京学生所发动的游行请愿运动，是五四运动的前奏吗？这里又如何说李大钊同志是团结学生，催生五四运动的人物呢？李大钊民国初年在日本，民国六年到北大。从留日学生归国，组织留日学生救国团以后，他一直是抗日爱国运动的努力人物。1918年7月中由他发起，联合各方面的青年有志之士（这里面也有些坏分子如曾琦一类的人），组织一个带学术性的政治团体，叫做少年中国学会，这学会网罗了各方面的有志青年，其中包括了少数日本归国学生、国内各大学学生，以及社会上有志之士。会员有百零八人，其中不少绝特之士，而这个少年中国学会之组成，对于五四运动是起了很大的联系作用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由于德国的失败与苏联革命的成功，一时“公理战胜强权”、“劳工神圣”、“民族自决”等名词，呼喊得很响亮，激动了每一个青年的心情，以为中国就这样便宜的翻身了！1918年11月到1919年4月，这时间学生们真是激动得要发疯了。庚子义和团运动的时候，对德国屈服赔罪而建立在北京东单牌楼最耻辱的“克林德碑”也拆毁了，改为“公理战胜”的牌楼，竖立到中央公园去了（现在的中山公园）。名流们也勤于讲演，今天你讲一套“民主主义战胜军国主义”的理论，明天我又讲一套“公理战胜强权”。蔡元培校

长也在天安门前广场搭起台来，讲演“劳工神圣”，只有李大钊同志呼喊“庶民的胜利”（《庶民的胜利》这篇文章，是他当时的一篇讲演稿），欢欣鼓舞的庆祝苏联十月革命成功。大家眼巴巴的企望着巴黎和会，希望巴黎和会这个强盗集团能够给我们一个“公理战胜”，那晓得奢望终是失望。4 月底，巴黎和会决定了要把德国强占我们的山东“权利”，判给日帝国主义强盗继承。同时还拒绝了取消袁世凯与日本所订的二十一条卖国条约。5 月 1 日，我们得到这个晴天霹雳的消息，参加在国民杂志社的各校学生代表，当天下午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讨论办法。高工的一个学生代表，当场咬破手指，写血书，大家激昂得眼里要冒出火来。于是决定 5 月 3 日（星期六）晚上在北河沿北大法科大礼堂（现在的三院礼堂）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北京各校学生都派代表参加。并推定北大法科四年级学生廖君做主席，推文科学生黄日葵等三人做记录，推我起草宣言。三日晚上的会，北大全体学生都到了，各学校也到了许多代表，礼堂里里外外都挤满了人，这算是北京全体学生大团结的一个会议。会开到很紧急的时候，有一位十八九岁的同学，拿出一把菜刀来要当场自杀，以激励国人。大会决定了第二天（4 日）早晨到天安门齐集，示威游行，这就导入了五四运动。

五四那天由天安门到赵家楼，殴打卖国贼章宗祥，火烧曹汝霖住宅，三十一个学生、一个市民当场被捕的事，报纸上有记载，我不在这里来说了。

由于这次运动主要的是抗日，皖系军阀亲日派的段祺瑞就主张严办学生，借此来镇压一下，而亲英美派的直系军阀则主张和缓，他们之间的矛盾是很尖锐的。亲日派的军阀正是当权，在“爱国无罪”的舆论之下也怕激起更大的事变来，于他们不利。同时自从五四那天大批的学生被捕以后，北京各校的学生会也组织起来了，北大的学生救国会也改为北大学生会，5 月 6 日北京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也成立了，会址设在马神庙北京大学第二院。“学联”的名词，从这一天起，就开始存在了。因为大批的学生被捕，各学校的学生会成立，就以有组织的行动，陆续的到警察厅和步军统领衙门监狱去报到，要求收押，以营救被捕的同学。在这样的气氛之下，军阀们也怕酿出更大的乱子

来，于他们更为不利，被捕的三十一个学生、一个市民，于5月7日的中午被释放了。被捕的学生虽然被释放，军阀们以为这次的事是新文化运动的胡适搞出来的，要来镇压一下。其实搞新文学改良的胡适，在五四运动以前好久就到南方去了，去迎接他的美国老师去了，五四那时他不在北京。五四群众示威运动他也是不赞成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是负行政责任的人，他同情学生运动，而又不愿意闹得过火，学生出狱后，北洋军阀的教育部一再地威胁他，训令他，要他严加管束学生（训令现在还存在北大博物馆展览）。可是学生运动还是继续，学生还是日夜不停的到街头讲演。蔡校长在这种情形之下，于5月9日就留下“杀君马者道傍儿”这谜一般的一封信辞职离京走了。学生会得到了这个消息，于反帝反军阀的口号之下，又添上了一项挽留蔡校长，不达目的不止的任务。于是更广范围的到街头讲演，学生一面讲演，警察一面捕人，讲的愈多，捕的愈众。这样，运动就不能限于北京一地了。5月19日，北京学联就决定派代表到南方各地去扩大宣传，这时，各地的学生会差不多都组织起来了，各地的学校也都罢课，6月1日以后，北京学生被捕的达一千多人，北河沿北大法科大礼堂做了临时的监狱。6月3日，上海的商人罢市，工人罢工，随着南京、汉口、济南、天津等地也都相继罢市、罢工，由于上海自来水工人罢工，上海全市没有水喝，铁路工人罢工，交通断绝了。上海各马路也组织了马路联合会。五四运动到了这时，已经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已是一个革命运动了。六三以后，知识分子的学生运动，便与工人阶级结合起来了，这一结合，五四运动的意义就与以前不同了，它指示了政治运动的路线，增加了运动的力量，同时也使工人阶级觉悟了。以前，反帝爱国运动只限于知识分子群的学生，现在扩大到了工人、商人、学生中。成为各阶层共同的任务，结成各阶层的统一战线了。所以五四运动到了六三罢市，接着工人罢工以后，军阀统治阶级就不能不接受惩办卖国贼的要求，来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了。强盗分赃的巴黎和会的和约，在这样情形之下，中国的代表也不敢签字。6月16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在上海先施公司东亚酒楼礼堂开成立大会，全国各地三十多个单位的学生代表都参加大会，当时在上海的孙中山先生还到会讲演过，出

版了《全国学生联合会日刊》（1919年6月16日出版到8月底），推举了全国学联理事会负责人。五四运动到了此时，形式上是发展到最高阶段，走上结束之途，而实质上就导入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新的革命阶段。

（原载《九三社讯》1951年第3期，第14～15页）

回忆北京学生五四爱国运动

王统照

关于五四运动的远因、近因已有不少探讨评论的论文、专著，不需我在这里加以复述。但就那时我自己的感受想来，即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早已引起青年们与爱国者对于世界局势的密切注意，及至俄国十月革命成功，这个有力的启示，大家认为是当时混乱局势中转入现代历史新阶段的第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也是全世界上一个“新纪元”的开始。正处在外侮、内讧纷纷逼压、急于要求一条出路的中国，哪能不受到鼓舞、兴奋！这“有了俄国十月革命世界人类便生出一个大希望”的心情，对于中国的青年说来，尤其感到迫切，感到适合。

另一方面，《新青年》的刊行，改进，也促起了多少青年的觉醒，尤其是俄国十月革命后，李大钊先生在这个刊物上发表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几篇内容崭新思想清锐的论文，更给读者以明白的指示。青年读者们不止是对他的学力、思想、文笔感到钦佩，而进一步对于十月革命之历史的意义与其对全人类的影响有了比较明了的认识。相形之下，自然而然的希望这古老的中国也会有彻底澄清的一天！虽然一般青年还不易完全看透中国革命要如何按步进展，要怎样以阶级观点对一切分析、批判，而当创巨痛深，想寻求出路的当前，这些文章的刊布自是强烈有力的引导。

从 1918 年的下半年起，当中国留日学生全体反对军阀政府与日本签定的秘密协定、大借日款扩充武力时，北京学生也曾集众有所表

示，而对国事的关怀与愤慨却正在逐日上升。由于军阀统治者的横行逆施，人们追究中国若干年来的种种病根：辛亥革命何以未能成功，民主思想（当时还是笼统的说法）何以未曾普及，以及为甚么腐化、恶浊的现象日甚一日，于是打倒吃人礼教与揭穿种种封建毒素的精辟生动的文章陆续出现。如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孔乙己》……这些创作以及他的尖锐的杂文都给青年学生以一针见血的沉痛明朗的启发。

那时，北京的学生界，三三五五，课余饭后，在教室、操场、公寓里，以及公园里，凡是大家游散聚坐的地方，无不争论着国事与报纸刊物上的文章。一股新的力量正在蕴蓄、滋长中，到处遍布，到处散发，而中国在巴黎和会的失败消息连接传来，像给这股怒发的力量泼上了火油，立即燃烧。尤以当时的卖国政府于前一年与日本签订了"欣然同意"的山东问题换文，把全国人民完全蒙住，并且还有训令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跟着日本代表签字的消息，于是公共的激愤、痛恨达到了最高度，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五四前夜的火炬已在各个城市中预备待燃，而北京的学生便首先点着了第一声的号炮！

1919 年的 5 月初，在北京传遍了中国在巴黎和会的要求全被拒绝的消息，大家完全明了所谓"公理"只是帝国主义者的谎言，而对卖国政府和军阀、官僚甘心作帝国主义者的奴仆，与日本订立了卖身文契，更是愤不可遏！在北京大学三院开各学校代表会议的 5 月 3 日晚上，各中等以上的学校学生们大都想到在一两天内定会有所举动，而且一致觉得也必须有所举动！及至得知明早往天安门广场集合的传告已快近夜十一时了。那些日里，我与几位同学原都睡得较晚，阅书、写文或作夜谈，听说明早开大会的决定后更加兴奋，纷纷预测大会的结果与应作的严重表示。夜深纵谈不知疲乏，及至上床，反而像没有甚么挂念似的，睡得十分甜稳。

刚入 5 月的北京天气，一清早虽还有点微凉之感，午间却已烦热，也正是初穿单衣的首夏。天安门前，正阳门里大道两旁的槐柳，被一阵阵和风吹过摇曳动荡，而从西面中山公园（那时叫作中央公园）的红墙里飘散出来各种花卉的芬芳，如在人稀风小的时候也还可以闻到。但在那天，像这种闲情逸致不仅是无从想起，就连热尘黄土

的飞扬、腾扑也不大注意拂掸。快近十时，阳光渐热，大家拥立谈论，额汗蒸发。在偌大的广场上白旗舞动，与正北面宽大的褪色的红墙相映，另是一番景色。

各校列队完全由各校同学们自行组织，在昨夜与清早准备的各样白布标语，横竖都有，用竹竿挑挂起来。那时还没用“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集会的主要目的集中在收回山东主权，收回青岛，反抗日本以及惩办卖国的军阀官僚，所以标语大都是写着：“收回山东权利”、“惩办卖国贼”、“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铲除国贼”、“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 等等句子。这样写法各校大同小异。

到会的都是北京中等以上的学校学生，穿长袍的占大多数，也有穿短黑制服的。十时后参加大会的已经到齐，虽然没曾详记人数，但约在五千人以上。在这个首都的大广场上仅仅在两个矗立的华表前占了一个大圆圈，但在当时的北京能集合这个数目的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却是前所未有。

除青年学生外，陆续而来的旁观者却也不少。他们多是从前门外与东西长安街就近集合而来，专为看看学生们要作甚么举动。北京的市民见到天安门内这一早上学生们有这么大规模的集会，自然明了是为了“国家大事”。但由于像这样的运动还在初期，还没有普及到群众中去，所以那一天单是青年学生充了先锋，可是一个月后的六三事件便扩张到工人、商人中去了。我敢断言，那天围在学生群的外面、跟着学生行列忽断忽续向前走的一些市民，对于示威运动是同样的富有同情，并且也满怀热望期待着学生们有一场热烈有力的举动。

因为事先即有组织，各校的代表们在前领队，传达行动，维持秩序。在开会时我站在一层层的人群中间，又没有扩音器，听不完全那位似是立在方桌上演说者的话音，但大意是了解的，与各校所写的标语上的要义一样。到会的对于大会的开法没有争执，主要是要有甚么样的行动，要对卖国的军阀、官僚怎样表示，怎样示威，及至先往日本公使馆去的，提议宣布以后，大家高叫赞同，更不计较有何利害。学生们都是赤手空拳，为的是拥护公理与表达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要坚决收回被日本强行占夺去的中国的土地与中国的权利。

这段路距离太近，五千多人的行列，几个人的横排纵队前后相联，最后面的还在正阳门口，而前队早已在东交民巷的西口以内与美帝国主义所雇用的巡捕相对而立了。

学生们的高喊口号到此更加热烈，路旁与从前门大街、东西车站挤来的市民争上前来围观。卖国政府早派来的警察、兵士尽力把看热闹的人往后赶阻，不使与学生大队接近。大队好容易进入西口，目的地是更向东去直往日使馆，而美帝国主义者的雇用巡捕这时便不让学生们再往前去。他们虽然还装假面目，没出恶言，但为卫护日使馆却坚定地不许通过。中国军警乘此便大声呼喊："退回去！回去！"逼迫着大家退回原路。在这两方的交迫之下，大队只好由隔西口不远的一条路，穿过御河桥，浩浩荡荡转向东单牌楼走去。

由于第一个目的地被双重阻碍没曾达到，大家激愤的心情愈发高扬。眼看着在中国的城市——中国的京城，中国的街道中，中国人民没有通行的权利，而受帝国主义者指使阻止的是他们雇用的巡捕，同时，强逼退回的却有军阀政府派来的中国军警，而这还是在巴黎和会上高谈着甚么"主张正义"、"民族自决"等等好听的名辞的时候。

初穿过御河桥北去向东时，大队中间与后面的学生还不明白第二步的目的地所在，纷纷传问，只是揣测着定往东城或是先整队走过各条大街示威。及至从东单牌楼更向北行，才逐渐从大队前面传达过来，要往"赵家楼"去的话。大家原知道今天早晚总会找到曹汝霖的住处与他清算，可是大多数还不知道赵家楼这个名称，纷纷互问：

"赵家楼在哪里?"

"谁住在赵家楼?"

后来说明"赵家楼"就是曹氏住的胡同，大家便高兴得加快了脚步，而"打倒卖国贼"、"惩办卖国贼"的口号立时响起。

在大队左右，纵长约计隔开十来个人的距离，就有穿了黑灰军服的军警持枪随行。他们在路上并没横冲游行的大队，对大家的高喊口号明知不能禁止，也倒没怎么干涉。他们在以前没曾见过有这许多学生的列队游行，更没听见过这些口号，这种情形在他们的印象和感觉上当然是新鲜而强烈的。虽是受了军阀们的命令与学生们取敌对态度并且可以随时拘捕，但这样热情充满、汗泪融合的共同表现使他们也

有多少感染。有的并不怎么紧张，只是拖了枪支，像漫无目的的随众前行；有的却十分注意听着学生们喊叫的口号，若有所思，不顾擦抹脸上的汗滴。同时，也有些学生边走边谈，向他们宣讲爱国的道理和为甚么举行这一次的游行。

东单牌楼以北，这时正是行人拥塞颇为热闹的所在。已近午后三点了，天气愈热，尘土飞扬，而大街两旁尤其是每条胡同的东西口外，大人、儿童密密集立，都十分注意这突来的青年游行的队伍。

无论甚么店铺的店员和店前的顾客也一律暂停交易，在门口石阶上了望大队的经过。他们听了青年口中叫出的种种口号，有些人眼中立即浮现晕痕，有的长吁一声，用脚迭蹴所踏的土地！也时而有些轻微的拍掌声响，但少得很，因为那时在街市上拍掌的习惯还不怎么普遍。

大多数的观众都完全明了青年们的爱国热诚，从他们的严肃的表情上，可以证明他们的同情，而绝不是只为看热闹而来的“冷眼旁观”者。

“干吗的？学生们这一大片！喊的甚么？轰轰的听不清。”一位花白胡子的瘦弱老人，在一辆人力车上抬起他那老式的方袖马褂的袖子，像对青年的车夫问话。

车夫早已停住车子，等待游行大队通过后方能横越大街。他紧拧着浓黑眉毛，大声道：

“您老耳朵不听用了，没听见这是要‘誓死收回青岛’、‘打倒卖国贼’吗？青岛！青岛在山东，是咱们中国的！……”

“噢，怎么，为的收回青岛？……对！对！青岛是好地场，我走过的，走过的，那还是光绪末年，德国人修的铁路那时到了济南……日本人又夺了去！……哎，打不过人家，可要怎么收回来啊？……”

青年车夫愤愤地道：“有汉奸里应外合便不好办，学生们这是要先与汉奸算账！”

我居心想缓走几步，听听这道旁的公论，可是后面的人群急行向前，而怒喊声压倒一切音响，不容易多站一会，我便无法继续再听他们的问答。

那天，我预料午后的天会热，外面只穿了一件爱国布的单长袍，

可还觉得格外沉重，一顶呢子礼帽不时摘下来当扇子遮着阳光，扇扇尘土。北京的街道在那时本来就是灰砂很多，正是春末夏初，阵风一起，加上这几千人的步行蹴踏，自然有一片滚滚的尘雾，直向鼻孔口腔中钻来。在焦热的空气中，大家的激情奋发，加上一路不停的高喊，口干舌燥，有些人的声音已经嘶哑，便把手中的小白旗与帽子、手绢一齐挥动起来。

“赵家楼”这个曲折的地方我还是头一次走过。约摸从东单向北一大段，转向东去，再穿过两条巷子，方才走到一条不大宽敞的胡同口，可是蓦地看见横钉着蓝地白字的“赵家楼”三个字的磁牌时，大家的眼前突然雪亮。

大队快进“赵家楼”时，夹在我们两旁的武装军警突然像稍微少了一些，这种情形或者不易觉察，我却有点注意。也许他们从另一路先转进去，或是与早在这里附近把守的军警联合起来另有布置。

原来由天安门出发以前是以各学校的组合单位排队，先后有序并不混乱。我与一些同学们排列在队伍中段的稍前面，后头还有几个学校学生的列队。及至走进“赵家楼”时，虽然明知早有武装军警对于曹氏住宅严加保护，但大队却更保持严肃，绝未分散、乱走，而且全队是以强烈的高声怒吼与沉重的急促脚步向里行进！这条胡同的东西距离与当中拐尺形转角过去的南北距离都不算太长，可是我与同学们刚刚踏过转角，踮起脚来能望到北头的曹汝霖的住房门口时，前面人群紧挨密集，而身后的队伍又一步步追上来，已是不易举步更向前去。走在最前面的当然早已到达曹氏的大门外边，究竟他们是正在与军警们交手还是已经入内，我们无从问询，一时又没法挤得过去。正在大家互相传问与疑闷中间，而从胡同的入口与胡同外面陆续传来了喊声：“冲向里面去！”大家虽然还能按着列队的次序立定，却已十分焦急！后队愈益前迫，我们正被前后左右的胸、背、手臂紧紧挤压，喘不过气又走不动的时候，前面仿佛有一片声响，人多喊音高，初时还没听得清楚。一会，听见有竹竿折断的乒乓乒乓的密响，而又是一阵喧争的怒音从最前列发出，这时，也隐约看见有些横过枪来的军警从转角的那一端尽力压迫过来。

不知怎的，有人喊着：“冲进去了！冲进去了！军警也下手了！”

于是大的骚动波及了整个的队伍！

窄巷曲折，层层挤塞，前头的一时没法更进，早在曹氏门口准备好了的和从胡同那一头拥进来更多的武装打手，除却与最前列的青年冲突一番外，又联合起来想一直向后压迫。大家挨肩挤立，全是人层。前面既已发出响声，又有人一阵高喊，人多密集难动，但也实在没法停在那里，便有一部分人转过身来向来路涌出，而靠在他们身后的未曾先防，突被大力冲倒，自然得往后退。这样，层层挤压，在拐尺形转角后面的更站不住脚，只有往胡同外去。

在先，我随着一些同学刚走进转角的北面，曾在身旁看见一辆推水的水车，一位劳动的中年人正推着两大木桶的水向巷子外走。突遇大队学生拥向里来，出其不意，他只好停车等待，他把车子略略放歪，靠住砖墙。这一瞥的光景我并没大注意。及至被前面返身外出的大力挤压过来，我与左右的同学们突被压倒，如不立时起立会被踏伤。我那顶呢帽早已抛到几尺外的地上，不能拾取，即被身后的力量推动，仍然走过转角的一面。这时，我才看见我的侄子晴霓被挤碰在那辆靠墙歪放的水车上，右手掌擦破，染出了一片殷红。

胡同内外的地上有好些不同颜色、式样的帽子、鞋只，人多势迫，不能立足，有的人只好捡着不是自己的鞋子穿着走去。

我们被拥到胡同外时，已可看见有一团不大的青烟从曹家的房顶冒出，这是队伍最前列的青年学生攻入曹宅的显证。虽被好多军警立刻把胡同的入口把守起来没法知道底细，而这次游行的最后目的却终于达到了！

时候已近午后的五点，西南风刮得颇大，一片黄朦朦的风砂在东城北面卷起，空中骤添了些紧刷的声响。赵家楼外，在街上有几百个、几十个一群、一簇的学生欢声笑语，带着满脸尘土高高兴兴地向各方散走！布满胡同口与早先呆立在大街左右的军警，对这些虽已散队却依然是人多势众的青年群也没敢更向前追，他们只将首先冲进曹家住宅的几十个学生阻住捕去。其实，我们在当时还说不清楚究竟冲进去多少人，最后是否已经出来也无从问起。因被军警隔断，又找不到靠在最前列的同来者可以探听，但有人被捕却是必然难免的情形。

街上的观众对于散走的学生脸上都表示出惊异、郑重的神色。火

烧“赵家楼”，打了卖国贼的惊人消息，不知怎的，立即沸沸扬扬地迅速传布，真是想不到青年学生们竟会干出了这样空前的重大事件。

这个震惊一时而又是此后多少大事件开端的新闻，没等到黑天就已传遍“九城”了。

（原载《人民文学》1954年5月号第55期，第113～114页。

原题《三十五年前的五月四日》）

回忆五四当年

孙伏园

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学生物质生活一般是超越千百万普通人生活以上的，但除极少数封建地主和买办阶级的子弟以外，大多数小资产阶级家庭的子弟的物质生活还是低劣的。

那时国内大中城市已有邮政，也有了电报，但利用得极不普遍。北京还没有电车，也没有公共汽车。总之没有公共的交通工具。交通工具都是为个别的人而设的，全城也许只有不到十辆汽车，不到一百辆马车，此外还有成百辆的骡车和成千辆的人力车。这些交通工具都没有给劳动人民享受的机会。

从北京通到国内各地，也有极少的几条铁路。这些铁路都掌握在帝国主义者手里。那时前门东车站叫“京奉铁路火车站”，可以从北京通过天津、山海关直达奉天（沈阳的旧称），前门西车站叫“京汉铁路火车站”，可以通过卢沟桥、长辛店直往汉口。这两条铁路在丰台接轨的事还没有实行。虽然都是相当重要的铁路，但行车时常中断，不是因为天灾（大抵是大水），就是因为人祸（军阀互相火并）。此外还有几条短的，例如京绥铁路先称京张路，只从北京到张家口，虽已向前延伸了，但离绥远还远的很。

五四时代学生的文化生活一般是枯窘的。

数一数当时的北京报纸罢，记一记当时北京报纸的新闻内容罢。

帝国主义者主办的报纸是：日本的中文《顺天时报》；英国和美国的英文《华北明星报》、《北京导报》、《北京时事报》；法国的法文

《北京政闻报》。《顺天时报》有相当的发行势力。据说，袁世凯在做皇帝的时候每天必看《顺天时报》，看有没有人反对帝制。他的走狗们甚至假造了一份《顺天时报》每天“进呈御览”。但日本帝国主义一天天凶狠，中国老百姓一天天觉醒，《顺天时报》的气焰在五四运动前夕已经减退了一些了。英法文报除他们自己的侨民以外本不会有多少读者，但殖民地里的所谓“高等华人”一天天多起来，小“高等华人”一天天被训练出来，这些报纸销路就渐渐有了增长。有的学生想从这上面找一点中文报纸所不登的消息，有的学生想学看英文，准备作“高等华人”。

中文报纸虽有几十种，记得起来的不过三五种：

《国民公报》和《晨报》都是梁启超系统的知识分子所办，但发行数都不过三、五千份。

《北京日报》和《京报》都是职业报纸，前者历史较久，思想旧，技术低；后者是一位新闻职业青年所办，对新闻技术不讲究，但也谈不上有什么见解。

《益世报》是基督教会所办，原则上是守旧的。

《公言报》是安福系的机关报，无论在思想上或行动上，都是十分反动的，它是统治阶级以至一切恶劣和腐败分子的代言人。

这些中文报纸的形式和内容都是很可怜的。文字是低劣的文言，既不古雅，也不通俗。评论也好，新闻也好，不但没有标点，竟是没有句读，从头到尾像钢铁索般的若干条，还带着恶劣的油墨臭味和错误的字句，形式上的美丽丝毫也谈不上。

内容是贫乏得很。社论当然不能常有，有也不值一读。因为陷在当时的政治环境里，即使十分努力探索，每天有一篇报道政治新闻的“本报讯”就了不得了，但这个政治的本身就肮脏恶臭，报道了也引不起读者的重视。

国际新闻的不被重视，编者和读者都一样。来源是英国的路透社和日本同盟社等。外国通讯社的稿费都贵，因为不重视，也就不订购。记得那时路透社的中文译稿是每月二十圆，材料比英文稿要减少几乎一半，如订英文稿就要每月五十圆。日本稿又不愿意订。路透社中文稿很不认真，读者也不当一回事，因为常出错误。于是国际新闻

闹得乌糟了。

受到十月革命后苏俄扶助弱小民族外交政策的鼓舞，见到巴黎帝国主义分赃和会对于中国的蔑视，学生们愤怒的气势抑止不住了。

上面叙述的五四时代一些琐琐屑屑的回忆，多少可以说明五四运动时社会生活的一部分。

这时辛亥革命的痕迹已经全部抹去了，这在五四时代的青年知识分子是看清楚了的。满清专制政府的全套统治机器、统治人员和统治方法基本上都保存了下来。满清的"皇帝"溥仪还占住在故宫里，不只是占住而已，每天清早还有他的"大臣"穿戴了"朝衣朝冠"进宫去"上朝"。

帝国主义势力的深入使整个中国已经成了半殖民地。铁路、轮船在帝国主义者手里，关税、盐税在帝国主义者手里；从城市到乡村都有英、美、法等国的教堂和教士替各该帝国主义者做着情报的工作；首都北京城里驻扎着各帝国主义者的军队，随时都可以对中国为所欲为。崇文门内大街以西和正阳门内大街以东，东长安街以南的方块区域，驻住各帝国主义者的使馆和军队，四面筑着城墙，架着大炮，如临大敌。大批帝国主义者的货物运到中国来，吸取中国人民的血汗。因此有一件事也被看出，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帝国主义者对中国的榨压略一放松，中国就出现了民族资本家和成万的现代产业工人。

压在当时青年知识分子头上的就是这样两重大山：辛亥革命所想反抗而终于反抗不掉的是封建大山，辛亥革命所不敢反抗而凶焰越来越大而终于要寻求方法加以反抗的是帝国主义这一群大山。那时的青年知识分子，多是小资产阶级家庭的子弟，只觉得自己知道国事比别人多些。全国人民压在这两座大山之下，自己比别人更有十分沉重的责任感。

这就是五四运动酝酿时代学生思想和生活的一般情况。在这种情况之下，两重大山的重压一天天增加，青年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也一天天增加，一有触发，就要开花。自然，这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花必须经过较长时期才能发扬光大的。

五四运动的导师是十月革命。十月革命的真像在那些被封锁的新

闻报导中是很难使人清楚了解的。但中国人民，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可以从不完整、被歪曲、被封锁的新闻报导下，东一拼，西一凑，你通知我，我报告他，从字缝里看出字来，集合成一幅较为完美的画面。

当时，帮助我们了解十月革命和国内外局势的人，主要的是李大钊同志和他的一些同志们。李大钊同志是北大图书馆长，他为人谨厚诚恳到了极点。学生既不把他当作教授看待，也不把他当作同学看待，因为我们对他不需要畏惧也不可能随便，只是觉得十分亲切，如见了自己的长兄。他思想前进，同青年们见面总谈的是社会国家的改革和国际问题的评述。我们从他那里得到一些思想的和行动的启发。

李大钊同志的朋友们也通过他对青年学生有许多启发。《新青年》的方针是提倡“科学”和“民主”。无论它反对读经，反对文言，反对迷信，反对旧礼教，大致不背乎“科学”和“民主”的方针，也就是反封建的方针。李大钊同志在《新青年》上发表《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以澄清那时所谓“公理战胜”、“武力战胜”等等混乱的谬论。我们对于十月革命的光辉更加清楚地看见了。

当时有一批留日归国的同学们，他们常常比在国内的同学多通晓一些国内国际的大势。这些归国同学有的在北京教书，有的却在北京继续求学，他们都爱到李大钊同志那里去，因此也就和北京的同学相熟。从他们那里知道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十月革命的理论和消息、巴黎和会的钩心斗角的见不得人的勾当等。

5 月 1 日北京各学校的学生代表开了一个小会。3 日晚上，高师、法专、高工、高农等学校学生在北河沿译学馆大礼堂开大会，决定明日（5 月 4 日）下午一时半到天安门齐集出发游行。

游行出发以前，步军统领衙门派一个官来劝阻，学生告以目的在争外交，不必劝阻，这官就走了。游行的路程现在已经记不清了，大约是出中华门、正阳门，到珠市口又折回，想进东交民巷，被外国使馆的警察所阻，学生队伍留在东交民巷口外。这是十足的殖民地现象，帝国主义的军队驻扎在中国首都北京城内，各国使馆在首都划区居住，设置警察，阻止中国学生队伍通过。这时学生队伍已经愤怒了。学生队伍中准备着对外发言的人从队伍中出来。他们手中拿着几

份宣言，分别到英、美、法，意等国使馆去表示。

学生队伍不等发言代表回来便继续前进了。到赵家楼曹汝霖家，先只在门口骂卖国贼。曹家人出来回骂，才闯进去打骂国贼。曹汝霖和陆宗舆从后门溜走了，章宗祥挨了打。但曹家的人即刻护送章宗祥进了同仁医院。这边学生还在捣毁。

在曹家附近被捕去的约有同学三十人，捕人的有穿便衣的也有穿警服的。

被捕以后监禁在步军统领衙门，地点在前门里公安街，当年叫“户部街”。步军统领衙门是满清政府遗留下来的旧制，专欺压老百姓，不说明理由。这时候的步军统领是李长泰，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人。

步军统领衙门的监房极拥挤肮脏，三十人在一室内。室内有小便木桶，满屋臭味。所幸住了一夜以后，第二天就离开了这里。

据许德珩同志回忆，当时离开步军统领衙门，是和另一个同学，两人被绑在板车上推出去的。许德珩同志说，他当时满心以为这是往天桥去的，所以一出步军统领衙门，板车向南推去，他心里想着：“再过二十年又是一条英雄好汉！”这话虽没有说出来，这心情却完全体会到了。

不料板车向南推了一段，就向东拐弯进入一个大门，这是京师警察厅。京师警察厅的监房并不比步军统领衙门的好，但略宽些。大房间四角的两角上，各有一个尿桶，当中另一木桶是盛洗脸水的。这时同学有一个普遍的心情是：在步军统领衙门随时可以被枪毙或杀头，到京师警察厅以后可能要文明些了。

京师警察厅一个一个的传讯被捕同学，时间每人不同，有很长的，也有很短的。传讯不外一个目的，就是要想知道谁是指使的人。但同学心里明白，自己就是自己的指使人。

在京师警察厅中，似乎有三件小事还约略记得：各校长有前往慰问的，各校长向京师警察厅再三请求保释，校中也有代表送食物去的。5月7日上午十一时余，各校校长分头将学生保释出来了。

汉花园红楼北面的广场里放了五张方桌，北京大学全体学生都在广场上等候着被捕同学的归来。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借来了三辆小汽

车，每辆都装满了人。我在红楼门外远远望见三辆小汽车出沙滩来了，即刻回到广场上的同学队伍中，三辆车里面的被捕同学大约十二人至十四人，全体站立桌上和同学见面。情绪紧张万分。因为太紧张了，被捕同学没有一人说话，在校同学也没有一人说话。当时大家只是热泪交流。

“还是快去休息一下罢！”这句话不知道是谁说的。被捕同学从桌上下来，向南走到红楼的休息室中去了。休息室中除被捕同学以外，有蔡元培先生，也许还有一、二学生会的工作人员。据说蔡先生当时还削了一个梨给一位被捕同学吃呢。

被捕同学已经释出，五四运动是否到此结束了？不然，大不然！这样想的是当时的北洋军阀政府，这样想的是不知道当时运动的实际情况的人。

五四运动并不开始于5月4日。它的准备阶段可以上溯到5月3日晚上的大会，5月1日晚上的小会，一步一步地再追溯上去，1918年10月李大钊同志写《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1918年4月鲁迅先生写《狂人日记》，一直到1917年11月7日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

5月4日的风暴，把全国几十万乃至几百万学生组织起来了。被捕同学释出以后，正是学生自觉能力薄弱，做不了什么大事，必须面向工农群众，从此开始努力的时候。北京的学生联合会进一步活跃了。上海的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了。青年同学从此走向工厂，走向农村。两年以后成立中国共产党，有了领导革命的工人阶级和它的先锋队，十月革命指导下的中国革命才真开花了。

（原载《人民文学》1954年5月号第55期，第118～120页）

回忆五四

杨振声

旧日的北京大学，确是个古气沉沉的老大学。只是在1916年后，蔡元培先生来作校长，才带进了清新的空气。来自全国各地旧家庭的青年们，多少是受过老封建的压迫的，特别是在婚姻问题上。在学校接触到欧洲资产阶级的文化和思想，在蔡先生所倡导的自由学风下，对旧道德、旧文学嗅到了那股陈腐的气味。更重要的是，象春雷初动一般，《新青年》杂志惊醒了整个时代的青年。他们首先发现了自己是青年，又粗略地认识了自己的时代，再来看旧道德、旧文学，心中就生出了叛逆的种子。一些青年逐渐地以至于突然地，打碎了身上的枷锁，歌唱着冲出了封建的堡垒，确实感到自己是那时代的新青年了。当时在北大学生中曾出版了《新潮》、《国民》两种杂志，作为青年进军的旗帜，来与《新青年》相呼应。

新事物的生长必然要经过与旧事物的斗争而后壮大起来的。五四运动前夕的北大，一面是新思想、新文学的苗圃，一面也是旧思想、旧文学的荒园。当时不独校内与校外有斗争，校内自身也有斗争；不独先生之间有斗争，学生之间也有斗争，先生与学生之间也还是有斗争。比较表示的最幼稚而露骨的是学生之间的斗争。有人在灯窗下把鼻子贴在《文选》上看李善的小字注，同时就有人在窗外高歌拜伦的诗。在屋子的一角上，有人在摇头晃脑抑扬顿挫地念着桐城派古文，在另一角上是几个人在讨论着娜拉走出“傀儡之家”以后，她的生活怎么办？念古文的人对讨论者表示憎恶的神色，讨论者对念古文的人

投以鄙视的眼光。前面说过学生中曾出版《新潮》与《国民》，但同时也出版了与之相对立的《国故》。这三种杂志的重要编辑人都出在我们五四那年毕业班的中文系。大家除了唇舌相讥，笔锋相对外，上班时冤家相见，分外眼明，大有不能两立之势。甚至有的怀里还揣着小刀子。

当时大多数的先生是站在旧的一面，尤其在中文系。在新文学运动前，黄侃先生教骈文，上班就骂散文；姚永朴老先生教散文，上班就骂骈文。新文学运动时，他们彼此不骂了，上班都骂白话文。俞平伯先生同我参加《新潮》杂志社，先生骂我们是叛徒，可是我们不怕作叛徒了，旧道德变成那个骗娶少女的死鬼牌位了！时代给我们一股新的劲儿，什么都不怕。辜鸿铭拖着辫子给我们上欧洲文学史。可是他哪里是讲文学史，上班就宣传他那保皇党的一套！他在上面讲，我们就在下面咬耳朵。

“他的皇帝同他的辫子样，早就该斩草除根了！”

“把他的辫子同他的皇帝一块儿给送进古物陈列所去！”

在新旧的相激相荡中，一部分搞新文学的人们无批判地接受欧洲资产阶级的思想与文化，更无分别地排斥自家的旧的一切，这偏向产生了不良的后果，但在当时，这种矫枉过正，也使他们敢于自信，更有力地打击了敌人。新文学终于在斗争中成长起来，为五四运动奠定了基础，同时五四运动更充实了新文学的内容，给它以真正的生命。

在五四时，我们还认识不到帝国主义与封建统治的内在联系性。但我们粗略地从历史看出：没有内奸是引不进外寇的。袁世凯想作皇帝，才签了卖国的二十一条。北洋军阀又都是和帝国主义相勾结的，当时的当权军阀段祺瑞是亲日派。事实教导我们，把内奸与敌国联系起来了。当时的心情，恨内奸更甚于恨敌国，因为他们是中国人！

日本的二十一条象压在人民心上的一块大石头，总想掀掉它，青年们比谁都难忍受。1919 年 1 月召开巴黎和会，中国提出取消二十一条及从战败国德国收回山东权利，这是中国人民的呼声也是正义的要求。4 月底传来了巴黎和会拒绝我们的要求的消息，在青年心中烧起了怒火。5 月 3 日晚间在北大第三院大礼堂召开各校代表大会，决定 5 月 4 日上午在天安门开大会。

5月4日是个无风的晴天，却总觉得头上是一天风云。各校的队伍向天安门汇成五千多人的示威洪流，青年们还是生平第一次参加这样声势浩荡的群众运动。这洪流首先卷向东交民巷，向帝国主义者示威。队伍中响起愤怒的口号，飘扬着各种的标语："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废除二十一条"、"惩办卖国贼"、"拒绝签字和约"、"收回山东权利"……这些口号，这些标语，都象从火山口里喷出的烈火，燃烧着每个青年的心。

大队进入东交民巷西口，帝国主义者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拒绝我们通过。洪流的怒潮就转向赵家楼卷进，卷向在二十一条上面签字的卖国贼曹汝霖的住宅。进了巷子，队伍挤了个水泄不透。

我们的队伍自天安门出发，警察是始终跟在我们的周围的，到了赵家楼，一些警察就集合起来，保护着曹家紧闭的大门。而重要的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又恰好都在里面。群众的怒火是挡不住的，我们终于冲破了警察的包围，打进了大门。失算在于忘记堵住他的后门，学生前门进去，曹、陆二贼后门溜掉了。章宗祥逃跑不及，群众打了他个半死。搜索到下房，有人发现半桶煤油，就起了"烧这些杂种"的念头。

火发后大队就渐渐散去了。留在后面的被他们捕去了三十二人。当时还是无经验，若大家整队而入，整队而出，警察是捕不了人的。

5月7日被捕学生出狱，北京学生联合会为便于继续奋斗起见，出了个《五七周刊》(五七也是日本在1915年为二十一条要求提出最后通牒的那一天)，它是一种小报形式，学生们在街头讲演时，可以随时分送给人的。记不清出到第二期还是第三期，就被警察扣留了。学生联合会派了四个人去警察总署办交涉，要求他们还我们的报。

警察总监吴炳湘用又长又臭的话，夹软带硬地训了我们一顿，我们还是要他还我们的报。

"你们煽动军警造反!"我们知道这是因为学生在街头讲演时，也有军警站在人群中听，而且在最近周刊上有一篇《告军警书》。他们有些惴惴不安起来。我们还是要他还我们的报。

"怎么?"他的脸红涨得象灌肠。大叫："给我扣下!"我们就被押送到一间阴湿发霉的小屋子里去了。

苦闷的是与外面隔绝。要报看，他们不给，要谈话，他们不准。我们盼望能有同学来通个消息也好。后来知道同学确曾来过，他们不让见。我们放心不下的是外面的运动，要知道的是外面的消息。但我们被隔绝了！成天躺着，两眼望着那小小的纸窗，它透进了外面的光明，可是遮住了外面的一切！

望倦了，我闭上眼，五四前夜各校代表大会上热烈的发言，天安门前胜利的会师，大队卷向赵家楼的壮举……一幕幕在我眼前出现了。我翻了个身，放枪的日本水手，要少女为妻的死鬼牌位，隐约中还有那警察总监涨怒的肿眼泡子，在我将入睡的朦胧中，都迷迷离离，成为模糊一片了。

一个星期以后，我们被释放出来。运动在发展着，扩大着，街头上讲演的学生更多，听讲演的人群也更大了。我们当时还不知道反帝反封建这个正确口号。可是“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目标，实质上是反帝反封建的，也就表现了全国人民的要求。所以到“六三”运动时，上海各厂工人罢工，唐山、长辛店、沪宁路的铁路工人罢工，与学生运动汇成了洪流。上海及其他商埠商人也举行罢市。运动的队伍壮大了，已发展成为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了。

（原载《人民文学》1954 年 5 月号第 55 期，第 105～106 页）

五四期间北京第三次请愿活动的回忆

张静庐

五四运动期间，北京先后有过三次群众性的请愿活动：第一次在5月，第二次在8月，第三次在10月。我所参加的，只是其中的第三次。

第三次请愿最初系由山东学生发起，时间大约在8、9月之间。那时段祺瑞正在和日本勾结，准备缔结一个中日防共协定，把国家的权利拍卖给日本人。当时山东的形势紧张，大家惶惶不可终日，因此山东的学生最先出来组织、号召。他们斗争的口号是："反对西原借款"、"反对出卖胶济路"、"反对段祺瑞组阁"和"反对成立边防军"等等。山东军阀马良深恐这个运动展开，会予自己不利，下令全省戒严，严厉取缔人民群众的一切爱国活动，违者就要按军法办理。山东学生受到压制，派代表来天津，请天津各界人士给他们援助。

当时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会和各界联合会总会都设在上海，这个运动如果由它们来主持、发动，可能有更大的影响，于是天津学生联合会派出代表和他们一同前往上海。由于他们的提议，上海全国学生联合会邀集各团体代表开了一个联席会议，大家约定号召全国各地派代表到天津集合，讨论声援山东学生和进京请愿，以阻止段祺瑞反动政府出卖山东领土、主权。

不久，上海各界派出了四个代表，这就是冯复光（全国学生联合会代表）、裴国雄（上海学生联合会代表）、姓唐的（上海商界联合

会代表，名字已记不清了）和我。冯复光当时是北洋大学的学生，天津学生联合会的代表，来上海后又被推为全国学生联合会的代表（此人现在在中央文史馆工作）。至于我，当时在上海救国十人团联合总会所主办的《救国日报》担任编辑（该报系内部刊物，不公开发行，与先一年归国留日学生于上海所创办的《救国日报》不同，两者不是一回事情）。这次去天津开会，我就是以上海救国十人团联合总会代表的名义参加的。

9月中旬，上海、南京、天津、烟台、青岛、济南、湖北等七个省区先后派出代表前往天津，内中除湖北代表施洋等二人因故不及赶到外，其他六个省区一共来了三十一人。9月20日，我们正式在天津集合。

9月下旬，我们三十一人于天津法租界一个教堂的地下室内先后召开了三次秘密会议，每次都系晚上十二时以后举行。会上我们曾就进京请愿的内容和进行的步骤，作了具体的规定。

北京各界没有派代表参加这次会议。为了扩大我们的声势，我们于月底来北京以后，曾于9月30日找他们联系，请他们和我们共同行动。那时北京学生联合会的总干事是北大理学院的学生张国焘，我们约他以及北京其他几位代表到米市大街的青年会来开会、讨论。

张国焘是反对请愿的。在这次会上，他公开表示请愿不会有什么结果，主张北京学生会不参加这个活动。我们则认为请愿虽然不一定有结果，但这个行动却可暴露段祺瑞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相互勾结的阴谋，可以阻止对日的“直接交涉”，以及激起全国人民的注意，意义十分重大。但是，张国焘依然坚持自己的意见，因而在会上引起了争执。我记得，那次和张国焘争辩得最激烈的就是天津的学生代表黄正品，他坚决主张按原订计划进行，破釜沉舟，也在所不顾（黄正品就是后来的黄爱，湖南人，他以后在湖南搞工人运动很有成绩。他本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由于受了毛主席的感化，最后皈依马克思主义，加入了共青团。白色恐怖期间，他被湖南军阀赵恒惕逮捕杀害）。这次会议的结果，北京学生联合会还是决定不参加，上海学生联合会代表裴国雄也没有征得上海学生联合会的同意擅自宣告退出，会议终于不欢而散。

10 月 1 日上午八时，我们剩下的三十位代表于中央公园（今名中山公园）来今雨轩集合，公推烟台代表孙宪也老先生领队，率大家向新华门总统府进发。这时我们已准备好一份请愿书，上面写着代表们的名字，我的名字列在最先，因此有的同志和当时的反动政府误以为我就是这次活动的领导人，其实并不如此。那时总统府外有一道铁制的栏栅，里边有武装卫队防守。当我们从东辕门进入铁栏以后不久，东西辕门就被关上。这时铁栏的外边已经挤满了群众，周恩来同志所率领的一队学生也从天津赶来了。他们被阻在铁栏的外边，和我们里外呼应。在铁栏杆内，除了我们代表以外，还有一个新闻记者。我们向总统府递了请愿书，并且要求徐世昌（总统）出来和我们回话，但没有得到什么结果。

我们一直等到下午三时，总统府才派了一个名叫曾毅的参议出来。他告诉我们：徐世昌正在开会，不能外出，有什么要求可以由他转达。我们当即表示：他不是我们请愿的对象，也无权代表总统，因而要他立刻回去。他不肯走，我们就赶他；他先后出来三次，赶了三次才没有再来，以后也再也没有人出来了。

我们挨到晚上八点钟左右，还不见有人出来，肚里饿得咕噜直响，幸亏外面还有天津和北京的学生们援助我们，给我们送来了面包点心，才没有饿着。这时天津代表郭隆真（女学生）气愤不过，一口气爬到总统府前面的石狮子上，朝着里面破口就骂，骂徐世昌是卖国贼、王八蛋。其余的人这时也分成四个小队，爬到铁栅上向栅外的群众演说、喊口号，群众激动地响应着，整个新华门内到处都是一片愤怒的呼声。

快十点了，警察总监吴炳湘率领大队武装警察和便衣警察赶来，一进门就把我们团团围住。他命令我们立刻自动退出，否则就要下令逮捕。我们并不害怕，表示：如果请愿没有结果，我们决不离开。吴于是下令捉人，三个架一个地把我们拖往公安街警察总监处。我们一路高呼口号，后面的群众也跟着大声叫喊，一直喊到警察总监的门前。

进入警察总监以后，就在警察的宿舍内暂时停下。警察们对我们很客气，一面倒水，一面还给我们解释他们不得不逮捕我们的理由。

他们抱歉地说：他们很同情我们的行动，但是由于职责在身，一切只能奉令行事，对于我们实在“爱莫能助”。

不久，吴炳湘正式开堂提讯我们中的三、四人，其中就有黄正品和我，这也许是因为我在请愿书上“名列前茅”的原故。吴炳湘很想在我们之中找出一个为首的人。他问我们：这次请愿，是谁主使？我们回答：爱国出自本心，并非由于别人主使！大家众口一辞，他也莫可如何。吴炳湘老羞成怒，拍桌大骂，喝令将我们押出。

半夜里，黄正品和我等九人被押至天桥鹞儿胡同侦缉队，另二十一人则被关在警察厅（一名警察总监）和保安队内（同时被捕的那位记者，这时想已被开释）。侦缉队的囚房，看去很像一座座阴森森的地狱，里面又黑又臭，脏不可言。队长姓马，绰号活阎罗，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过去多少爱国的同胞，就曾在他的手里丧失了自己的生命。他对我们很坏，态度也最凶恶。我们九人被关在一间小屋内，裤带和一些重要的衣物都被搜走。每逢我们疲倦得想睡的时候，他就来提讯我们，先后提讯了两次。在讯问时，有一个同志顶撞了他几句，他就立刻下令把他单独关在另一间小屋内，而且还戴上了脚镣手铐，以后也就不再提讯。我们不堪马活阎罗的虐待，于10月10日（当时的国庆节）曾同盟绝食一天，以表示抗议。结果，他们答应每天派人给我们买一次报纸，总算是得了一点改善，使我们知道一些外间的情况。

11月1日，马活阎罗下令释放我们。当我们走出侦缉队的大门时，就看到北京学生联合会派来迎接的代表。他们在中法大学给我们开了一个盛大的欢迎会，还给我们照了一个全体像。不久，我们回到了天津，天津各界联合会也开会欢迎我们，而且还给我们买了车票，送我们各回原处。

我回到上海以后，宁波各界联合会推举我为代表参加全国各界联合会总会（会址在法租界八仙桥永乐里）。在那里，我会到了赶来参加的湖北代表施洋同志，这时他也参加了全国各界联合会总会，并且已早我几天在那里工作。

1920年5月6日，段祺瑞卖国政府勾结法帝国主义者将设在法租界内的全国各界联合会总会和上海学生联合会封闭。

这一次的请愿运动，主要为的是山东问题，也就是阻止段祺瑞卖国政府企图通过“合法”条约承认日本在山东代替战败的德国所获得的一切特权，并再加以扩大，以便取得胶济铁路的管理权和驻兵权；武装段的亲信徐树铮建立所谓“边防军”，充任反对苏联的先遣队，反映了当时全国人民的要求。这次请愿，虽然遭到了当时卖国的段祺瑞政府镇压，但是他却有力地揭露和打击了段祺瑞反动政府的卖国罪行。由于这次运动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声援和支持，在全国人民一致反对卖国的呼声之下，结果当时的反动政府，也不敢再公然实行“直接交涉”，在 1920 年 5 月 22 日，给了日本侵略者一个复牒说“未便与贵国开议”。尽管段祺瑞政府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出卖国家领土主权的拍卖没有成交，但是，经过这次运动，全国人民对段祺瑞反动政府的面目和帝国主义的阴谋，认识得更加清楚了。以后不久，在我国就出现了共产主义小组，在 1921 年 7 月 1 日成立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革命的面貌也就焕然一新，工人、学生的爱国运动此起彼落，终于推翻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掀起了人民革命的高潮。

（张静庐先生口述，康右铭记录、整理）

北京高师参加五四学生游行示威的情况

于　力

日本帝国主义处心积虑地想着灭亡中国，差不离是经过五十几年的充分准备，慢慢来下手的。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民气一时高涨，但是不久，日本帝国主义就在中国找到它的适当的代理人，那便是北洋军阀和清朝腐败官僚的残余势力。为了反对窃国大盗袁世凯以"帝制自为"作交换条件而承认日本迫胁中国的二十一条，为了反对杀人凶手段祺瑞出卖民族利益的边防军借款，以及为了安福系官僚政客无数祸国殃民的亲日丑恶罪行，人民悲愤愠怒的心情，几乎积压了五六年，一直是在被抑遏着无处发泄的。在中国的文化界是继承着戊戌政变、辛亥革命两个时期的革新思想，更加上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以及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联合成为文化革命统一战线，共同向着中国封建思想作斗争的革新运动，就以当时北大文科学长（就等于今日的文学院长）陈仲甫氏（独秀）和李大钊先生等主持出版的《新青年》为阵地，反对"吃人的礼教"，"打倒孔家店"，提倡新的伦理道德，高呼"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揭示"德摩克拉西"的民主主义思想和"赛因斯"的科学思想方法，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等。总之，那时的知识分子特别是知识青年，每一个人没有不是蓄积了一肚皮的不满现状的情绪，就等待着找个机会去清算。刚好，驻日公使安福系的要员章宗祥兴匆匆的从东京回国，报告对日借款的条件，而安福系的

机关报纸《公言报》，又大吹大擂地歌颂着这个出卖国家利益借款反人民行为的成功，刺激着全北京全中国广大爱国青年再无法抑制的愤怒，掀起了辉耀近代史的五四运动，后来就成为全国范围的学生运动。从这时起，就提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对日借款、打倒安福派卖国贼等等口号，和扩大抵制日货的行动，展开了对帝国主义侵略者和国内的封建势力英勇的斗争。

五四运动的前夕，那时在北京城内的最高学府里，以国立北京大学为首的知识分子们，早就有了指导自由研究学术各种的团体和刊物，如前述《新青年》杂志就是站在领导地位的权威。至于一般知识青年，也都有了自己的组织，如由黄凌霜所主持的实社，曾出过几期《实社自由录》并翻印巴枯宁、克鲁泡特金、托尔斯泰等人著作，还有由傅斯年所主持的新潮社也曾出刊过几期《新潮》，另有以施存统为首的工读互助团也有过刊物。在国立北京高师，则有徐名鸿、刘熏宇、周卫群、匡日休、向大光、杨荃骏、周予同、张石砾、陈荩民、常乃德诸君发起以半工半读的泛劳动主义作标榜的工学会、后来又转为平民教育社的团体组织。在工学会里也曾出刊过几期的《工学》杂志，笔者便是其中主持者之一。并曾为了给《工学》写文章，和革命先烈赵世炎君引起辩论，后来又成为相识的一段因缘。今天回忆起来，当时虽然是幼稚得可以，却也充分表现了追求真理的那种真挚的热情。那时的刊物直如“雨后春笋”，一时数也数不过来。

五四运动最初是由北大和高师等校学生发动起来的。还记得在五四前一天的整日间，有些人是在为着翌日天安门开大会的准备事项而忙碌着：印传单、糊小旗、编口号和计划游行路线等等工作。晚间，高师操场北端的西花厅里，会集着以工学会为基干的十几个青年，秘密地宣布明日游行后，还要前往东城赵家楼胡同安福系巨子曹汝霖的住宅去示威的计划，并布置届时分给各个人应担负的任务。

1919 年 5 月 4 日，北京高师的同学们在要求学校舍监部准许提前吃过午饭以后，全校同学便集合出发了。天安门的杰阁巍阙、朱垣飞甍代表着祖国的庄严气象，在春光明丽的广场前，聚集着这个祖国的大群蕴怒的儿女，阖城数千个各大中学校青年学子，发出震天的吼声！这是中华民族开始在觉醒。爱国热情的洪流，开始在激荡。伟大

的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开始燃起第一门号炮。广大青年群众开始游行了。

走向赵家楼的行列拥塞在窄小的街巷里，紧闭着的大门，被捣开了，大队的青年一拥地冲入院中。曹汝霖和他的家人都从后门逃脱了，只看到京奉铁路局的局长丁士源（是安福系的祸首之一）、黑色外衣的驻日公使章宗祥狼狈地从庭院里逃出了角门。院中一部崭新汽车，早被同学们捣毁。于是大队的武装警察开到了，青年们才陆续散去。笔者也就由人丛里跑出了胡同。这一役，学生被捕去十余人，仅在高师一校，就有熊梦飞、向大光、陈荩民诸君等六人同时被捕了。

各大中学校为了援助这次的学生运动，学生会是组织起来了。在罢课期间的每日里，都是三五个人一组，划分地区，站立在热闹冲要的街市上，向商民讲演爱国意义，散发各种各样的爱国传单、强烈地宣传抗日运动的图画和文字。以后一连几天又联续数次的想开群众大会而被警察强迫解散，被武装的保安警察逮捕围闭在天安门去，被逮捕挟送到北大第三院的校园中去。几次都是通宵达旦，忍饿忍寒，坚决地在和政府相持。一面写文章，拍电报，继续街头讲演，营救被捕同学，被捕诸同学终于获得释放。在被捕同学从警察厅回校的这一天，校门前站立着全校欢迎的行列，被捕六同学下汽车后，同学们立刻把他们六人举在肩头，簇拥着抬进了学校大立门，扛抬到一直作为礼堂用的风雨操场里，开了一个盛大的欢迎会。这说明了统治者的逮捕镇压，是更加兴奋了学生运动的热情，并没有把学生运动的浪潮压服下去。

这之后，各地方的学潮就此起彼落、风兴云涌地继续不绝。在政治上不单是抵制了亲日分子的阴谋，那时的徐世昌政府虽然对于曹汝霖等的辞职，温词慰留，借以敷衍段祺瑞，但“清议”的力量，毕竟可畏，不得不迫使安福系劣迹昭著的几个祸首不好再活动下去。直到1920年遂遭到直隶派吴佩孚军的乘机进攻，这批城狐社鼠才随了元凶段祺瑞一齐下台（可是由于中国政象的混扰和反动势力的强大，到1924年，段祺瑞却又卷土重来，制造了一个三一八大惨案，做完了凶手，才重又滚蛋而去）。另一方面在思想上和文化教育上却展开这一个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运动，它是在为1921年宣告成立的中国共

产党准备下的思想基础和干部训练，它又是在为五卅运动与北伐战争开拓了前进的基地和成功的先河。

这之后，中国的革命运动，才得辨认清楚了正确的方向。虽然这个运动的中坚，在当时由于没有工农大众来参加，所以不等多久，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袭击和包围；不等多久，这个运动的右翼分子就抢先掩旗息鼓退出了阵地，而他们之中的“健者”就大部分软化、妥协，并且站到反动方面去了。

然而，这之后，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并不因此而搁浅，相反地倒经历了考验，学多了本领，依然继续着五四运动的启蒙之功，主动地担承了这个新生的伟大使命。这就是中国无产阶级和他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登上了中国政治舞台。伟大的人民领袖毛泽东先生不是说过么：“五四运动以后二十年的进步，不但赛过了以前的八十年，简直赛过了以前的几千年。”我想这话是完全正确的。

（原载《北方文化》第 1 卷第 5 期，第 5～7 页，原题《五四回忆》）

五四杂忆

杨　晦

十月革命的影响使中国起了变化，北大也有新的变动。就在 1917 年初，北大换了蔡元培来当校长。蔡先生才来的那年上半年，还看不出怎么样，新设施大都从 1917 年暑假开始。我也是那时进北大的。

蔡先生是前清翰林，思想却较开明，曾出国留德留法，也办过中学小学，在国内很有声望，学术上地位也很高。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生成立临时政府，请他当教育总长，鲁迅先生当教育部佥事就是他找去的。他认为在当时的中国，大学教育是个根本问题。到北大做校长第一年，他就请了许多当时头排的有名人物来，象找陈独秀当文科学长（等于文学院院长），找李大钊当图书馆主任。许多第一流的学者，都集中在北大，这造成北大同学有些“老子第一”的优越感。当然，集中了这些学术思想方面的优秀人物在北大，也必然起影响。那年暑假，他无限制地招生，前后招了三次。我就正赶上第三次考试，直接考进了北大本科哲学系（当时是哲学门）。那年北大学生人数也增加不少。11 月 16 日，北大出版了《北京大学日刊》创刊号，这在当时看来是了不起的事，学生教师很多活动就通过《日刊》进行。还有象改革大学制，由教授组织评议会（象现在的学术委员会）等等改革，对当时的大学教育都起了很大影响。

学校中的活动也很多，成立了很多社团。象书法研究会，画法研究会，音乐传习所，学生储蓄银行，同学集股办的消费公社，在马神庙路北，后来未名社还用过那房子。还有新闻研究会，由校长秘书许

宝璜主持，《京报》的邵飘萍在五四前一段期间，每星期日来给我们讲他的新闻采访经验。这个会与五四很有关系，毛主席也参加了，蔡校长对它特别重视。还有些活动，今日的青年听着是要好笑的，如静坐学会，每个人带一个蒲草垫，去听蒋竹庄的讲演。

当时北大的一般学生，从表面上看，生活是很陈腐的。当时只有三个宿舍：东斋、西斋和八旗先贤祠。住的人不多，好些学生都住在周围的公寓里。公寓生活有一种特殊的情调，是现在的同学很难体会的。无论住在宿合里，住在公寓里，都是自由的，谁也不管，谁也管不了。北大学生听戏、捧角、逛胡同都很著名，在这方面，是跟当时的参、众两院齐名，有所谓"两院一堂"的话。但是，在学术上，在政治上，这种环境在许多学生中也孕育着一种进步的、革命的、新的思想与活动。谁也不来管你，巡警见了北京大学几个字，连忙离得远远的，不敢惹。因为从前清末年起北大一直是"最高学府"，有些政治势力。

这样的北京大学，在当时的军阀统治下，在学术思想活动方面可以说是个中心，十分活跃。

当时北京最有势力、销路最广的报，是日本人办的《顺天时报》，它净挑拨造谣，副刊上有什么《儒丐》的小说、妓女的歪诗歪词等，都乌七八糟的。还有《白话报》、《晨钟报》、《国民公报》等，比《顺天时报》好，却也好不到那里。有次报上披露了日本对华一万万元贷款的事，北洋军阀一天中封了七个报馆、一个通讯社。《晨钟报》复刊后改为《晨报》。孙伏园编《晨报》副刊，鲁迅经常在那上面发表文章，后来的《阿Q正传》也是在那上面发表的，这个副刊起了很大作用。《晨报》还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资本论》等，李大钊先生在《晨钟报》创办时当过短时期的主笔。

北大校内的学术思想活动，每天出版的除《日刊》以外，最灵活的是在斋舍的影壁上、墙上，张贴布告，有人发出号召，就有人响应。那时，说开会，就有人去。开会的地点，大点的在饭厅里，要说什么，就站在板凳上说起来。刊物在1919年初，特别活跃起来。1月里，《新潮》出版，是进步学生与进步教授联合办的；还有《国民》杂志，筹备早，出版却比《新潮》晚些。主要负责人有现九三学社主

席许德珩等，不过参加的人范围不限在北大内。中国文学系出了《国故月刊》。还有《北大月刊》，发刊辞是蔡先生写的。其中，《新青年》的历史最久，影响最大。这本来是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后来成为北大教授的同人刊物，每期轮流编辑，团结了教授中的进步力量，在五四运动时期，是新文化运动的旗帜。其间思想斗争很激烈，表现在《新潮》和《国故》两方面。在校外是林琴南的反攻。无政府主义在当时很流行，很多人都受过它的影响。

在这表面上很复杂、很分歧的情况下，新的力量正在暗中成长。各种思想都很活跃。隐隐之中却有个最活跃、最主要的东西。现在一提到思想领导，常常使我回忆起当年的情形来。象李大钊先生，貌不出众，言不惊人，然而他在校中的威望影响，却出于文科学长陈独秀之上。他的《青春》、《庶民的胜利》都是传诵一时的。毛主席当时是图书馆职员，但李先生就很重视他。邓中夏等同学组织了平民教育讲演团，就在五四运动爆发后一切社团活动都停止了的时候，他们还分组在茶馆、街头去向市民演讲。当时还为工友们办了校役夜校，给他们上课。后来游行时他们也自己编成一队参加了。中心势力就是这么逐渐形成的。

当时国家内忧外患，对年青人刺激极大。我记得在小学里就总感到中国有被瓜分的威胁。中学时读《饮冰室文集》，读到《意大利建国三杰传》等，非常向往。有次还约上两个朋友，打算在关帝庙插香为盟。总之，要爱国，并且结合爱国追求一点什么东西。到底那是个什么，却不很明确。来北京上大学后，也不知谁是进步的，也不知什么是有用的，什么都要去搞一搞，到图书馆看见书，都想翻一翻。

五四运动的直接原因，当然是巴黎和会上的山东问题。当时情势，中国最后非得签字同意不可，热血沸腾的青年们气得实在受不了。国际上也有影响，最重大的是十月革命，记得《新青年》上介绍马克思战斗生活的文章，非常感动我们。《晨报》上刊出文章介绍《资本论》等，即使看不懂，也剪下来保存着。国际工人运动在 1919 年前后，气势也很蓬勃，朝鲜的三一起义，就在五四前不久。

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这三个人，是安福系有名的卖国贼。五四前不久，在当驻日公使的章宗祥带着日本小老婆回来商量卖国，留

日学生跟送丧似的送他，白旗插了一车厢。5 月 3 日，各校代表和北大同学在三院礼堂开大会，情绪激昂，发言很踊跃。后来有人上台提议说：留日学生可以那么对付章宗祥，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对他们（曹、章、陆）三个来一下？大家一致同意，准备行动。当夜，西斋的同学一夜没睡，用竹竿做旗子，长竹竿弄上大旗子，短竹竿弄上小旗子。第二天，北大学生每人手里都有个旗子了。队伍前面，举着白布挽联。到天安门，停了好久，演说，喊口号。还准备了个英文说帖，派代表交给英美大使馆去，请他们支援我们的正义要求。当时对英美特别是美国还存在幻想。

穿出去之后，就一路到了东单、东四。大家知道还去赵家楼，情绪又振奋了一下。到了那里，住宅是早打听好了的，在路北，里边约有十个八个卫兵、警察。我们上去打交涉，要曹汝霖出来，他怎么也不肯出来。大家有气无处发泄，就用旗竿把沿街一排房屋上的瓦，都给揭下来，摔了一地，却没留下一片瓦，全叫我们隔着墙抛进院里去了。“揭竿而起”大约就是这样子的吧。后来有些人从窗口爬进去了，从里面打开大门，大家一哄而入，可找不到人，便打东西。打了一会，有许多人从月洞门拥到东边的院子，是一个花园的样子。章宗祥从里面出来，大家以为是曹汝霖，都上去打，把他打得头脸出血，倒在地上。有些记载说他是装死，不过那一顿也够他受的。有细心的同学，先切断了电话，取下客厅里挂的曹汝霖的照片来一对，原来不是曹汝霖，人就散开了。

不久，起了火，火怎么起的，始终不知道。在场的警官打电话给警察总监，原来他们不敢动手的，这时才叫：捕几个吧。但学生已经一批一批地走了，留下的已经不多，结果捕走了三十二个。那时大家可没有斗争经验，一听说捕人，有的跑掉了鞋的，有跑掉了眼镜的。

当天晚上，学生在三院礼堂开大会。三院礼堂并不大，在当时觉得大的很，这天晚上里里外外挤满了人，蔡校长也到了会。他对我们说：发生这种事，他要引咎辞职，不过一定负责把三十多个学生保释出来。这次大会表现了青年学生们的爱国主义的情绪，已经集中在对卖国政府的痛恨上。蔡校长联合各高等学校校长等去保释被捕去的同学。但听说，本来当天要放的，因为这一保释的活动，引起政治上派

系的猜疑暗斗，反倒不放了。三天后，是5月7日，是个国耻纪念日。到这一天，北洋政府害怕再闹别的事，就把人放了。

那几天，南方北方罢工、罢课、罢市，北洋政府狼狈之至。6月10日报上登出罢免曹、章、陆的新闻。另外留法学生包围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结果，中国算是没有签字。五四运动到这里告一段落，剩下的是请蔡校长回校。而学生运动、新文化运动就跟着在全国展开，扩大到各个地区去。

五四在学生中有广大的统一战线，其一致的目标是：爱国，打倒卖国贼。其次是新文化运动，其中分有搞社会革命与文化革命的，五四后不久，问题与主义的讨论，已有了分裂的苗头，搞社会革命的组织了马克思主义小组，深入工人运动。这样，两年后，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原载《中国青年报》1957年5月4日第3版）

前事不忘

郑振铎

五四运动发生于中华民国8年5月4日，那一天是礼拜天。我的家住在赵家楼附近。饭后，午睡才醒，就听见有人说，外面失火了！我起来，跑到一个空场上去看。空场的一角是个“巡警格子”。浓黑的烟中，夹着血红的火焰，突突的向上冒。

“是哪一家失火呢?”我正这么想，忽见一个巡警头上受了伤，裹着白纱布，由两个同伴扶着，进了那个“巡警格子”。过了一会儿，看见一个学生模样的人，穿着蓝布大褂，飞奔的逃过来。几个巡警在后追着，追到空场上，把他捉住了。

我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但知道一定是一件大事。

第二天看了报，才知道昨天几个大学里的学生到东交民巷去示威，不能进去，便转到赵家楼曹汝霖家。曹汝霖是当时的交通总长。他不肯出见，紧紧闭上了门。学生们便打了进去，曹已经从后门跑掉，却把已避入邻近小铺子里的章宗祥找出来打了一顿。后来大队警察来了，学生们陆续的回去。不知怎样便起了火。学生被捕了二十多人。

那天我到了学校，和同学们商量，便立即参加了当天组织起来的学生会。

后来知道打赵家楼的事并没有多少学生参加，在3日晚上，决定到东交民巷去的只有北大、师大和法政学校。到4日学生被捕的事一发生，参加的学校便多了，几乎所有北京的大学校全都加入，还有好

几个中学校也加入，事态扩大了，许多学生出发到街头讲演。代表们天天开会。

开会的地点时时变更，恐怕有人注意。代表们往往有人在后“钉”着。当时认为比较安全的地点是几个教会学校。所以，我们常在东城的汇文开会，开会的时间总在晚上。一个个的溜进去，开完了会，又一个个的溜出来，不敢成群结队的走。

我们都是第一次从事于学生运动和组织工作的，所以一切都很生疏。但是，议决了，便去做，谁也不推诿，谁也不躲避。虽然行动很谨慎小心，却绝对不故意的躲避危险。

被派出去讲演同学们都高高兴兴出发，借了店家的板凳，站在上面，对好奇的群众大声疾呼的讲着、讲着。看见警察来捉人了，便从凳上走下来，跑进店堂里，有时就从后门溜走，但被捕的也不少。不过，越是有人被捕，自告奋勇的人越多。

学生会议决派代表到天津去，到上海去。天津上海的学生们也都发动了。

6 月 3 日，上海为了抗议学生们的被捕，发生了大罢市。

北京政府不得已，只好把被捕的学生们释放出来。然而学生运动并不因此停止，却更有组织更有力量的工作着。全国的学生们，从四川到广东，全都起来响应。我们有了个全国性的学生会的组织。

第二年，学生们的活动更加炽盛起来，活泼起来。有一天，北京全体学生出动，参加讲演，北京政府却把他们全都圈禁在天安门的广场上。东西和南面的门全由军警把守着，谁都不许进去，也不许出来。直到晚上，还没有释放的消息。夜凉如水，月色朦胧，许多学生的家长送了衣服和被铺来，在朱漆的大门口，全给挡住了，于是乱糟糟的闹起来。那时我是个代表，没有参加讲演队，所以不在被圈禁之列。我也帮同一位朋友的家人去送衣服，任你怎样交涉也送不进去。我们愤激极了，几乎要破口大骂。但北京的军警似乎久已养成了一种“好”习惯，专用软功来对付，他们不冒火，只是慢吞吞的应付着，并不是不理会，却总是个拒绝。馒头和水果却送了不少进去。

过了好久，夜很深了，军警开始撤退，大家方才被释放出来。

这个学生运动可以说是空前的，和南宋时代陈东们的伏阙上书情形完全不同。他们并不是请愿，他们是要唤起群众。他们并没有任何背景，他们大多是自发的，自动的。他们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同情，商人们自动的帮助着他们，例如送茶水与他们，或者把他们隐藏在店堂里，或者送他们从后门走出去。

（原载《中学生》1946 年 5 月号，总第 175 期，第 8 ~ 9 页）

北京大学工友回忆五四

——杨泰、谢云峰、李昆的回忆

《北大半月刊》编者

五四运动是先生和学生共同团结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那时候段执政太亲日，曹汝霖外交太软，中国眼看着就要送给日本了，因此北大学员不能忍了，才起来组织学生会，主席是段君。那时候本校学生有两千多人。在五四那天罢课出街游行，火烧赵家楼。华北各地学生很快都起来响应，每天都有一大批一大批的学员坐火车到北京来。那时学生讲演真积极，三人一队、五人一队都到公安局各处大街去演讲，腰里藏着小旗随时举出来便开讲。军警来抓，抓去一队又来一队，后来公安局什么监狱都住满了，就把三院二院作临时监狱。游行回来，当天晚上在西斋饭厅开会，咬破手指写血书。我们工友帮忙跟着跑，忙极了。

游行记得还伤了人，在这广场开大会。我们工友帮着打大旗，拿着血衣给大家看。

先生那时有李大钊同志，是图书馆主任。还有陈独秀、胡适等。这些先生办刊物，记得当时有《努力报》、《新青年》，还有新潮社的《新潮》、《语丝》等报，多极了，在这里红楼卖，销路真好。

（原载《北大半月刊》1948年5月1日，第4期，第3页）

长辛店学生参加五四爱国运动的情况

何长工

我们早就听说北洋军阀政府要在巴黎和会上签定丧权辱国的条约。那几天，北京大学的学生派人到长辛店来和我们联系。我们有些人，也到北京大学图书馆西侧大概是马神庙内去写标语。5 月 4 日这天，北京学生举行游行示威，我们长辛店的学生也赶去了。我们怕乘火车不能按时到，都骑毛驴进城。我们来到天安门前，已是人山人海。开完大会，学生队伍出发到新华门向总统府请愿。不料反动的北洋政府派出大批军警来镇压我们。前面的人有的被刺刀刺伤了，有的被枪托打伤了，有一些人被捕了。我们北京班的方敦元，也被枪托打伤了。学生激怒了，当时就分成几路，要采取行动，制裁卖国贼。一路到赵家楼去打曹汝霖，一路到东交民巷去包围日本领事馆，一路就去打德国牌子。

长辛店这一队是走东交民巷一路。事后我们才听说，学生们没有捉住曹汝霖，当学生队伍到他门口的时候，他躲在姨太太卧室的澡盆里，躲脱了。学生们就放火烧了他的房子。

第二天，北京全市总罢课，学生组织了讲演团、国货维持会、救国十人团等，进行爱国运动。我们回到长辛店，也组织了救国十人团，到车间去向工人宣传，有时还到工人家去挨户宣传。车站上来往的人很多，我们也到车站去宣传。

工人很支持我们的行动。我们的麻子师傅说：“开初我还以为你

们是毛孩子，不知你们还敢惹总统！”

我们的教员虽然没有直接参加行动，但也支持我们。因为当时的留学生也不满意腐败的政府。唯独我们的副厂长刘家骥反对我们。他是曹汝霖的女婿，他召集我们开会，骂道：

“你们这些小子，爱什么国呀！不好好读书，光会闹事！你们是劣马害群！我要开除你们！”

我们都火了，要揍他。他看风头不对，急忙逃走。

于是，我们联合了工人一块儿罢工。并且商量好，去烧他的房子。我们和工人一块儿，拿着做工用的钳子、大锤，抬着洋油桶，就往他住的地方去了。我们的车间主任、工程师、教员也去了。

走到他家门口，只见门关得死死的，叫也叫不开，我们就把洋油往门上倒，一点火，燃起来了。

大伙从围墙上爬上去，叫开门，还是不开，我们就扔石头子进去。

厂长跑了。厂长的老婆穿着西装裙子，站在凉台上吓慌了，我们一上墙，她卜通一声跪下来，哀求说：

“各位同学先生们！……人走了，得罪你们了！……不要把小孩打伤了！得罪了……我给你们赔罪。”

最后，我们的法文教员出来调停，人们才散了。

我们几个月没上课，没做工，打着长辛店救国宣传队的旗子到处跑，带着窝窝头出去，晚上才回来。有时一跑就是几十里，好像风车一样。我们还带了国货日用品到乡下去，向农民宣传，劝农民不要买日本货，买本国货。每到一处，不管是肥皂、手巾、牙刷等等什么东西，一下就卖光了。宣传队每到一个村子，一大堆人就围上了。同学们一看人多，站在石头上或桌子上就开始演讲，讲的慷慨激昂，很多人都掉了眼泪。个个感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别的什么也顾不得了。

（摘自何长工《勤工俭学生活回忆》，第 15 ~ 17 页）

五四运动的回忆

邓颖超

1919年五四运动时，我才十六岁，正在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念书。今天谈起三十年前的往事，由于三十年不算短的时间和中国革命的曲折复杂经历，已经冲淡了我的许多记忆，现在仅就我能记得的谈谈。

那年5月4日，北京学生发动示威，要求“惩办卖国贼”、“拒签凡尔赛和约”，学生们在激愤中发生了火烧赵家楼、怒打卖国贼的事件。在次日，消息传到天津，震动了天津各校的同学，纷纷议论，立即响应北京同学的爱国运动。在7日，天津学生就举行了示威，很快的组成了天津学生联合会，和以女学校同学为主的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随后又成立了天津各界救国联合会。当时我们只凭单纯的爱国热情，喊出的口号除了前面的两个以外，还有“取消二十一条”、“收回青岛”、“抵制日货”、“提倡国货”、“不做亡国奴”等等。当时北洋军阀政府对学生的爱国运动是采取镇压的政策，用警察、刺刀、子弹、水龙扫射、殴打以至逮捕等各种办法压迫学生。我们在斗争中锻炼，逐渐提高了觉悟。又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新思潮新文化正很快的涌入古老的中国，苏联十月革命的成功，也开始在中国青年中起了影响，这就给了五四运动以新的进步因素，使之向前发展。

五四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本身是反帝反封建的性质，但当时，在我们的思想上是还没有弄明确的。直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才明确的指出中国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我们的认识也

才逐渐的明确起来。五四时，我们也不知道“知识分子要与工农结合”，只知道列宁是苏联革命的导师，他是要为被压迫的工人和农民谋解放的而已。不过我们当时的确也有一种自发的直觉认识，要救国需要冲破学生的圈子，救国不能单靠学生，必须要“唤醒同胞”。所以，我们很重视宣传工作，组织了许多讲演队。我当时就担任着女界爱国同志会的讲演队长和学生联合会的讲演部长。我们的讲演队定期的经常的到各处讲演。在初期，女学生因受社会封建习俗的束缚还不能和男学生一样的出现在街头讲演，而是限于在市内各宣讲所、民教馆以及公共集会的场合。每次听讲的人都很多，我们讲的是要大家起来齐心救国，要达到惩办卖国贼的目的，讲述朝鲜亡国后当亡国奴的惨痛，我们应有爱国开会的自由，抗议当时北洋政府对学生的迫害等等。我们讲的人，有时声泪俱下，听的人也很受感动。另外我们还作家庭访问，常到比较偏僻的地区和贫民区，挨家宣传。有的人家很热情地接待我们，有的人家就把大门一关，拒我们于门外，但我们碰了钉子一点不灰心，还是挨家敲门访问。记得那年暑假期内，有一次出发去天津西头讲演，回来时赶上倾盆大雨，每个人淋得和水鸡子一样，但同学们一点也不泄气，下次还是按时照样的去干。另一方面，我们也很重视文字的宣传和报纸的作用，由天津学生联合会出版了三日刊的《学生联合会报》，后来改为对开一大张的日报，和现在《人民日报》的篇幅一样大。每期销到二万份以上，是一个不小的数目。这个报的主编人就是周恩来同志。女界爱国同志会也出版了一个周刊。这两个报纸报导着当时国内外的时事消息和全国各地的学生爱国运动消息及反压迫的斗争，还有社论和政治性的论文及文艺作品等等。

关于五四运动中学生要求民主和科学的具体事实，我只能从当时天津一个地方的情况和我所活动的一个角度上举几个例子。

由于反动的北洋政府对外媚日，对内袒护国贼，不断的压迫学生，我们没有爱国的自由。当时我们最迫切的民主要求就是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等民主权利。我们为此遭受过多次的压迫，也作了多次的斗争。例如五四那年的10月10日，由天津各界救国联合会召开天津全市市民大会继续坚持惩办卖国贼，罢免曹汝霖、陆宗

舆、章宗祥，加紧抵制日货，举行游行示威。在事前我们已经风闻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外号叫杨梆子）准备以武装解散我们的集会，阻止我们的游行。但我们毫不恐慌害怕，我们也作了应付武装警察斗争的准备。会场的布置和队伍的排列是把市民们站在主席台的周围，然后把有组织的学生站在市民的外围，又把女学生站在最前列，准备被武装包围时先由女学生冲出重围；另一方面，我们每个人拿的旗子，都是用专买来的坚固竹竿制成的，准备把竹竿作为事变发生时斗争的武器。在预定开会时间以前，市民和学生的队伍大群大群的向南开广场集合起来。果然不出我们的预料，警察们大批出动，拿着上了刺刀的长枪，把我们整个的会场包围起来了。我们仍按开会的程序进行，直到游行示威开始时，我们就和武装警察发生了冲突。首先我们学生向前冲，一面冲一面向他宣传呼喊“警察也应该爱国”、“不要打爱国学生”；同时因为他们已经动武，用枪托殴打我们，很多同学挨了打，有的眼镜亦被打破了，于是我们也就挥动手上的竹竿抵抗，并用竹竿把他们的帽子掀掉在地上，当他们弯腰去拾帽子的时候，我们就乘这空隙向前冲。正在搏斗紧急的关头，来了一支外援的队伍——恰巧学联的汽车宣传队开到会场，里外夹攻就打开了一个缺口，大队跟着汽车冲了出去。于是环城示威游行，直到警察厅质问杨以德，向他提出抗议，一直坚持到第二天黎明才散。这次事件激起了女同学极大的愤慨，于是不再管封建习俗的限制，第二天就走向街头，不顾一切，到处举行街头露天讲演，控诉杨以德对于学生的压迫。

在10月10日事件以后，压迫愈来愈紧，过了一个多月，天津各界救国联合会被查封，马千里、马骏等二十四个领导人被逮捕，紧接着天津学生联合会被查封。我们不能公开活动了，于是就转入租界，在一个同学家里借了一间小屋继续办公，坚持斗争。在12月中为了要求启封各界救国联合会和学生会、释放被捕代表，发动了全天津同学的大请愿，包围省政府，要求当时的省长曹锐出来答复，但他避不出见。我们推举代表去见他，而省府大门早已紧紧关闭，大批军警护卫，不准代表进去。我们的四个代表——周恩来、郭隆真（女）、于方舟等四人，就从大门底下的门坎洞里钻了进去，一进去就挨了打，被逮捕了。外面的学生大队更加气愤，坚持不走，直到半夜。反动的

省政府又拿出最后的手段，用刺刀、枪托、水龙来武力镇压，驱散了学生，演出了流血惨剧。很多同学挨打受伤，头破血流，重伤的送入了医院，从此我们更认识了反动政府的狰狞面目，认识了爱国自由和民主权利决不是不经过斗争和流血就能轻易得到的。在五四运动的第二年，也就是运动的后期，我们的工作重心转入了反对非法逮捕，营救代表，要求把拘押的代表转送法院公开审判，争取舆论的援助。一直到夏天，全体先后被捕的代表二十八人才得到释放。

我们不但在校外受反动政府当局的压迫，在校内也受校长教员的压迫，禁止我们出校活动、参加会议。例如在1920年的5月7日，我们女师同学为了参加五七国耻纪念大会，与学校当局发生了冲突，虽然终于冲出去开了大会，但回到学校时，校中已挂出牌示，竟公布将全校二百多同学全数开除学籍。我们气极了，但是一点也不恐慌害怕，决不屈服，大家一致废寝忘食，连夜收拾行李，全体搬出学校。但学校当局反关起大门不准我们搬走，把电话室也封锁起来。全校骚动，闹了一整夜，到第二天清早，还是全体坚决搬出了学校。我们避开警察的监视，到校外种植园一带去召开会议，斗争坚持了一个星期，终于在家长和社会舆论的支持下，迫使学校当局收回成命，先收回了开除我们的牌示，然后我们全体同学才胜利回校。

我们当时，虽然还不知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是有满腔的爱国热情，为了救国，为了民族的独立，为了争取民主自由和反对封建势力，有勇于牺牲一切在所不计的革命精神。

随着五四爱国运动的发展，同时掀起了妇女解放运动，这也是五四的民主运动中一个主要内容。提出了“男女平等”、“反对包办婚姻”，要求“社交公开”、“恋爱自由”、“婚姻自由”、“大学开女禁”、“各机关开放任用女职员”等。在天津首先是把男女同学分别组织的学生联合会合并，共同工作。这件事在起初也是遇到了阻力的，女同学中也有不赞成的，有顾虑社会舆论不同情的，有怕合并后被人说男女混杂闹笑话的，但男女同学中的进步积极分子终于冲破了这些阻碍，勇敢的实行合并并收到良好效果。当时男女同学间的相处都是极其自然坦白的，工作上是互相尊重平等的。大家一心一意忙着救国，忙斗争，在工作上竞赛，女同学不肯后人。女同学中的积极分子

明白自己要作开路的人，就不能遗笑社会，挡住了后来人的路，一定要好好干，作出一个榜样来。在当时男同学中的积极分子，受了新思潮洪流的激荡，重男轻女的思想也被大大的打破了，对女同学都是很尊重的。在工作的责任上，都是平等担任。学联会各部门的负责人，有一个男同学也必定有一个女同学。学联会评议部的主席也是男女各一。天津女师的同学，当时在学联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和南开同学一样带有决定性的。当时北京男女学联会的合并晚于天津的学联。他们很羡慕我们天津学联的合并和我们工作的良好表现。那时阻止北京男女学联合并最顽固的分子，就是当时女师大学生会的控制者陶玄，后来她投靠了反动的国民党。

由于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和新思潮的输入中国，随着五四爱国运动的发展，新文化运动愈加蓬勃发展起来，这是五四“科学”口号下的主要内容。在北京出版的《新青年》、《少年中国》、《新潮》等刊物，很多同学都喜欢阅读。为了提高我们对新文化的学习，由天津学生联合会于每周举行学术讲演会，请北京先进的教授如李大钊同志等到天津讲演。反对文言反对八股，提倡用白话文，学习白话文和标点符号的用法。这些事在今天看起来是很平常无足道的。但是在那时，这些事却是极新鲜重要的事情。在五四那年的夏末，我们男女同学中比较进步的积极分子二十多人，感觉需要一个比学联的组织更严密一点的团体，更能作一些科学和新思潮的研究，就组织了个小团体——觉悟社。这个团体的社员常在一起谈论研究一些新思潮。那时我是年纪最小的一个，不常参加正规的讨论，但常听到比我年长的男女社员们谈论着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等。大家都还没有一定的信仰，也不懂得共产主义，只听说最理想的社会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只知道有列宁，苏联十月革命成功了；只知道他们的革命是把多数被压迫者解放了，要实现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引起了我们的同情和对十月革命的憧憬。那时，我们还得不到这类问题的读物啊！觉悟社的生命不很长，只有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在前面提到的包围省政府惨案发生以后，一部分社员被捕入狱（如马骏、周恩来等），一部分社员在学校毕业后分散各地，剩下的少数人也因为环境恶劣不能作什么活动。到了1920年的夏天，一部分社员如周恩来、

郭隆真出狱后，和刘清扬等很快的到法国去勤工俭学，我和其他社员也从学校毕业分到各地工作，我们的小团体，也就不存在了。但是我们还经常来往，有的通信联络。在1920年有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改共产主义青年团），1921年有了中国共产党以后，我们二十多个社员中有半数以上的人都先后加入了党或团，有的还成为党或团的某些地方组织的第一批成员。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在1924年初成立的，后又成立了党的组织。这时我们已经明确的知道了什么是无产阶级，要为无产阶级的利益奋斗，确定了我们的信仰和奋斗的目标是共产主义。

觉悟社的二十几个社员，三十年来，变化很大。有的人早作了革命的逃兵，有的人只图个人的安逸已不问政治，有的人已堕落跑到反动国民党的营垒中去了。但是有的人一直坚持革命奋斗到现在，有的人是站在光荣的共产党员的岗位上英勇牺牲了。如当时最优秀的学生领袖马骏同志（回族），在1927年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时被张作霖逮捕杀害；郭隆真同志（回族，后改名郭林一），于1931年在青岛被捕，解往济南被韩复榘杀害。他们二人临刑时，高呼口号，唱国际歌，英勇就义。还有天津另一个先进学生小团体的社员于方舟同志，在土地革命时期领导玉田暴动后牺牲。提起他们，不禁引起了我对他们和无数革命烈士们的哀思和敬意，也充满着对敌人的仇恨。我们一定要踏着革命烈士的血迹前进，中国的青年，要继承和发扬五四的革命精神前进，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把革命进行到底。我们一定能够完成五四运动所开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胜利的前进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并过渡到共产主义。

（原载东北大学编《五四纪念文辑》，第60~66页）

五四回忆

刘清扬

民国初元年间，辛亥革命的结局，是由专制的清代调换了一个封建共和，窃国大盗袁世凯为满足他作皇帝的野心，求助于日本帝国主义，暗订了二十一条亡国的条约，有志青年对此感到无比的愤恨和忧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国际帝国主义于分赃的巴黎和会之中，更威逼中国承认二十一条亡国条约。在将丧失国家主权的紧要关头，才使忍无可忍的北大等校学生，爆发了怒打卖国贼曹、陆、章和火烧赵家楼的壮举。这一反日高潮，随即激起全国各界人民的爱国热心，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卖国军阀的怒吼之声，遍于寰宇。

在北京又接连着为要求拒绝巴黎和会签字，取消二十一条，反抗山东省长马良枪杀爱国游行的人民，遂由京津学生共同举行了两次大请愿。当时的卖国政府，正是亲日的安福系在当权。第一次的请愿，在怀仁堂见到了徐世昌，因在众代表的威逼之下，他不得不应许去电巴黎，使出席和会的代表拒绝签字，这实是出乎帝国主义意料之外的打击。第二次为要求惩办马良，竟在新华门前聚守了两日，反动政府不但未接受代表的要求，并把四十余人全部逮捕。当时的警察总监吴炳湘，竟有意枪毙这些代表，因而激起京、津青年的愤怒，即发动了三万学生对警察局的大包围。为要求释放被捕代表，不达目的不肯散去。其中青年领袖马骏，成了团结三万青年的中心。反动政府也动员了全城军警，把三万学生驱逐到天安门内去，专以逮捕枪毙马骏作为驱散群众的威胁！果然大家为爱护马骏，才不得不散去。不久被捕代

表也得开释，这便是第一次团结奋斗力量的胜利。

在京津以及全国各地的学生联合会、各界联合会、女界联合会等，进行了多次群众示威、街头讲演、集体请愿等场面伟大的活动之后，于是便进一步组织全国有组织有系统的两大斗争主体。首先由北京学联会派代表到上海发动成立全国学生联合总会。由于各省市都已有了基层组织，再号召成立全国大团结的组织，当然是很容易的，所以不久全国一致，坚固团结的全国学联总会即成立。此后一切斗争，均由常务理事策划主持，所以斗争的精神更为坚强，前进的步伐是整齐的。运动一直延长了年半之久，并曾派代表去南洋各地作宣传呼吁，博得海外侨胞的热烈欢迎和协助，直到取消二十一条，运动方才停息。从这一抗日行动，才使帝国主义者认识了中国人民团结奋斗，坚决不屈的毅力。

上海全国各界联合总会是由天津各界联合会推派代表赴沪号召组成的。天津各界联合会是由工人、学生、妇女、教育、新闻各界，以及基督教会和绅、商等所组成的较健全完善的人民团体。所以它成为推动上海全国各界联合总会的主力。由于全国人民爱国热心，凡各省市都有各界联合会的组织，所以各地推派赴沪出席大会的代表，有二百多人。这一民族长城的建立，其由上而下的领导，实是由下而上集中的力量，可以说是中国史无前例的人民大团结。由于群众主动坚决的斗争，才能扭转巴黎和会时对于中国不利的和约。

全国各地妇女的爱国团体，名称不一，如北京的女学生联合会、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上海女界联合会等。妇女团体没有全国总会，但其奋斗的精神意志、英勇努力的热情，到处都是一样的。尤其在广大人民请愿的行列之中，妇女总是居于前列，为防止或抵御军警凶狠的打击，不但作卫护男性的先锋队，而且其能力、勇敢，以及策划行动，无不与男子并肩，共同努力，尤其中国妇女运动之深入群众中，就是在五四时期开始的。

五四的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以及各界人民的拥护响应，那种精诚团结，互相合作的精神，实是反帝反封建的有力武器。当时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青年是主力的领导者，由于他们不脱离群众，注重团结各界的作风是最正确的，所以才形成了不可侮的

战斗力。虽然受时代的限制，当时知识青年对于革命的认识，在思想意识上还欠缺深刻的理论指导，但因已受到苏联革命的影响，所以除了单纯的爱国热情而外，并已有了追求社会革新的理想。因此，他们万众一心，不惜牺牲，贡献了一切的力量，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势力，争取民主真理而努力。

（原载五四卅周年纪念专辑编委会编
《五四卅周年纪念专辑》，第 186 ~ 190 页）

漫话五四当年

邓颖超

(一)

由五四运动产生的天津各界救国联合会，认真地领导了群众深入的抵制日货运动。依靠着群众的力量严厉检查、没收和焚毁日货，惩罚贩日货的奸商，收到很好的成果。但是在那年的年底，救国运动内部一小部分大商人却发生动摇和破坏，招致了当局更加紧的压迫，终于发展到流血的惨剧。

1919 年 12 月的某一天，正当各界联合会的马千里、马骏、尚车子、陶尚钊等二十四位代表在会所内开会，讨论抵制仇货问题的时候，突然有大批军警撞进来，把他们全数逮捕了。同日封闭了各界救国联合会和学生联合会。同时全市宣布戒严，要逮捕其他的学生代表。这种打击并没有动摇我们战斗的意志。中国地界既不能立足，不能活动，我们就把学生联合会移到租界里去，权借同学的家里办公，这家三天，那家五天，在不断的转移中坚持着工作。我们住在中国地界的代表都变成有家归不得，勉强在同学家里借住。但是压迫比严霜降得更紧，人情也冷过十二月的寒风，我们渐渐连同学家里也待不住了，只有流浪街头，尝着爱国流浪的苦生活。一丈见方的房子，成了十几个人的避难所，晚间大家倚拥着，蜷缩着，棉被也没有，只凭青年身上的暖气度过一个又一个漫长苦寒的冬夜。但热血是永远也冻不

结的，爱国热情，被压迫的怒火，使我们更加不顾一切牺牲，勇往直前，不怕一切困难。而摆在我们面前最急迫的问题是如何打开沉窒的局面。于是我们决定举行大规模的请愿，向直隶省政府要求启封学生联合会，释放被捕的各界联合会的代表。我们十分明白，这是一次严重的斗争，必须最审慎最周到的布置，事先有系统的动员了各校的同学与各界市民，并且在请愿的领导上作了精密适当的分工，有选出向当局交涉的代表，有专任请愿群众队伍的指挥员，有留守会所准备供应粮食和动员后备队的人员，还有专司联络的脚踏车队和负责通电话的情报员。尤其是当天的示威请愿群众的集合，现在回想起来，可说是游击式的，为了防备压迫与解散，各校同学在不同的时间，分散成为小队，三五成群的，在约定的时间，都走向集中地——东马路青年会。待总指挥部鸣笛一叫，就全部集合成了人的铁流了。当天我和刘清扬、王天麟等是被派定留守的，一清早把他们送走以后，就一面忙着工作，一面焦心的等待着消息，直等到将近黄昏，竟一点信息也没有。我们正在又担心又着急的时侯，忽传来了噩耗，省政府门前已发生冲突，演了流血惨剧。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当请愿的广大人群队伍都齐集省府门前时，省府根本闭门不理，另调军警从外面把广大群众重重包围起来。交涉呼吁了四五小时，代表们还是进不去，要求提不出，对着坚如铁壁的大门，毫无办法。省政府的大门虽关了，但门槛还没有上起来，门离地还有尺多高的空隙。我们的四位代表——周恩来、于方舟（又名兰渚，后在领导玉田农民斗争中牺牲）、郭隆真（又名林一，后在济南做地下党工作时，被捕英勇牺牲）等四人正在商议想办法，忽有所得，马上从门槛下面爬了进去，但刚爬到里面，还来不及立好，门内军警就打他们，赏以老掌耳光，立刻把他们加以逮捕。后来知道，他们和前二十四位代表拘押在一处。当局一面派人出来哄大家说："省政府当局已接见代表，一切正在面谈，请大家解散回去听消息。"群众明白这是骗局，一致坚持不得结果，决不解散。他们见欺骗行不通，原来包围的大批军警，立刻以武装驱散群众。学生手无寸铁，仍然英勇的抵抗着。在他们枪刀鞭棍之下，结果许多男女同学都受了伤！有的头破血流，有的眼伤骨断，抬到医院去了。其他同学纷乱散

去，情形十分凄惨。我们得到这不幸消息，抑压着心头的悲愤，马上开会商议善后办法，决定立刻要做两件事：第一，到各医院调查和慰问负伤同学，第二，到各校整顿队伍。

正待重新整理各学校的工作，学校当局突然宣布提前放假，强迫同学回家，拆散我们的组织。只有极小一部分同学留下来，坚持日常工作和同学间的联络，特别是援救二十八位被捕的代表。

(二)

学联被迫转入于秘密状态，斗争的条件是极端困难的。

我们终于又想出了继续斗争的方法，就是留守的学校代表发动自愿签名，代替被捕的代表受监禁。我们签足了二十八名，就备了公文，带了行李，到警察厅去要求入狱。我们向警察厅长杨以德提出两点理由：第一，我们的代表因为爱国横遭逮捕，他们是我们选出来的代表，不能只让他们饱尝铁窗风味，我们大家要轮流受监禁，不能叫他们单独担当。现在我们就要求入狱替换他们。第二，对于非法捕人，长期监禁，既不宣布罪状，又不送到法院审判，提出严重的抗议。我们据理力争，无论厅长怎么说好话哄骗我们，仍坚持不走，弄得他们没办法，最后只好请我们到警察厅的后花园，会见二十八位被捕的代表，同时参观他们的住屋。经过我们这次大闹，引起了社会上的同情和对他们的谴责。加以我们的代表在里面又实行绝食，力争会见和通信的自由，尤其是迅速依法解决。警察厅也感到人言可畏，半个月以后，就把我们的代表解送法院，拘押在看守所中。

接着组织留津同学和被捕代表的家属经常去探监、慰问。同时积极的准备提出公诉，要求公审。我们聘请同情我们的大律师刘崇佑先生为辩护人。当时他几次由北京赶到天津，到狱中去向各代表收集材料，并且指导和帮助我们进行讼诉的事情。我们热心的学习关于讼事的常识，搜集答辩的材料，一面又动员舆论做我们的后盾，组织学生和家属在公审之日出席旁听。我们以一切努力，争取判决宣告被捕代表的无罪。另一方面我们的代表也在狱中兴奋的细致的忙着准备自己的答辩词。他们虽然被拘押已半年了，但毫不颓丧，更不悲观恐惧。

因为他们知道为爱国而遭拘押，是不犯任何罪条的。只有那些逮捕和摧残青年的人才是罪大恶极。他们准备提出正义的控诉，迎接光荣的审判。当公审时，在法庭上，他们理直气壮，慷慨激昂的进行答辩，充满了胜利的信心的。

公审的那一天，法庭上挤满了旁听的人群，天津河北三马路上的地方审判厅的外面，站立着伫候消息、声援代表的男女学生和各界的广大队伍。当局也感到众怒难犯，决心释放被禁的代表。但他们还是死要面子，不肯承认自己做下的错事，强把捏造的罪名，加在各个代表的身上，判定了若干日的拘禁，而这判定的日期恰恰和他们已被禁的日数相等。于是法官宣布期满释放。我们到底是胜利了。欢迎的大队一涌上前，拥护着我们的二十八位代表，到预定的地方——天津市总商会去开欢迎会，庆祝我们奋斗的成功，庆祝正义的胜利，庆祝我们无辜蒙难的英雄们无恙的恢复自由！

（原载重庆《新华日报》1941 年 5 月 4 日第 3 版，
为该报记者记录整理稿）

我对五四前后天津学生运动的几点回忆

刘清扬

一、李大钊同志对天津青年的启蒙教育

自从八国联军侵入天津以后，清朝政府与侵略国家缔结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天津便沦为半殖民地了，英、法、意、日的租界林立，美国虽无租界地，但也建立了一座兵营。大人或孩子如无意中接近了兵营，美国兵就可以开枪射击。在列强的欺凌迫害之下，天津人民虽不得不忍气吞声，但对帝国主义深恶痛绝，已久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救国意志。为要求民族的独立自由，有志青年也曾不怕杀头流血，而投身于辛亥革命。但辛亥革命是失败了，这更使人们陷于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压迫的内忧外患的苦闷中，迫切寻求救国自强的出路。直到五四运动的前夕，这种要求就格外迫切。

李大钊同志于1916年夏天，因为反对袁世凯阴谋称帝，从日本愤愤回到祖国，在天津开始主编《晨钟报》，号召倒袁运动。这对天津人民内反封建军阀，外反帝国主义的情绪，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所以，天津青年接受李大钊同志爱国主义的启蒙教育最早，印象也最深刻。

李大钊同志在《晨钟报》上发表许多救国政论，积极向人民和青年宣传日本侵略我国的野心，揭露袁世凯和日本私订卖国二十一条约

的秘密，并指出二十一条密约是亡国的条约。他当时提出的反袁口号和办法是：“广大群众团结起来，坚持不当兵，不纳税，以相抵抗。”并在《甲寅》等杂志上，发表过许多言论，鼓舞青年的革命情绪，教育青年急起救国。

由于李大钊同志的启蒙教育，天津青年开始了群众性的初期的爱国活动。1917 年，天津青年组织了爱国讲演会，邀请李大钊同志在东马路青年会礼堂讲演，听众拥挤异常，楼上楼下都挤得水泄不通。李大钊同志的讲题是《大亚细亚主义》。他对当时国际形势作了分析，指出英、美帝国主义向亚洲落后国家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侵略的实质，呼吁亚洲国家团结起来，共同防御外侮。他还专对日本和袁世凯私订亡国的二十一条密约，作了分析。李大钊同志的讲演，不断被雷一般的掌声所打断。

后来李大钊同志到北京大学任经济学教授，更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济学原理教育学生，并和其他当时的进步教授联合开展新文化运动，在《新青年》、《少年中国》、《新潮》等刊物上发表不少介绍世界新思潮的文章，这些文章对全国青年增强爱国思想起了很大作用。在五四运动爆发后，李大钊同志曾来天津给我们讲演作指导。在我们天津青年的觉悟社成立后第五天，李大钊同志第一个来给我们作学术讲演。他首先对我们成立一个男女合组的团体和出版一个不定期的进步刊物，表示非常赞成，这给了我们以很大的鼓舞。在五四运动结束后，我们觉悟社的同人曾全体来到北京，在陶然亭召开了一次座谈会，由周恩来同志倡议在座的各青年进步团体，团结起来，共同反对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这次大钊同志也被请来给我们指导，他对觉悟社团结奋斗的倡议很满意，但指示大家团结起来必须有共同一致的主义信仰，才能发挥共同奋斗的作用。所谓共同一致的信仰，那只能是社会主义的红旗，才能把我们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二、天津五四运动活动的概况

五四运动，天津的青年学生、妇女、爱国知识分子、城市工人、教育界、新闻界，甚至工商界的资本家、商店店员和宗教界人士都参

加了。当时天津除了学生联合会和女界同志会的组织以外，并成立了各界联合会，这在全国运动中还是创举，团结的各界群众也是相当广泛的，因而对全国各地起了带头作用。但惟有乡村农民，我们未深入动员，这是五四运动的一个缺点。

五四运动，是北京的学生发动起来的，天津的学生立即支持响应。而运动深入的程度，天津要比北京和其他地区较为普遍广泛。因为天津受英、法联军，特别是八国联军的直接迫害最惨重，在那里设有外国租界地，受帝国主义经济、文化的侵略也最深重，所以天津学生联合会的宣传工作就作得既有思想性又很深入。天津的学联会认为爱国运动不能单靠青年学生，所以特别重视群众的力量，因而注重启发广大群众的爱国思想。天津的五四运动，除有学生联合会和女界同志会的坚强领导以外，还有由这两个团体的骨干分子团结成为领导核心的觉悟社组织。运动在发展前进中的指导思想是逐渐响往俄国革命。学生以罢课为武器，抵制日货是行动，在那时候是经历了一年多的艰苦斗争的。人民群众的抵制日货运动，风起云涌，学生讲演队布满了各街市，终日奔走呼吁，广泛宣传，不遗余力。在要求“拒绝巴黎和会签字”、“取消二十一条亡国条约”、“罢免曹、陆、章卖国贼”的游行和三次进京请愿以及召开爱国大会、公民大会、国民大会等等的爱国宣传活动斗争中，青年学生、妇女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由一千多人到两万多人，形成了热烈的爱国高潮。在历次活动中，我们都不断的受到北洋军阀卖国政府很大的打击和迫害，被捕的人很多，每次受伤的更不计其数。但人民的爱国热情，是不会被吓倒的。

1919 年年底，学校当局根据反动政府的决定，打算阴谋提前放假，强迫学生离校，以制止天津的爱国活动。学联会、女界同志会在以觉悟社为核心的策划下，决定要作最后的反抗斗争。1920 年 1 月下旬，天津爱国运动各界领导人被逮捕，同时学生联合会与各界联合会也被封了。因此一月二十九日，动员全体同学出发讲演，并于讲演结束后由周恩来同志领导去省公署请愿，提出要求取消二十一条和恢复人民的爱国自由。在平时，周恩来同志很少出头，专门负责编辑天津学生联合会的日报，以及从事思想的领导，任务特别重要。由于他所主编的学生日报，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人人都喜欢阅读，所以他的

声望在群众中是很高的。这次他出来参加领导讲演，并带领学生群众直到曹锐省长公署请愿，我们明知会遭受打击，并且也正是抱定“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的。果然在请愿时，周恩来同志和郭隆真、于兰渚等四位领袖都被逮捕了。请愿群众，许多人受了伤，纷纷到医院去治疗，因而引起各界的公愤。

觉悟社有计划的作了这次最大的群众性的斗争，借以揭露了反动政府卖国的丑恶真象，这是根据既定的策略而进行的。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声势浩大的请愿运动，激起了全国的同情和响应，并使爱国运动得以日益蓬勃发展起来，使反动政府提前放假的阴谋终于粉碎。当时天津的活动虽遭受打击，但却更加有力的推动了全国运动的发展。为使这一运动扩大影响，事先就把我有计划地藏在天主教堂，次日改装成修道女，乘车到南京、上海去宣传，发动了要求释放天津的被捕学生和各界被捕人士的巨大运动，并呼吁全国学生继续坚决要求取消二十一条，和拒绝日本在巴黎和会提出的山东问题由中日直接交涉的斗争。

这样，天津的爱国运动，在形式上是被打击得沉默下去，但由于最后一次有计划的斗争，更激起全国的运动能保持积极的活动，直到半年之后，在巴黎和会拒绝了中日直接交涉，并使亡国的二十一条不生效力，而天津全体被捕的爱国人士得到释放，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才胜利的结束。

三、五四运动时期的天津觉悟社

天津五四运动中的男女青年骨干，在领导运动的发展和斗争中，由于提高了觉悟，相互要求学习，要求加强武装自己，以准备持久奋斗共同前进，并由周恩来同志的倡议，大家也一致赞成团结起来互助努力，因而诞生了觉悟社这个进步组织。

在五四运动爆发后，天津的学联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的男女青年，在热烈英勇的斗争中，团结合作的精神日益加强，因此逐渐把由封建习俗的约束所形成的男女界限打破了，男女的友谊完全是并肩奋

斗，共同努力，相互平等的友谊。1919年7月初，周恩来同志从日本愤而归国（原来他就是南开学校的优秀学生）。这一次他回到天津，就投入学生联合会的反日斗争中，并且负责主编学生会报（日刊一大张），通过这个报纸，大家的爱国主义情绪有了进一步的高涨，所以这张报纸对爱国运动是起了很大推进作用的。在运动中，比较积极的一些男女青年，无形中在工作的合作上，就都团结在周恩来同志的周围，并在领导工作和互助学习上，也密切联合起来，成为一个活动的中心。持别是在第二次请愿代表被捕后，经过在天安门的坚决斗争，大家都提高了认识，对救国运动有长期共同奋斗的决心，因而这就要求大家更进一步的团结起来，于是就形成了觉悟社这个小团体的组织。它的主要活动内容，是注重互助学习，要大家认真学习当时的世界新思潮和一些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理论问题，正如邓颖超同志在《五四运动的回忆》一文中所写的，由周恩来同志负责领导学习。同时在这个小组织中，也讨论一些关于爱国活动的计划和策略，因此这个组织，也就起着在运动中的指导作用。组织是比较严密的，也订了一些行动纪律（当然还不象党的组织纪律那样严肃），因此当时的斗争活动是比较有计划的，大家的步调也是一致的。觉悟社这个名字的来源是由于决定出版名为《觉悟》的刊物而定下来的。刊物既定名为《觉悟》，所以我们成立的组织就叫做觉悟社。

觉悟社的成员，要自觉地要求进步与学习，要自动地过有规律的生活，要具有团结合作、英勇不屈的奋斗精神，但其中并无社长和干事等职别，以委员会制分工合作，分担任务。其实当时大家都公认周恩来同志就是实际领导人。由于他的谦虚，他自己绝不承认。我们在内部建立秘密的暗号代表姓名，如周恩来同志是五号（是抓阄而定的），所以在大革命国共分裂后，周恩来同志在上海作党的地下工作时，常用“伍豪”的名字发表指示。邓颖超同志抓到的是一号，她以后的隐名，就叫“逸豪”。觉悟社员的骨干分子有二十人，以后还发展了些社友。大家抽签是用五十个号头抓的，因此在名号上还有三六和四三等数字（如《觉悟》刊物的文章中有些署名便是），我的号数是二五，后来我用隐名时就用“念五”。我们还有一位女界爱国同志【会】的副会长，原名李毅韬，暗号是四三，后来改名李峙山。关于

过组织生活，因我和马骏同志去上海，就很少有参加的机会。

觉悟社成立以后，曾有计划地举行了双十节反抗压迫的示威游行和坚决的斗争，并且更加强了抵制日货运动，以致在 12 月间，为声援福州日本侨民枪杀我爱国人民的惨案，更召开了声势浩大的、数万人的国民大会，并焚烧了没收的日货。当学生联合会由于坚决的斗争，而遭受反动统治者的严厉压迫时，工作受到极大的损失，因而在 1920 年 1 月以后，可以说已完全处于退守的时期。正如邓颖超同志在《五四运动的回忆》上所写的，“一部分社员被捕入狱（如马骏、周恩来等），一部分社员在学校毕业后分散各地，剩下的少数人也因为环境恶劣不能作什么活动。”这完全是当时的实在情况。第一期《觉悟》在 1 月初间印刊以后，由于周、马、郭以及学联和各联的负责人二十多人都已被逮捕，所以《觉悟》的第二期就未能出版。同时天津当时的活动，已成沉默的情况，但这并不等于天津的爱国运动已完全停止。从全国各地发出营救天津被捕爱国人士的强大呼声，以及更积极要求取消二十一条的怒吼。当时，我未出面参加群众性的运动，而是留下来潜行南下，到南京、上海等地宣传天津被压迫的惨剧，呼吁并动员全国各地继续奋斗。1920 年 2 月全国学联决议派我到南洋去宣传国内青年爱国运动的斗争，直到巴黎和会中国的代表最后拒绝签字，取消二十一条，天津全体被捕代表得到释放出狱，我才从海外回国。那时一部分觉悟社的同志们，正在准备赴法勤工俭学。觉悟社的成员，从此就汇集到世界革命的洪流中去，因此出刊一期《觉悟》之后，便不能再出第二期了。很显然第一期《觉悟》的内容，多是在 1919 年 8 月前后所收集的稿件，在那样被压迫的时候，是由于排印工人们的同情协助，才能印发出来的。觉悟社社员们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过程，是从阅读进步的书、报、杂志等，逐渐摸索着，学习着，寻找自己的理想前途的。主要是阅读了北京出版的《新青年》、《少年中国》、《新潮》、《星期评论》等。特别是由于邀请了大钊同志到天津讲演，指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的伟大胜利，这些都给了我们以革命的启蒙教育。在这同时也有人很喜欢看无政府主义宣传的小册子，如克鲁泡特金的《八小时工作制》、《同工同酬》等。邓颖超同志所说“大家都还没有一定的信仰”，也

是当时的实情，但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多数是有了向往的愿望的，虽然当时对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还很模糊。所以大家的积极要求学习，正是为了追求真理，而明确继续奋斗的方向。

由当时《觉悟》的宣言可以看出觉悟社的精神实质。宣言是由周恩来同志执笔写的：《觉悟》的主旨同内容……是要我们觉悟社的目标——本着反省、实行、持久、奋斗、活泼、愉快、创造、批评、互助的精神，求适应于“人”的生活——做学生方面的，“思想改造”事业。抽象的话是要本“革新”、“革心”的精神，求大家的“自觉”、“自决”。发扬宗旨的方法有四种：“一、取公同的态度，发表一切主张；二、对社会一切应用生活，取评论的态度；三、介绍外人的言论——著作同演讲；四、灌输世界新思潮。”

除了宣言，另外还有两篇由社员们共同研究讨论，而后推定执笔人写的论文。一篇是《学生根本觉悟》，还有一篇是《工读主义》。《学生根本觉悟》的内容，完全是记载的当时全体社员的相互交心，和深刻的自我检查和批评。把这些爱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了一番透视，而初步实行了——学生方面的“思想改造”。在这篇文章中，同时提出要“同社会种种的制度习俗……去战”。因而在讨论社会制度时，就提出主张将来在社会中实行“工读主义”。所以第二篇集体讨论的文章，就来申论“工读主义”。这两个在当时所讨论的主题，虽然还是极其幼稚的理想，但从今天我们人人应该进行“自我改造”，以及在社会主义的教学改革中，确立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制度来看，还是符合于寻求社会主义的途径的。

五四期间上海海员工人的罢工

朱宝庭

当时我在上海太古公司海船上做水手，同时在上海水手钧安公所（水手自己的组织）当董事。我们听到“拒绝和约签字”、“争回山东权利”、“废除二十一条”、“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震天撼地的吼声时，我们抑止不住的爱国热情也在心头澎湃起来了。我就和几位海员工友谈这件事，大家都认为我们有起而声援的必要。于是我们印发传单，并到各公所（当时除钧安外还有炎盈社、善政公所、联益社等）去宣传，结果我们几个公社取得很好联系，决定罢工响应。

记得那天下着很大的雨，码头上除忙碌着的起卸工人以及坐客外没有吵杂闲人。北京号及宁绍号两船已坐满了四千多客人。正当他们归心似箭的时候，我们秘密宣告罢工，此两船为首当其冲者，自此从海上泊来之船只，无不立时罢工。第一天即罢下了五只船。罢工当中有不少买办阶级捣乱分子从中阻碍破坏，但我们始终不曾被威胁利诱。有一次，一位二买办因捣乱罢工被工友提来打屁股，结果他放鞭炮挂红（即给船上结挂红彩）才算了结。英领事不敢与我们正面交涉，迫上海总商会令我们开工。总商会会长亲到钧安公所见我，他叫我通知海员工人到四明公所（宁波同乡会的组织）开会。到会工友千余人，都被巡捕、暗探、包打听包围监视着。总商会副会长方椒柏向我们讲：“……如再不开工，你们就不能吃饭……”，他正要继续说下去，猛不防他身后一位体大力壮的工友，把住他的衣领，沙的一声撕破了他的绸衫。群众都鼓掌称快，并喊着：“打！打！”结果这位方先

生默然而退。当时我们的口号是："先开铺（各商店复市的意见），后开工！"由于我们的坚持，这次会我们完全获得了胜利。罢工四日后，英领事来见我，他问："你们为什么要罢工呢？"

"买不到米，买不到菜，所以罢工。"

"我在中国十多年，知道你们中国人的罢市是前门关，后门开，你们不可以从后门买东西吗？"他充分带着讥讽、轻视中国人的口气。

"我们没有见到有开后门的商店，并且我们买东西一定要从前门买的。"我以强硬的话回答他。

"现在你们该开工了，北京已经来电说卖国贼曹、陆、章被惩办，并拒绝和约签字了。"

我们不敢相信，他说他以领事印来保证。我们赶快到各处去探听确息，才信为真实，于是决定明天开工。头天晚上，太古公司方面问我可否先开大通与温州两船，我想明天既开市、开工，就先开两船也没多大关系。于是我答应了。工友们听到了这消息，十数人气愤愤的包围了我，质问我为什么答应开船，我将理由说与他们，好容易才散了。这一夜，我惶惑不安，但怕万一明日不开市，我该如何补偿这个大罪过。第二天我一早起床跑到市上去看，六点、七点、八点都过去了，还不见一家商店开门，我流着满身汗水，作最后的等待。九点钟到了，法租界一家卖彩票的，门豁然开了。我松了一口气，很快的回去，已经有许多的雄纠纠的工友在等候我了。

这次海员参加五四运动，是中国海员工人的第一次罢工，罢工海船达数十只，工人有五千余，罢工时间四昼夜。在罢工过程中，虽组织较差，然工友的情绪高涨，精神不屈，始终出于自动自愿，实开中国海员运动的光明新纪元。从此在帝国主义直接间接压迫下的中国工人阶级，日益走向团结坚强有组织的大道，勇往直前的开赴大革命的前线，直到今天民族解放斗争的战场上，工人阶级始终都以勇敢坚定的英姿出现。

（原载《中国青年》第1卷第2期，第17～19页，
原题《感想与回忆》）

六三以后上海工人的大罢工

邓中夏

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1919年赞助五四运动的爱国罢工。什么叫五四运动呢？当1919年各帝国主义列强在法国巴黎开大战后的所谓“和平”会议，这个会议是战胜国的帝国主义处分战败国的德国的会议，亦即重分世界市场的分赃会议，在这会议上中国山东问题也是被处分的一个。先是欧战以前，德国帝国主义侵略山东，租借青岛，建筑胶济铁路，并取得铁路附近之采矿权。欧战起，德国无力东顾，日本帝国主义以协约国资格，乘机攻陷青岛，强迫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但当时中国既对德宣战，则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自应完全归还中国。然而帝国主义列强的巴黎和会，却硬把山东处分给日本。此消息传至中国后，全国震惊，群情愤激，于是首先在北京发生空前未有的群众大示威运动。发动此次运动的是北京学生，时为5月4日，是谓五四运动。当日群众示威，愤怒之下，放火烧毁亲日派交通总长曹汝霖的公馆，又殴打驻日公使章宗祥。学生当向政府提出要求：“中国代表拒签巴黎和会条件”，并“罢免亲日派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官职”。政府当然不允，学生再接再厉，6月3日，举行全城沿街大讲演，政府下令逮捕学生一千余人。消息传至上海后，上海商人罢市，学生罢课，工人罢工，为北京学生声援。

此次参加罢工的：纺织厂方面，有内外棉第三、四、五厂，日华纱厂，上海纱厂及叉袋角日本纱厂数家。金属业方面，有祥生船厂，船坞铜匠铁匠，江南船坞，铜铁机器工人，浦东和平铁厂，锐利机器

厂，札新机器厂等。运输方面，有沪宁沪杭两路机师工人，浦口各轮船水手，沪南商轮公司等。市政工人方面，有南市电车，英美公司电车，全埠汽车夫，全埠马车夫，华洋德律风公司（属英国）接线人员，中国电报局，公共租界清道夫。其他的工人，有亚细亚美孚煤油栈，叉袋角大有榨油厂，荣昌火柴第一、二两厂，华昌梗片厂，华章造纸厂，商务印书馆印刷工厂，英美烟公司烟厂，查礼饭店工人，以及漆匠，泥水匠，洋行住户及西人饭店之执业者。总共人数无确实统计，大概有六七万人。罢工日参差不齐，有从6月5日罢工的，亦有在11日才罢工的，11日已得北京释放被捕学生和罢免曹、章、陆消息、，于是商人开市，学生开课，工人开工。

其他各地工人参加此次运动不详，据我们所知道的，京奉铁路的唐山和京汉铁路的长辛店是加入了的，他们不仅仅有过大示威游行，而且还组织了团体，当然还只限于爱国的意义。

……中国工人阶级的政治罢工开始于这一次，后来中国工人阶级能发展自己阶级的独立力量与独立斗争，显然的此次罢工有很大的影响。自然后者是为当初资本家所不及料的。

这里还要附带说到一件事。就是工人是向来为所谓“上等社会”的老爷先生们所瞧不起的，但在此次运动中工人却表现了相当的力量，于是使得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也不得不感觉这是一种力量，自然他们就想要来影响工人归附于他……

当然，还另有一种浪漫的小资产阶级的学生，或者可说是急进民主派的学生，他们却因在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感觉到自己孤立，须要找一个共同奋斗的同盟军，这一同盟军在他们的实际经验中认为就是新兴的工人阶级。真的五四运动中有一部分学生领袖，就是从这里出发“往民间去”，跑到工人中去办工人学校，去办工会。这种小资产阶级的学生，自然接近于无产阶级，后来趋向于共产主义，以至于加入共产党。

（摘自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6~9页）

五四前后山东人民的爱国斗争

延波真

一、二十一条和欧洲大战给山东人民的刺激和灾难

辛亥革命给中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期待中国从此登上康庄大道，向富强的领域发展。但政权为北洋军阀袁世凯所窃，以极端无耻的卖国行为与日本签订了二十一条卖国条约，换他的帝制自为。山东是二十一条的主要对象，隐忧特别严重。山东人民把签订二十一条的那天（5月9日）定为国耻纪念日，当时在学生的教科书和笔记上盖有“国耻纪念五月九日”的印章（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就是这样作的）。

欧洲大战时，日本乘机出兵山东，攫取了青岛、胶州湾、胶济铁路和沿路的矿山工厂。山东人民除遭受经济上的掠夺外，还经常受到日本人的惨酷侮辱。我每次乘火车总见到我们的同胞遭受日本人的无情打骂，不论在车厢内或车站上，稍微触及铁路规章或举动不顺日本人的眼，就被拳打脚踢，以至于遭到幽禁残杀，这在当时是每日每时都可能发生的。这时的山东人民，名义上是中国人，实际上已成日本人的奴隶。

二、济南五四运动的一些情况

中国人民很明白“二十一条”是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毒辣计

划。日本人占据了青岛和胶济铁路，在短短的几年内，山东人民就已经饱尝了亡国奴的滋味。所以当听到巴黎分赃会议把山东权利让给日本时，就跟着北京学生掀起了五四运动。起初是大中学生，很快的就波及到各界人民群众，声势是很浩大的。

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为当时群众大会的中心会场。会后，群众即涌向大街游行示威，号召商人罢市，向市民宣传，喊口号。这时正当夏季，虽然赤日当空，但群众的爱国热情却分外高涨。军警的凶恶是挡不住热血沸腾的群众的英勇冲锋的。军阀马良以军警包围各学校，警察厅也出动了马队，各校学生就把标语旗帜放在口袋内，越墙而出。一声口令，立即挥动标语旗帜，结成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怒吼的声音，唤醒了沿街的大小商号，店员们纷纷行动起来，摆脱资本家的节制，关上大门罢市了。店员们有的参加了学生队伍，有的抬着糕点，随行在学生队伍的两旁作慰劳队。

济南的西门大街是最繁华的一条街道，西门是城里与商埠的交通孔道。有一次军阀为割断学生的队伍，把这条孔道武装封锁了，用刺刀和枪把把学生的去路挡住了，手无寸铁的学生有的被打，有的受伤。在城外的女同学忍不住了，涌起一股怒流，奋勇当先，冲了上去。凶恶的军警呆住了，一个个手足无措，像土鸡瓦狗一样蜷伏在路旁。学生们胜利了，巨流又汇合起来了，整个的济南成了学生的世界、群众的世界。

当时学生对军阀的压迫爱国运动十分愤恨，选出代表对军阀提出几项要求，主要的是："学生有集会和言论自由权"、"学生有罢课权"、"抵制日货" 等。军阀把学生的代表扣下了。这真如火上加油，群情更加激愤了，决定日以继夜的守着大街，不眠不食反抗到底，不获胜利，决不回校。

夜虽深了，但夜间的温度并不比白天低。满街是学生，男的、女的，他们严肃的守着西门大街。军阀想堵绝学生的道路没有成功，学生反把军阀的交通堵绝了。一天一夜快过去了，济南的军阀不得不屈服，释放了学生代表，答应了学生的要求，群众终于胜利了。

这次运动提出的口号是："反对中国在巴黎和会签字"、"反对把山东权利让给日本"、"反对与日本直接交涉"（因为当时日本提出青岛问题

是要与中国直接交涉)、“要求收回青岛和胶济铁路”、“反对日本修筑高徐、顺济铁路”(当时盛传日本要修高密到徐州、济南到顺德两条铁路)。

回忆五四运动爆发，当学生们听到北洋军阀政府要在巴黎会议上签字的消息时，很多学生声泪俱下，愤慨万分。女子师范附属小学教员王某（女）为义愤所激，破指血书“沥血诚苦告同胞，凭良心提倡国货”的誓言，来鼓动人心。

那时群众没有组织经验，也没有理论指导，但群众却创造了“十人团组织”，每十人为一组，组织的目的是互相鼓励爱国行动，互相监督不买日货。

三、赎路运动

虽然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在群众压力之下拒绝签字，但日本在山东攫取的一切权利，却须由中国人民另行付出血汗的代价来赎回。学生们都刻苦生活，响应赎路运动，用捐款在济南设立国货商店，很受群众的拥护和扶持，营业情况很发达。

四、军阀的血腥镇压

军阀是帝国主义的鹰犬这一事实，在这次爱国运动中十分露骨地表现出来。军阀不让人民有爱国运动，无理地逮捕学生代表，横蛮凶恶地以武装把学生押到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礼堂上训话。军阀马良说：“学生没有爱国的资格。没有兵力，没有武器，凭什么爱国?学生的本分只能是读书，荒废学业、干涉国家大事是犯法行为。”当时有姓吴的女同学起而据理争辩，马良令其马队将吴生双手缚在板凳上，灭绝人性的拷打，英雄的吴生没有喊叫，刹时手面浮肿，血迹斑斑。满堂同学，含泪忍悲，怒愤填胸。这些军阀把学生视作大敌，残暴的把运动镇压下去，最后马良还枪杀了爱国志士马白哥（这个名字，我是按当时人们口传的字音记的，可能不正确)。

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最后拒绝签字，是完全受了群众的压力才这样作的，这使当时群众稍微出了一口气。

五四时期山东各界的爱国运动

黄秀珍

五四运动爆发的那年，我刚好十二岁，在济南县西巷竞进女校里念高小三年级（旧制高小三年毕业)。这个运动对山东地区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虽然山东各界参与运动的详细过程，我已无法回忆，但某些片断的史实，我的印象至今还十分深刻。

我记得，大概是五四运动爆发后的第二天，济南报纸就以头号标题刊载了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我上学时，亲眼看见老师们挤在一起读报，脸上流露了兴奋和惊奇的神色。根据以前的经验，我明白这一定又是什么事情发生了。

不久，济南的学生也行动起来了，各校互相串连酝酿。有几个年纪大一点的同学被推为学生代表去校外开会。由他们后来的传达里，我知道北京爆发了学生的爱国示威运动，这里的学生也在积极响应。由于各校已接到命令严厉禁止学生上街活动，学校对我们的防范十分严密。那时，济南空气紧张，连城门也被政府封闭了。

但是，为了声援北京学生的斗争，济南学生终于冲破了各种障碍，联合去西门大街省政府游行、请愿，并且在那里熬过了一个通宵。这个斗争反映了全体人民的要求，除了一般学校学生外，它还得到了教会学校全体学生的支持，远在城外的齐鲁大学学生也赶来参加了。

紧接着，济南各界又联合展开了抵制日货的运动。我记得，有一天我们上街游行，虽然当天正下着倾盆大雨，可是，我们的队伍却依

然继续在前进，情绪十分热烈。许多商家于沿途设立了茶水站来招待我们，有的还给我们送来了成袋面粉、水果和糕点。这一天，商界罢市，各店门口都贴上了罢市的白条，上面写着“青岛不签字”、“惩办卖国贼”等口号，明显地表示了我们斗争的目标。这次游行、罢市把运动推向了最高潮，以后它就逐渐地深入到各地去。

不久，学校放了假，除一部分同学仍然留在学校里继续工作以外，其余的则组织宣传团去各地宣传、活动。

我的老家在胶东诸城的相州镇。当时，我父亲在济南法政专门学校里当职员，暑假时他带着我回老家去看祖父母。不久，济南的学生代表团也来到了此地。由于胶济铁路当时已被日本人侵占，他们就不坐火车，改由水路前往。代表团到了以后，我们就和当地的学生一道，展开了抵制日货的斗争。

本来，这里的教员学生受了北京、天津、济南等地学生运动的激荡，正在进行着爱国的活动。济南学生代表来了以后，相州镇的小学立刻开会欢迎，并且还组织了一个相当规模的群众大会，进行宣传、鼓动。这个小学系我们王家族人所创办，教员、学生也多半都是王家人，父亲在这里又教过课，彼此关系很深。我们利用这些关系和他们师生打成一片，去乡下宣传，收到了很大的效果。农民认识到抵制日货的伟大意义，情愿多花些钱也要买用国货，妇女们也重新学习纺纱，机匠也用土线织起布来。一提起日本帝国主义者对我国的侵略，没有不咬牙切齿的。显然，这个运动已深深地激动了他们的心弦。

山东诸城离青岛只有一百八十里，受帝国主义者经济侵略的毒害很深。这里的民族工业和民间原有的手工业，在日货的泛滥下，早已冲毁殆尽。那时，乡下年青的妇女都不会纺纱织布，年纪大一些的虽然还懂得，但也没有纺棉花的。他们用从日本进口的“大洋线”来合股做成缝衣用的棉线。一般人穿的“大洋线布”，也是用这种日本纱织成的。除了纱布以外，民间所用的肥皂、暖水瓶、瓷器、儿童玩具以及妇女用的发夹、扁簪等，几乎没有一项不是来自日本。最可恨的是，为了破坏我国的金融制度，日本还伪造了大量的铜币，混在我国铜币内流通使用。这种铜币的质量极为低劣，一见就可以看出。广大人民受到了爱国的教育，对这种铜币都拒绝使用。于是，日本帝国主

义分子和奸商便用醋把铜元放在锅里炒拌，使它与旧铜元具有同样的颜色，难于分辨，因而给我国的金融市场造成了很大的混乱。这里可以看出，日本对我国经济侵略手段之毒辣，以及当时群众要求抵制日货的迫切。

那时，日本一方面以大量日用品向我国倾销，另一方面却又大量收购我国的农副产品，其中尤以鸡蛋的数量为多。当时，我们禁止鸡蛋出口，以免为日本所利用，鸡蛋价因此大落，七个小铜板就可以买十个。这对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打击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日本资本家这时在济南、青岛等地还创办了一些工厂。他们仗着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势力，对中国工人压榨得很厉害，特别是那些工厂里的日本工头，凶神恶煞都像活阎罗似的。他们对于中国工人的压迫和剥削，引起了各界同胞强烈的仇恨。山东各地抵制日货运动其所以能够迅速开展，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是分不开的。

暑假以后，父亲带我回到了济南。这时济南教育界的空气已经有所不同，新杂志和新刊物也大量出现，我在父亲那里就曾看见过《新青年》、《少年中国》和《曙光》等刊物。新文化运动像洪水一样地涌来。虽然教育界还有少数封建主义分子在企图负隅顽抗，但面对着这一股强大的洪流，他们又能起些什么作用呢？不久，济南各校学生有的就开始用白话文作文，学校里也开始选用白话文教材来教课了。

（黄秀珍同志口述，康右铭记录、整理）

五四时期的安徽学生运动

周新民

五四运动四十周年的纪念日到了。我在五四时期，即从 1919 年五四运动到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都在安徽参加学生运动，并且在六二惨案爆发后，担任过安徽全省学生联合会副会长。今天为纪念五四运动四十周年，特将五四时期的安徽学生运动作一简略的叙述。

一、安徽学生响应五四运动的经过

北京学生以中国外交在巴黎分赃会议上完全失败，于 1919 年 5 月 4 日集合五千余人，爆发了空前的爱国大示威，要求惩办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并且痛殴了章宗祥（驻日公使，即奉段祺瑞命与曹汝霖以“欣然同意”的换文送与日本者），焚毁了曹汝霖（交通总长，与陆宗舆均为二十一条的签订者）的住宅。号召全国人民“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实行“拒绝和约签字”，“废除二十一条”，“誓死争回青岛”，“抵制日货”。当时北京政府派武装军警弹压，大批学生当场被殴被捕。这个消息传到安徽，激起了安庆、芜湖及其他各县学生的愤慨，纷纷示威游行，响应五四运动。安庆各校学生于 5 月 6 日在安徽公立法政专门学校（以下简称法专）开代表会议，出席的一百多人，其中主要的为法专代表万诚（即万心斋，巢县人，1927 年蒋介石清党时，被芜湖特务密捕，把他装进麻袋，投入大江）、周骏（从 1928 年改名周新民）、童汉璋（合肥县人，抗战期间参加新四

军工作，积劳病故）、宋伟年、李鸿典（即李仲宾）等，第一师范代表方乐周（即方洛舟，1926 年赴苏联学习，一度回到哈尔滨工作，迄今无下落）、常万元、王先强、胡养蒙（以上二人已病故）等，第一中学代表朱源（即朱子帆，现任安徽省人民委员会委员）、储应时（现名储一石，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参事室主任）等，第一女师代表史佩英、房硕民（以上二人已病故）、张绮先等，甲种工业代表舒传贤（即夏唯宁，霍山县舒家庙人，豫鄂皖红军创立人，早在大别山牺牲）、许厚森、方玉霞，第一农业代表余大化（即余鉴民，在潜山农民暴动时与余良鳌同志等同时牺牲）、许厚森、方玉霞、童正常等，安庆市邑中学代表为王步文（约在 1931 年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在安庆悲壮牺牲）、朱子清（现任兰州大学教授）等，圣保罗学校代表为章××（太湖县人）、许丙松（庐江县人）等。此外，女职、培媛女校、座堂学校亦各派代表参加。经主席报告北京学生示威游行和被捕被殴情况，大家均极悲愤，有的痛哭失声，当场决议于 5 月 8 日集合安庆各校学生游行示威。到了那一天，上午九时各校学生即齐集黄家操场，约有三四千余人。先开大会，各校代表踊跃发言，并通过宣言，致电国际联盟大会力争国权。同时，警告北京政府不许在和约上签字卖国，要求迅速释放被捕学生，罢免卖国贼曹、陆、章，并决议成立安徽全省学生联合会筹委会。大会结束后，立即结队示威游行，高呼：反对日本侵略，抵制日货，惩办卖国贼曹、陆、章等口号。沿途市民多受感动，有的自动参加游行，有的随同高呼口号。当时安徽反动军政首脑倪嗣冲正在病中，他的军务帮办马联甲虽派大批军警戒备，但以群情愤极，不敢马上采取武力镇压。

当时芜湖学校林立，学生一闻五四运动爆发，立即组织示威游行，与安庆学生配合起来。芜湖各校代表，主要的是：二农薛卓汉（在皖北农民暴动时牺牲）、王持华等，二女师杨仪贞、方金鸾、李相珏等，五中胡苏明、李宗邺等，萃文学校翟宗文（已病故）、翟光炽等。经过他们的活动，不久即成立芜湖学生会，并作了安徽学联的有力支柱。

在安庆、芜湖学生示威游行后，安徽教育界和社会人士如史恕卿（即史大化）、刘希平、洪世奇（即洪子翊）、卢仲农、周松圃、沈子

修、朱蕴山、蔡晓舟等，对于学生运动均深表同情和支援。同时，总商会会长程鸣銮等亦同情学生主张，曾召开各行业代表大会，一致决议罢市三天，并组成安徽省各界抵制日货委员会，把空洞的反帝反封建的口号化为实际的行动。但是芜湖商会会长汤善福等则反对抵制日货，经学生一千多人包围商会，把他的头打破了，他才同意抵制日货。

二、安徽学生的组织和主要工作

安徽学生于游行结束后第六天（5 月 15 日），即组成临时工作机构，叫做安徽学生团。到了 5 月 25 日，召开各校学生代表会议，推举委员十五人，再由委员中互推正副会长，成立安徽全省学生联合会（以下简称安徽学联）。会长下设文书、宣传、组织、教育、经济、交际六股，各股设正副股长。安徽学联成立后，为了实行持久的爱国运动，特别是抵制日货运动，曾决定建立下列四个组织：

（1）设立国货检查所。该所由安徽学联、总商会、律师公会、农会共同组织，于 1919 年 6 月初成立，设在安庆南门外迎宾馆内。为避免日人借口，暂用检查国货的名义，目的是专门检查日货。关于实地检查的工作，则由学生会组织一个检查队，队员四十人，由各校学生轮值，分为四个小组，每小组十人，日班两个小组，分担上午和下午，夜班两个小组，分担上半夜和下半夜。怎样进行检查呢？长江上下轮船靠岸的时候，所有卸货都须先经检查队检查。如果发现日货或者情况可疑的货品，即予扣留。当时安庆有两大奸商：一为专销日本杂货的马聚盛商号；一为专销日本布匹的凤大成商号。他们的进货经学生查获多起，并予以相当处罚。查获的日货，曾在南门外和黄家操场当众销毁多次。还有一部分发交总商会拍卖充公。处理如此严肃，个别奸商不敢由轮船下货，乃改用驳船卸运，驶至小港汊卸货，后来亦被检查队发觉，分别给以处罚，奸商始不敢再用此鬼计。检查队支持很久，成绩亦很大，这是由于检查队的成员纯洁，爱国热忱很高，能够不分昼夜、不避风雨、不畏饥寒、不怕奸商暗害和军警阻挠去检查货物，博得群众的热爱。在天热的时候，群众经常送茶水；一遇下

雨，有的借给雨伞和胶鞋。同时，码头工人对学生检查日货，更给以极大的帮助。这是爱国青年和劳动人民结成阶级友爱的具体表现。

（2）开设国货贩卖部。抵制日货必须提倡国货，故安徽学联于1919年7月间曾在安庆倒爬狮子街设一国货贩卖部，专门收集一女师、女职、培元女校、甲种工业学生的手工制品和化学用品来贩卖。这些物品，都是学生牺牲自己的精力和学业来制成的，不只表示着学生的爱国热情，亦足以启发群众的政治觉悟。

（3）创办义务小学校。安徽学联于1919年8月间，在怀宁县学宫设立义务小学校一所，由胡养蒙、王光强主办。这个小学第一批学生七八十人，均系劳苦人民的子弟，并经常召开家长会议，对家长灌输爱国反日的思想。

（4）组织街头宣传队。为了唤起群众爱国反日，安徽学联曾组织一个宣传队，上街宣传，内分若干小组，每组若干人，划分一定地区。组员由各校学生轮流担任，每星期日分上下午两班出动。讲演时大多声泪俱下，听众极为感动。

安徽学联初成立，即能有计划有步骤地做了上述一系列的工作，主要原因是有一批进步青年如方乐周等做了骨干，他们受了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安徽五四运动不只为后来教育革新、六二惨案、推翻三届省议会、驱逐省长李兆珍诸运动创造了条件，也为中国共产党在安徽建立组织打下了基础。

三、安徽教育的革新运动

安徽自从癸丑讨袁（1913年）失败以后，北洋军阀倪嗣冲率部盘踞安徽，掌握军政大权，一面捕杀残余的革命党人，防止革命在安徽再起，一面培养狐群狗党，把持了一切机关学校。当时倪嗣冲在军事上仅有五个混成旅，六十个营，实际上并不止此数。他的军队经常发生叛变，烧杀淫掳，到处扰乱人民。他在政治上组织一个公益维持会，总会设在安庆，分会设在各县，所有地主豪绅、官僚恶棍无一不争先恐后地加入该会，视该会为争权夺利的捷径。当时不只政府机关人员必须参加公益维持会，就是学校校长亦多是它的成员。因此，各

校校长大多视学校为厘金差缺，公然贪污，恬不知耻。到了五四运动爆发以后，安徽学生日渐觉悟，对当时政治和教育极感不满，首先反对“盐斤加价”，就是反对倪嗣冲任意增加人民吃盐的卖价。这一运动获得胜利，鼓舞了安徽学联有进行教育革新的决心和勇气。怎样进行教育革新呢？首先要把倪嗣冲嫡系的一群校长，如安庆的法专、一师，芜湖的五中等校的校长赶走，另选一批为学生所拥护的校长。现在把这些斗争的经过叙述于下。

当时安徽高等学校只有一个法专。这个学校在安徽历史较久，由江淮大学改办的。该校校长张鼎丞是个贪污腐化的官僚。到校以后，只知奉承倪嗣冲的意旨，把学校办得很糟。1919年冬，经周骏、童汉璋、宋伟军、李鸿典等发起反张运动，张鼎丞恃有政治奥援，用尽一切卑劣手段，甚至雇用流氓打手，最后仍被我们驱逐离校。可是1920年秋，又来一个腐败官僚丁述明做校长，丁述明到校接事的时侯，如前清新官上任一样，坐着四人抬着的大轿子，前呼后拥地来到任。法专学生首先堵住校门，不准他进入校里，他竟借用警察力量冲进来。因而激起学生罢课、教员罢教，达四十多日。当时师生一致要求改派法学家光升（即光明甫，桐城县人，为中国民主同盟创立人之一，现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安徽省委员会副主席）来长该校。光先生在安徽声望很高，原为江淮大学的创立人，因革命失败逃亡京沪。安徽反动当局对他当然不欢迎，因学生坚决要求，安徽旅沪同乡又推派张鸿鼎（即张已振，解放后曾任华东司法部副部长，现已病故）、汪叔潜回皖为助，省当局被迫改派光先生为该校校长。

一师校长原为省议会副议长赵继椿。他以出身世家（四代翰林），得到倪嗣冲的信任，办学只知迎合当道，压迫学生。一师学生多系贫寒子弟，要求进步更为迫切。在法专改组的同时，一师学生方乐周、王先强等发动风潮，坚决反对赵继椿，欢迎老教育家李德膏（即李光炯，安徽枞阳县人，前清季年在云南、湖南办学，成绩甚好，回皖后在芜湖办安徽公学，培养革命骨干）来长该校。省当局以学生要求坚决，不得不改派李先生为该校校长。

法专和一师易长斗争获得胜利后，安徽教育的革新运动已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芜湖五中校长潘光祖亦是倪嗣冲的爪牙，该校学生久想

驱逐潘光祖而未发动，到了法专和一师先后改组后，立即罢课反潘，欢迎革命前辈刘希平来长该校，不久亦达到目的。

上述三个学校接连改组，是安徽教育革新的关键，因为李、光、刘三校长在安徽教育界声望很高，对政治上并有一致的看法和做法。安徽教育界有了他们三个人做中心，不久就把安庆一女师校长徐皋浦（安徽省教育会会长），甲工校长史浩然，女职校长李寅恭，芜湖二女师校长阮强（即阮仲勉），二农校长王蔼儒，滁州十中校长王雨湘，公职校长时绍武等，团结在一起，组成安徽省教职员联合会。每遇到教育界有重大问题发生，即事先协商，分途进行。如有必须发表文字的，则由阮强老先生领衔，因为他的年纪最大，在安徽威望又高，皖人多尊之为圣人，在前清曾任安庆敬敷书院院长，许世英、吕调元等均是他的学生。

四、安徽六二惨案发生的始末

安庆各校学生于1921年6月2日下午5时左右，忽闻省议会迎合军阀倪道烺（倪嗣冲的胞侄）、马联甲（皖南镇守使兼安徽军务帮办）的意图，拟提议削减已经决定增加的教育经费，而以之增加军费，群情愤慨，纷纷结队到省议会请愿。其时，省议员正在公宴马联甲，忽看见大批学生示威游行，高呼口号，马联甲大怒，悍然下令卫兵开枪狙击，弹如雨下，学生奋不顾身，前仆后继地向前冲，宁死不退。当时受伤的五十余人，以一师学生姜高琦、戴文秀和一中学生周肇基为最重。姜高琦身受七刀，血流遍地。周肇基受伤甚重，还被马联甲卫士抓入省议会门房拘押。适值法专光校长赶到现场，直接冲进省议会，质问马联甲。光校长刚入省议会大门，即看见周肇基遍身是血，卧在门房里，他一手拉着周肇基，一手指着马联甲，责问他屠杀青年应负何罪，并且厉声地说：两国交战，对受伤的俘虏还应急送医院拯救，为什么你对受伤的学生竟扣留不放呢？马联甲蛮不讲理，即对光校长劈面一掌，把他的眼镜打碎了。光校长亦毫不示弱，立即回手直批其颊。旋经省议员们从中拉开，光校长首先派人送周肇基入医院，自己即到省教育会里召集各校长开紧急会议，通电省内外宣布马

联甲杀人罪状。在倪嗣冲统治安徽时期，光校长以一介书生而敢与手握重兵的军阀相抗衡，其伟大气魄在当时还是少见少闻的，所以安徽人民对他是很尊敬的。

六二惨案发生的第二天，各校学生一律罢课，分组上街讲演，开展了反倪反马斗争。各校教职员罢教，商店罢市，工厂罢工，都一致表示声援。同时，全国学联和京沪文教团体以及安徽旅外同乡，如北京王星拱、高一涵、程弢甫、李辛白等，上海常恒芳、王龙廷等，南京陶知行、洪范五等均通电声援，有的还派代表来皖慰问。

安徽学联成立后，由童正常、方乐周、储应时、童汉璋等先后任正副会长。六二惨案爆发后，为了加强领导，各校学生增添一批代表，并改选舒传贤为会长，周骏为副会长。同时，由法专校长光升、一师校长李德膏、五中校长刘希平、一女师校长徐膏浦、三农校长沈子修以及教育界进步人士如洪士奇、周松圃、高语罕、卢仲农、王肖山等发起组织安徽六二惨案后援会。该会的组成，主要的是团体会员，如安徽学联、省教育会、教职员联合会、商会、农会、律师公会、报界联合会、西医学会等十几个团体。首先通电声讨倪道烺（实际上他代行倪嗣冲的职权，支持马联甲屠杀学生）、马联甲屠杀学生的罪行，并推定储应时、张本国、黎衍宜等代表起诉，申请依法判决。后以怀宁地方检察厅长刘以芾因倪、马势力太大，久延不理，派代表往催，又不肯接见。有一次，芜湖学生代表适在路上同刘以芾相遇，强要他一同往见省长聂宪藩理论，聂被迫接受代表的要求，电请北京政府撤换渎职的刘以芾。后来该案虽移转江西法院管辖，但以乌鸦到处一般黑，没有真正依法判处倪、马的罪刑。

为使姜案早得解决，曾推派胡霁澄（曾任法专校长）代表赴京，要求撤销倪道烺、马联甲的职务。不料事被倪、马所侦悉，倪、马密派暗探，随胡霁澄前往，在开封下车的时候，杀害了胡霁澄。

所有姜案的诉状和重要文电，完全出自洪世奇先生（霍山县管家渡人）的手笔。洪先生人极精明，头脑细密，文笔生动，写出的文字，句句字字有力，使人无法可驳。他为了起草文件，经常多夜不睡，关门思索，他以积劳过度，曾吐血多次，一直卧病不起。他对青年尤极爱护，看到各人的长短都要说出来，鼓励每个青年发扬优点，

改正缺点。可惜他在大革命时期即已病死。他在安徽教育革新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应与李、光、刘三校长相等，故我辈至今还悼念不已。

姜高琦垂死之前，经周骏和吴某先后给他输血，亦无法挽救，至7月1日停止最后呼吸。姜高琦死了不久，周肇基亦因伤发而死，合葬在安庆东门外菱湖公园。姜、周相继逝世，安徽各界均极悲愤，开过大规模的追悼会，在挽词中已充分表现着合法斗争不能解决问题，非进一步进行革命不可。安徽学联的挽联："倪道烺可杀，马联甲可杀，昧良刘赵更可杀，大敌当前，唤醒国魂此雄鬼；省议员无耻，司法官无耻，助恶士类更无耻，人心不死，誓拼热血溅群魔。"安徽省教育会挽词："无端麟凤供鳬脯；如此江山待拔除。"上述两联，一是代表学生，一是代表教育界，虽是口气有不同，而要求改造那样腐败的社会则是一致的。

五、推翻三届省议会和驱逐省长李兆珍

倪嗣冲为了巩固他的军政大权，多年来一贯地控制省议会，要使一百零八个省议员都做他的驯服工具。怎样控制省议会呢？首先把持省议员的选举，要让所指定的人都能选出来，他所反对的人一个也选不上，省议员变成了倪系的清一色。他为保证达到他的要求，首先从伪造选举册入手，不问年龄大小，只要经过他的走狗审查过，凡是认为某某可靠的，就把他的姓名列上，认为某某不可靠的，就把他的姓名剔掉。甚至死了多年，还把他的姓名摆在选举册上，以便多占一个选票。笑话百出，无奇不有。倪嗣冲通过公益维持会来包办选举，指定何人，何人即有权当选，并且津贴每人活动费三万元到四万元，作为公开买票的费用。投票时不让本人去投票，由买票的人雇人代写，整批投柜，所以选票上的笔迹多是一样的。

省议会既为倪嗣冲的御用工具，当然它在安徽作恶多端。我们要削弱倪嗣冲的势力，必须动员一切力量，推翻贿选的三届省议会。当时省议会选举法有一条规定，就是省议员的选举有一县无效了，全部即应作为无效。我们抓住这个弱点，首先利用1921年暑假，发动省、芜各校学生分县组织起来，回县调查选举舞弊情况，搜集各种不法证

据，就近向法院起诉。当时起诉的达四十多县，各县法院均以案件太大，抱着观望态度。后以我方的证据确凿，无法拖延，无为县首先判决省议员选举为无效。这个消息一经传出，各县法院纷纷援例判决，省长许世英也不得不宣布三届省议会为无效。已经选出的议员，全部作为无效，在中国是创举，在外国也是少见的。这件事，是给倪嗣冲系统以致命的打击。

三届省议员全部无效后，倪道烺仍不甘心，于1921年秋，又以四十万元贿买国务总理靳云鹏发表他的老师李兆珍做安徽省长，意在镇压学生，巩固统治。安徽学联忽闻这个消息，深为痛愤，决定拒绝李兆珍来皖接事，立即组织大批同学日夜轮班沿江巡视。后来李兆珍化装从安庆小南门混进省长公署，各校学生闻之更为愤恨，决定继续罢课，并发动罢工、罢市。为了保证罢市有秩序，并且能持久，不要中途发生动摇和纠纷，各校学生分段包干，分班轮值，每天早上五点钟即上街，各人站在一定位置，彼此间有一定距离可以互相照顾。遇有个别商人开门，即对他进行宣传，商人亦立即关门。因此，全市成了死市，商店无一家做生意。这样坚持到第三天，安庆市民在黄家操场开了一个大会，散会后结队赴省长公署，要李兆珍立即滚回去，高呼驱李口号，声震全市。市民越集越多，把省长公署的东西辕门包围得像一个铁桶。后来守衔士兵以木棍、石子驱打群众，并且开枪威吓，群众还是奋勇抵抗。在这次运动中，有芜湖二农教员王肖山和市民多人受了伤。至此，李兆珍认为大势已去，无法干下去，又化装从旁门溜走。不久，北京政府派许世英继任省长。

六、五四运动引导我走上革命道路

我在五四运动前，思想还是很落后的，处处为了个人打算，只希望做个有品有学的好学生，将来能在社会上站住脚。到了五四运动爆发以后，我才为爱国热情所驱使，走出学校大门，参加了学生运动。在学生运动中，使我不断地受到教育和锻炼，我的眼睛才明亮些，我的头脑才清醒些，逐渐认识今后应走的方向。如果没有五四运动来引导我，我一定要走不少错路和弯路，决不能早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

所以领导我长期的作革命斗争的是中国共产党，引导我走上革命道路，早年就争取入党的是五四运动。今年回忆起来，我要感谢党多年来教育了我，我要感谢五四运动启发了我。同时，我永远不能忘记许多革命先烈在当年怎样帮助我，鼓励我早日做个共产党员。我为答谢党和革命先烈，只有抓紧时间，集中精力，在党、毛主席领导下，为党和人民多做工作。

最后，关于五四时期安徽的学生运动的经过，我虽然写了许多字，还是很简略的。因为时间和篇幅既有限制，我保留的材料又早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散失干净，现在只凭个人的记忆和老友宋伟年的帮助写成此稿，其叙述不但不详尽，一定还有不少的错误。现以五四运动四十周年的纪念日到了，不能再等，只得把它作为初稿，先行发表，以后再行更正和补充。

五四期间的武汉学生运动

杨　松

在二十年前五四运动时，我只有十一岁，正是刚从闭塞的多山的农村——湖北××北乡××山麓，私自同一个叔伯哥哥跑到了武昌城。后来我的父亲把我送到湖北省立××小学念书，校址在×××。当五四运动的怒潮由北京流到武汉时，我们小学生也曾手拿小旗，跟着大学生到街上喊口号。当时我们只知道“要爱国”，“要打倒欺骗我们中国人的日本”，别的事情，知道的却很少。

当时我住在武昌蛇山坡凰凤窝×××，靠近武昌高师，即后来的武大。有一天清早，当我背着书包上学时，忽然发现了许多军警把高师包围起来了，因为我们住在山坡上，曾经看得清清楚楚的。后来知道了，这是当时北洋军阀湖北督军王占元所派的军警，逮捕了许多爱国的学生，禁止学生出来游行示威。这件事情给我一个反感，曾经想：“学生为什么不能爱国呢？难道爱国也犯罪么！”

后来我转学到一师附小了。教员冯文清先生，在课堂内向我们讲了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并介绍我们多看新出版的文学书和杂志刊物。开始我喜欢读文学书籍，后来爱读《中国青年》。《中国青年》使我的思想起了大变化，把我引上了革命的道路。

后来又在教员刘季良、钱亦石、董必武、陈潭秋等革命前辈影响之下，先加入了国民党，后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在五四运动后，在湖北青年中组织了许多青年团体，成立了湖北全省青年团体联合

会。现在中共领导者之一的王明同志及八路军著名的将领林彪同志，都曾是当时湖北青年运动的领袖。

（原载《中国青年》第1卷第2期，第11～12页，原题《感想与回忆》）

五四时期武汉地区的工人运动

张　浩

一、五四普及到偏僻的乡间

我记得在1919年5月底的时候，我正在汗流浃背的浆纱，乐浦笑嘻嘻告诉我说："你拿什么东西谢我?"接着说："我到回龙山去买东西记起了你托我的话，到邮政代办所去看是否有湘浦的回信，果然不错，有一封从北京来的单挂号，我拿着就一口气的跑回来了。快看！不，快念给我们大家听!"我当时不自觉的很快的用抹衣[1]把手拭干，又用袖子把眼上的汗擦了一擦，拿着信便带看带念："八哥：前回告诉你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完全失败的事情，把我们大家气死了，末后大家商量，气是没有用的，我们要大家干！我们今天都到了天安门去开示威大会：又蜂拥到赵家楼去打卖国贼：曹汝霖的房子被我们烧了，章宗祥被我们打了，我今天才看着我们群众的力量！……我再告诉你，我们有很多的同学被捕去了，我也只差一点就被捕了，我们一点也不害怕，我们要干到底，亡国奴不是人当的！八哥！你记得韩国亡国惨痛故事么？我们誓死不做亡国奴！你们在乡下也干起来吧！……"我一口气的念下去，有时高兴的笑着，有时咬着牙齿发气，最后鼓起劲来似乎也要决定干的样子。当时湾下的人听说北京"本儿"

[1] 俗语：围裙式的工衣。

回了信，又看见乐浦气得哭了，以及我念信时的那付神气，于是越集越多，要我再念一遍，我于是又带念带解释给他们听，他们听了又气！又恨！又喜！又怕！气的是洋鬼子不讲道理，恨的是卖国贼不争气，喜的是那些学生子不错，怕的是做亡国奴！大家听了之后，有一部分人确实想干，但因为不知道怎样干，干来干去，干不出一个头绪来，反碰了许多的钉子。不过在碰钉子的过程中却把我们三人结得更紧了一些，其他的人仍然是做工的做工，种田的种田，打牌的打牌，玩的仍然是玩，结果只落得“两个湾里三个好人”的一句评语！

二、乡下来了一群特别的人

快要过年的时候，我们在回龙山看见一个学生子背着一个大包袱（有人说是一袋面，有人说是他自己的行李），大踏步的旁若无人的直向前走去。大家都看着称奇！后面正有许多大人小孩跟着他跑，想看一看他的面孔。我问旁边的人：他是谁？才知道他就是刘吉山，是有名富户戴家冲刘家的少爷，在武昌某中学念书，因放年假回家。他家原很有钱，为什么刘少爷要自己背东西？我不明白，大家都不明白！有人很关心的说：恐怕是疯了！

过了几天湘浦也回到家乡来了，我们会着了，高兴得要死！我告诉他：我们在乡下碰了许多钉子，始终干不起来，说时很觉惭愧。他一面安慰我，一面详说，他们做了许多轰轰烈烈的事，结了很多的朋友，北京也有，武汉也有，湖南也有，并说他们在武昌横街开了一个利群书社。他最高兴的，是一个姓恽的朋友，他说他当教员同我们当学生的结朋友，他家里穷得要命，他自己赚的钱只留下一小部分给家里吃饭，其余的都拿来帮助穷学生念书；他的主张怎样好，办法怎样多，并说到他们想在我们乡下办一个小学校等等。这一段话把我听出了神：如今世界竟有这样的好人？可惜我不能早会着他，不能够得着读书的机会，真是没有“运气”。自此以后，我总是想着那个姓恽的！

湘浦回来以后，有许多念书人找着我结朋友，我总有点莫名其妙！湘浦到他的念书的朋友家里去，经常总是要我同他一道儿去。有时候我也同去。有时候到太有钱的人家，我总是不敢去，甚至到了门

口我还是不敢进去，到了那些人家以后，我总是忐忑不安！湘浦经常向我解释说："你不要说你做工是下等人，不配同我们在一道儿！其实我们这些人靠着父亲赚些黑心钱来念书，吃好的喝好的，过寄生虫的生活，才是真正的下等人呢！你们做工，从小处说是自食其力，从大处说，社会就非有你们不可，你们才真正是上等人呢！俄国的工人，不是正在管理国家么？"我想想也不错，后来大家都同我很要好，我也慢慢的习惯了。有一次我会着刘家大少爷，我问："你为什么要自己背行李回来？"他说："你还不知道么？劳工神圣！要是在去年，我们都不会同你们做朋友呢！"

1920年春，学校办起来了，获得了我们户长大伯的帮助，我也算是发起人之一，地址设在白洋山八斗湾的一个家庙里，起名"濬新小学"。教员起初是一个姓胡的，后来这位教员被杨家岭刘家用钱抢过去了，于是又从武昌请来了一个不要钱的唐际盛，是姓恽的和湘浦他们的朋友。我初次问他："唐先生是那里人"他说："岩下！"他像一个基督教徒一样，同什么人都要好，特别是对老年人小孩子合得来，大家很相信他，把十七八岁的大姑娘都送到学校里去念书，好像是忘记了唐先生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似的。当时的人们，那里料想得到在这样一个启蒙的学校里，竟培养出了一个今天的林彪呢！

三、到青年学生和产业工人中去

有一天（大约是1920年的夏天）育黎、育蓉来说："八哥！学校来了客人，叫你去！"我问："是那里来的？姓什么？"他们说："汉口来的，姓恽。"我就赶忙的一口气跑了去，到了学校，看见一个人穿旧蓝布长褂，很细长的袖子，一个和尚头，人同脸都是瘦长瘦长的，戴一架眼镜，如果把这架眼镜去掉，或者是换一架旧式的玳瑁镜，则活像一个"游学先生"[1]。我看见他站着又说又笑的，时常把手抹汗，我有点"那个"，好像不像我所想像的那个姓恽的一样。还有两个坐在旁边听着，笑着。湘浦笑着告诉我说："这就是你常想会

---

[1] 这时我对代英同志的观察自然很浅薄，后来才知道他其实是一个内心极冷静的人。

着的那位姓恽的先生，他的名字叫做代英！”他立即笑着说：“这就是我们唯一的工人朋友么？好极了！好极了！”接着刘光国、卢春山等二三十个人都来了。我们生活在一块儿，总是热烘烘的被他吸引着，就连他在吃饭的时候，也常是说着笑着！虽然过着很艰苦的生活，因为内中大部分是很穷苦的学生，但我们都觉得有无穷尽的光明的前途！我们有时候高兴起来，想吃东西，于是大家约着打“拼伙”[1]到几里路外去买花生吃。他们说这是对穷光蛋最好的东西，又便宜，又好吃，又补人！我们大家在一块儿开了好几天的会。他们说的话，对我非常生疏，现在很难记忆，我只知道当时成立了一个共存社。会后有到武汉的，到四川的，到安徽的，都分散了！他们主张我到上海去做工。我过去以为做工是不得已的，从那时起，我就以做工为光荣了，也不怕“乡下人上街”的闹笑话，决然的到上海日商××染织工厂去做工。当我从上海回到武汉以后，湘浦从远东大会回来，主张取消共存社，自愿的分别的加入中国共产党。于是情形顿然大变了：唐际盛在粤汉路的徐家棚，项德隆（项英）在江岸，许白昊在汉阳钢铁厂，我则从利群毛巾厂到武汉模范大工厂，湘浦同施洋办《真报》，求实办《日日新报》，张心余办《湖广新闻》。实际工作的推动，报纸的鼓吹，武汉的工人组织如雨后春笋，蓬蓬勃勃的发展起来了！罢工斗争，不断的发生，轰轰烈烈，盛极一时，二七则成为这一高潮的顶点。我总记得：党派我到黄石港石窑去做代表，是代英去预支他的薪水凑成的路费[2]。我也不能忘记：我当“交通”去汉阳探听钢铁厂罢工消息，提出一个“打倒工贼韩老三”的口号，挽救了罢工，使之转败为胜。直到现在，我还念念不忘当“活交通”的味道！五四促进了二七，二七又推动了大革命！

（原载《中国青年》第1卷第2期，第14~17页，原题《感想与回忆》）

[1] 俗语，凑份儿的意思。

[2] 这给我留下一个特别深刻的印象，从此对于我们党的经费主要是依靠党员的党费这个事实，得到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五四”的浪花

夏之栩

1919年反帝爱国运动的浪潮，迅速从北京传遍了全国，武汉学校的学生也参加了这一伟大的运动，但那只限于男学校。当时湖北省的教育在南方来说比较落后，女子教育更甚，全省只有一个女子师范学校在武昌。另有一女子中学则更小，学生也更少，几乎知道的人也不太多似的。五四运动的浪潮当时还没有能够冲进这女师的封建高墙。

但是五四运动同时又是反封建的文化革命，它的威力必然要摧毁旧的封建堡垒的，湖北女师也不例外。两年之后，五四运动的火花，就在这个充满封建势力的湖北女师燃烧起来。

四十年前古老的武昌城，社会风气还十分闭塞，军阀王占元、萧耀南的土匪式的军队长期统治着这个古城。士兵和流氓的横行霸道，使青年妇女不敢单独出门。因此，女师学生平时不准外出，星期六回家也必须有家长接送，这种社会原因也占了主要成份。

湖北女师规模也不大，全校只五个班，学生仅250人左右，而且是五年制，每年只招一班。由于湖北全省女子小学根本少得可怜（当时小学也是男女分校），每年报考女师的也不过200人左右，但只收50名。当时考不取的女孩子能够得到家长的允许上女子中学，那是极少数的，因为那里要收学膳费。花钱给女孩子读书的家庭在当时是不多的，穷的花不起，富的不愿意。女师是官费，所以报名的就多了。

这个学校成立不过几年，我是第五班的学生，1918年入校。校舍

分前后两院，前院是附属女子小学，后院是师范班，中间有道门隔着，我们平时连这个门也不许出的。这个学校培养学生的目的有二：（1）做一个能教孩子读死书的小学教员；（2）做一个封建家庭的贤妻良母。

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随着五四运动的先进知识分子的传播，来到了中国。革命思想传播之迅速是封建统治阶级梦想不到的。和其他省市一样，武昌有了恽代英同志等组织的利群书社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刊物，1920年即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董必武、陈潭秋等同志又建立了湖北共产主义小组，马克思主义思想在青年思想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1921年，陈潭秋、刘子通等同志来到湖北女师第五班任教。陈潭秋同志教英文课，在课堂上没有办法宣传革命思想。正好刘子通同志教国文（即语文）课，这是从思想上给我们学生启蒙最便利的课程。他首先打破了我们只学古文，只写文言文的传统，从文字上解放了我们。当时我们虽然已是三年级，知识是极端贫乏的。记得刘子通同志第一次上课的时候，就问我们："今年是公历多少年?"我们答：不知道，只知道是民国十年。之后又问我们十月革命、五四运动等，我们一概不知。刘子通同志说："你们虽然在学校，却等于聋子瞎子一样。"从此，他就在选择教材的时候，尽量能把新的文学讲给我们听，一有机会就讲十月革命和妇女解放问题。妇女也能得到解放吗？这是当时班上最关心的问题，特别是一些年龄较大而又已经订了婚的同学。她们被封建礼教所束缚，又不满于自己的婚姻。她们又喜又愁，喜的是懂得了只有妇女得到解放才能有幸福的婚姻；愁的是困难重重，妇女又何时得到解放，自己又没有力量能冲出封建的囚笼。在暑假中，我们邀集了十几个同学发起组织了读书会，不限于我们一班，其他班上的同学也参加了一些。读书会经过利群书社帮助借了许多新书，又请董老、陈潭秋、黄员生等同志来作报告，使我们又得到了许多知识，思想上有了马克思主义的萌芽。

一年的时间匆匆过去了，我们一部分同学认为这是最有意义的一年。但是在当时的湖北省教育界，封建势力还占绝对的优势，女子读书已经被认为有些离经叛道。本应当安分守己，毕业回家作一个知书

识字的好奴隶，谁知竟敢在思想上竖起反旗，使那些“卫道者”的老先生们忍无可忍，在寒假后就向我们的老师开刀了。

湖北女师的校长王式玉本身也是旧学派分子，他为什么聘请陈潭秋、刘子通等同志来当教员呢？他是1918年来作校长的，在五四运动后，他看见新文化运动发展很迅速，也想迎合一下潮流，让学生不只学文言文，也学一点语体文，对于以后教小学生会方便一些。他不了解新文化运动并不是限于把文言变为白话而已，新文学还包含了新思想，这种新潮流是不可阻挡的。

1922年2月新学期开始，学校即宣布解聘刘子通同志，罪名是宣传“赤化”，等于“洪水猛兽”。我们只是一般的青年学生，毫无准备地投入了第一次斗争。我们十几个人决定全班罢课挽留，但又不会做宣传组织工作，就冒然地提出要求校长请刘先生回来，否则不上课。那些老奸巨滑的“卫道者”们，当然知道我们是毫无经验的毛孩子，于是采取了分化手段，提出愿罢课者签名。这时我们仍然认为全班平日都欢迎刘先生，决不怕签名，我们还天真地说：“怕什么，大家凭良心，签名就签名！”结果我们失败了，只有十二个人签了名，我们是少数，只好上课，学校当局当时也未给我们处分。

斗争失败了，我们还是不服气，这时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知道了，就派同志来教育我们说：革命斗争不是什么凭良心的事情，要做许多艰苦的群众工作；要有宣传，有联络，要能争取大多数同学由同情而自愿参加行动，才能取得胜利，失败了也要取得教训。

一个学期快要过去了，我们在团的同志（他们都是党员）直接教育下，有七八个同学被团组织吸收为团员。于是团的支部有了女团员，以后到妇女群众中去活动也就比较方便了。因为当时的环境是在军阀的统治之下，女同志要参加活动，特别是秘密开会，是很困难的。为了避免侦探，必须有几个开会和接头的据点，即具备这种条件的党员和团员的家庭。在我入团后，我的家就是很好的据点，因为我的母亲是由一个同情者进而为积极参加革命工作的战士。党的负责人陈潭秋、刘子通等同志，也经常以这个据点作为联系工作的地方，我们也因此能直接受到他们的教育。

当时湖北教育界的封建势力虽然赶走了刘子通同志，也决不轻易

放过我们。就在这个暑假中，一般顽固的老教员，勾结一些顽固的学生家长，进一步向学生进攻了。他们威胁学校：必须开除一批学生，他们认为这是一些“害群之马”；如果学校不开除，那几个顽固教员就要辞职，那些顽固家长就要领女儿退学以示抗议。学校当局执行了他们的意见，我们几个人被开除了。我们这一班曾经发生过罢课，开除得最多——五个人。学校当然还采取了“客气”的形式，只用通知书的办法通知家长，说我们上学期违犯校规，不能再回本校，请自动转学。

在学校通知开除我们的时候，那些旧的教员又想起传播新思想的罪魁祸首是刘子通同志（陈潭秋同志因领导党的工作已离开女师），虽然解聘，还不解恨。因此，他们同时又勾结教育厅，利用军阀势力下通缉令，使刘子通同志不得不离开武汉。有一个老国文教员在上湖北督军军阀萧耀南书中，曾用四六骈体文写有这样的句子：“仇父非孝之言，忍心倡导；均产公妻之说，信口訾谈。”可想见他们仇恨之深了。

这是一次比较严重的斗争摆在我们面前，党和团的领导同志指示我们：斗争应当有策略，有计划，行动时还要有步骤。这次斗争我们不仅因为有了上一次失败的教训，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是在党和团的领导下进行的。我们这一班开除的五个人都是团员，我们利用暑假都在武昌学习，所以能很快地集合在一块商量对策。并且和在校的团员一起研究，决定开始先采取软的办法，事先不动声色。在开学的前两天（即报到的日期）由另外的同学把我们五个人的行李先带进学校去，我们随后空身进校，以免引起门房注意。我们自己找了一间空的宿舍住下了，饭厅没有我们的饭桌（吃饭是固定桌位的），我们就到校监桌上去吃（伙食是一样的）。校监是两位老太太，她们也不好意思不准我们吃饭，但这就引起其他学生的注意了。

开课的日子到了，其他班也上课了，只有我们这一班没法上课，因为我们也同样会到教室里去找座位听课的。我们这一班是高年级班，只有一年就毕业了，而且只有半年的课程，后半年是教学实习，如果老不上课就不能毕业。班上的同学不断去质问校长为什么不开课，我的母亲也代表被开除的家长去质问校长为什么要开除我们。

这种僵局将近一个月，忽然出现一段插曲。事情是这样的：当时全国大专学校，除了一部分大学外都是男女分校的，而女子高等学校，又只有一个北京国立女子高等师范，其他的高等师范都不收女生。国立武昌高等师范，也同样不收女生，南方各省的一些女青年曾多次要求他们开女禁，都未能实现。这时招考期已经过了，学校当时忽然通知我们，武昌高师现开女禁，叫我们去报考。我们开始怀疑，但同学们从外面看见了武昌高师门口有招收女生的广告，并有人去报名，我们当然也很高兴。这的确是一件可喜的事情，这是五四运动后党和团历次提出男女有平等受教育之权的影响。武昌高师在时代潮流的压迫之下开女禁，既可适应潮流，又可帮助女师打开僵局。但是我们研究的结果，认为叫我们五个人去报考武昌高师，不是叫我们去升学，而是圈套。因为学校明知我们已经半年没有很好上课，而又有半年的课程未学，前后相差一年，如何能去参加考试？分明是把我们骗出学校的诡计。因此，我们向学校提出两个要求，任凭学校选择一个加以保证，我们就去报考：（1）学校出证明保送入高师，考不考都得录取；（2）考不取仍回女师学习。学校当然不会同意，我们也就仍然住在学校里等上课，又僵了。

时间不允许久僵下去，摆在学校当局面前只有两条路：（1）和其他班一样开课，默许我们去学习，这就等于收回成命；（2）采取不客气的办法，在学校门口正式挂牌开除，勒令离校，同时报告教育厅防止学生捣乱。那些顽固的教职员当然要走后面一条路，于是又展开了一场群众性的斗争，在武汉学联（是团支部领导的）号召下，全市中等以上学校都卷入这次学潮，并以同盟罢课的行动来援助。

在僵持局面的时候，少数进步同学即开展了深入群众的活动，在各班串连，要求援助我们，要使学校收回成命。当听到学校已经决定在某一个星期一早晨上课前，一面挂牌开除我们五个人，一面我们这一班即行复课的时候，同学们即进行了联系。这个星期一早晨上朝会的时候，全体同学都在操场集合，这几个进行工作的同学就出来向同学们宣布："学校已经挂牌开除她们了，我们应当质问校长去。"当下一呼百诺，绝大多数同学都跟着几个领头的同学直奔校长办公室。我们五个人已经早在校长那里质问："为什么开除我们？"目的是包围住

校长，等同学们大队来援助。大队是有组织核心和分工的，一到二门外的附属小学院子里，即分小队去占领门房（传达室）和电话室，立时断绝交通。大门只许进不许出，只有学生派遣的人才能出去，大队就去包围校长室。有的同学把开除我们的牌子摘下来拿到校长面前质问，并摔在地下用脚踏，立时被大家踏得粉碎。

学生把校长团团围住，教员怕校长吃亏，就命令几个工友到人群中去开路，想让校长趁势出去。学生当然不让，工友人少也没办法。学联早已派人来联系，并立即通知全城中等以上学校同盟罢课援助女师和外专（也正在闹学潮）的同学。在报馆工作的同志，也尽可能发表同情学生的消息。校长走不出去，只好坐在屋子里和学生辩论，他当然没有理由，但又不肯收回成命。这时也有人报告，教育厅也挂出了牌子，于是又有一部分同学到教育厅去请愿。就这样一直闹到下午，大家都忘了吃饭，校长当然也陪饿。根据当时的条件，再僵持下去对学生不利，党的同志即发动武昌高师的教职员和其他中学校长共推出五个人来调停，条件是：校长辞职，我们五个人也离校，可保留学籍，第二年暑假照发毕业证书。组织上同意了，我们也接受了这个条件，从此我们就在党和团的领导下逐步参加了工人运动和其他秘密工作，开始了我们新的战斗生活。

湖南桃源女子二师在“五四”时的爱国活动

王一知

“五四”前不久，社会风气稍开，女子也可以入学了。但她们进学校，并不是都很顺利的，有的固然是经家庭同意，有的则是经过奋斗。我就是从家里逃出来的。我的父亲不同意我升学，我于十四岁那年逃出家庭，进湖南桃源女子第二师范。

“五四”前后我们在校里接触到一些新思想，如卢梭的民约论，达尔文的进化论，后来又订阅了《新潮》期刊，思想渐渐进步，要求女子独立，反对男尊女卑，反对封建伦理道德。那时我们不满现状，爱国思想很浓厚，看见报纸上有丧权辱国的事，就痛哭流涕。在校里，我有几个朋友，时常在一起，谈论起国事就慷慨激昂。

五四运动爆发后，我们很快就响应了。我们学校在当地领导游行。

游行时高呼“收回青岛”、“打倒卖国贼”等口号，边哭边喊，真是对国家充满着热爱！我们还组织救国十人团，缩衣节食，捐款救国，要求商人罢市，到店铺里检查日货，检出来当众焚毁，劝商人不买日货，边劝边哭，有的商人真为我们所感动，发誓不买日货。“五四”对我们那个时代的青年，影响是很大的，在桃源那样的地方都如此，北京、天津的情况就更激烈了。

“五四”后，我们写文章说明留着长头发没有用，第一次约了十几个同学剪了头发（剪得象现在男人西装短发的样子），剪短发现在

看起来是件小事，在当时则是经过斗争的。社会上和学校当局都反对，说我们像个尼姑，有的家长找到校里来哭哭闹闹，校长怒目顿足地责备我们。当时女子剪发的确是件受人注目的事，直到1922年我们在上海，上街时还有很多小孩跟着看我们。社会上的老朽骂我们是妖怪，说什么“国家将亡，必出妖孽”。

在1919年下半年，我们学校里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我们几个想升学的同学，自己请了一位教教育的教员补习英文，引起本校教英文的教员不高兴。这个英文教员，是校长的弟弟，因此校长就向我们大发脾气，我们认为校长无理，和他大闹起来。校长为此辞职，为我们补习英文的先生也辞职了，别的同学开始时有的不同情我们。校长要开除我，我声言校长若开除我，我就打碎开除我的布告牌。我们又向同学宣传，校长压迫我们了，我们应该起来反抗，于是就罢起课来。这次学潮的结果，我们同学没有被开除，校长仍旧回校，只是那位补习英文的教员辞职走了。

我还写了一篇以“非孝”为题的作文，说明父子之间应该以感情为基础，反对“父要子死，不得不死”的无理压制，这是一种反对宗法、反对旧礼教的行为，校长为此很生气，也曾想开除我。

当时，我们对社会不满，愤慨那些种田的、做工的反而没有饭吃，没有衣穿，不满于女人被男人压迫的情况。但是我们还不知道如何改革社会，如何使国家富强，我们还没有接触到革命的思想。我们只有“好好读书，为国做事”的志向，觉得《新潮》说得很对，要求民主，要求科学，响应做白话文。

当时我们校里的同学，思想较进步的只有十多人，我们闹罢课、闹剪发，别的同学跟着来。在同学中，有保守思想、封建思想的还很多，她们求学的目的多是为求资格，作嫁资。校长、教员都是老“冬烘”，是些封建卫道者。我对他们完全丧失信仰，我曾用考试交白卷的办法，闹得两个思想顽腐、教书极不负责的教师面红耳赤，下不来台。当时我很苦闷，只想离开女二师，特别是几个讲得来的好友，多转学到长沙、上海去了，我则因经济的限制不能动。

“五四”前后

傅彬然

“五四”那一年上半年，我是浙江杭州第一师范学校三年级学生。在回忆五四运动前后的情形以前，简略地说一点杭州的情况。

我生长在钱塘江南岸的农村里，辛亥革命前四年，我十岁，就上杭州念书。杭州是沪杭铁路的终点，清朝末年，已经有一点新式工业。就我所知道，辛亥革命前，有铜元局（造币厂）、火柴厂和日本人设立的纺纱厂（在城北拱宸桥日本租界）等工厂。丝织业向来发达，但主要是规模并不大的手工业作坊。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规模较大的织绸厂、缫丝厂、造纸厂开始建立起来了。发电厂早已就有，到这时也屡有扩充。原来手工丝织业和棉织业，多半改用所谓“电机”，装置小型马达，用电来做动力了。别的小型工业和整个商业也都相应有了发展。总之，杭州的整个社会面貌有了改变，男女产业工人的数量比以前增加了。

其次，讲到“五四”以前的学校生活。我上第一师范那年，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第二年。当时日本乘机加紧向我国进行侵略，继占据我青岛和胶济铁路之后，胁迫北洋军阀政府签订二十一条条约。这种情形，在小学的时候已经引起大家的愤慨，进了第一师范之后，同学们的情绪更为激昂。那时学校里还没有学生会，可已经有“校友会”的组织，成员包括了教师和毕业生。另外还有“劝用国货会”，反对日本侵略，向市民宣传用国货，不用日本货之类的爱国活动。当时多数学校都有，但是校与校之间并没有经常的联系，实际活动一般

也只限于由几个人组成的小队上街去作口头宣传而已。当时杭州中等以上学校为数不多：大学，只有一所之江大学，是外国教会办的，“洋气”很重。专门学校，只有法政、医药两个。中学，包括省立、私立（其中也有教会办的），普通中学，职业学校，总共不过十二三个，其中有女子学校三个（当时都是男女分校的）。全城中等以上学生数，全部不过六七千人。整个看来，学生界政治空气并不那么强。第一师范学校，当时更是被浓重的封建气氛包围着。校里的国文教师，多是“名儒宿彦”，其中有江山刘子庚（毓盘）等是词章家，萧山单不庵是理学家兼考据家。因此，同学中做旧诗词的相当多，读宋明理学书的人也不少。校长经子渊（名亨颐），日本留学生，颇有些风度。他提倡“人格主义教育”的理论，隐隐与黄炎培在江苏倡导的“职业教育”相抗衡。当时我们总以为“人格主义教育”比“职业教育”高尚得多，好些年以后，懂得了一点“唯物史观”，才恍悟“人格主义教育”是带封建性的，“职业教育”却代表了成长中的民族资产阶级的要求。学校里还有好几位给学生影响较大的教师，其中之一是夏丏尊。他中过秀才，去日本学过两年工，回国后在浙江两级师范学校（第一师范学校的前身）担任过日文口译的工作，后来一直做“舍监”。从我们这一班起，开始教国文、修身等功课。他读的古书不及别的国文教师那么多，可是他选的文章，多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和学术价值。对于文学和语文的见解，跟后来五四运动陈独秀等人所倡导的颇多不谋而合之处。他介绍给我们阅读的书，如王充《论衡》、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等，都是我国古代优秀的文化遗产。讲“修身”，对道德的看法，更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的观点。他对同学的生活、学习都很关心。在我们未进学校以前，他曾经在业余给少数同学教过日文，如杨贤江（后来成为优秀的共产党员，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患肺病，在日本逝世）、朱文叔、丰子恺等，都是从他那里学会日文的。

以上是我进师范学校前后几年杭州学生界的情形。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也就是中国民族工业趁着欧洲帝国主义国家无暇东顾而获得了发展的时期，社会情况就逐渐有所改变，杭州的情况也没有例外，这在前面已经说了。社会情况的变化，必然要在思想上反映出

来。1916 年 9 月，原来由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之后，提倡白话文，提倡文学革命，对封建道德开始进行抨击，越来越猛烈。后来明确地提出了拥护“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的口号。《新青年》的文章一开始就吸引着我们，可是在初期，对批判儒家学说和传统的人伦道德那么厉害，在感情上多少还有些接受不了。但是不久以后，完全接受了。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劳动人民掌握了政权，这更是惊天动地、发人深省的大事——当时一般报纸上，多称苏维埃政权为“劳农政府”，也有不少文章指出这是“经济革命”，和以前的“政治革命”（指以法国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根本不同。这以后苏俄的情况和马克思列宁学说陆续被介绍过来。第二年，191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告终，接着引起了欧洲许多国家的革命。那一年，以北京为中心，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运动已经开始高涨。1919 年 1 月，由于巴黎和会否决了中国政府向和会提出的几项严正要求，中国人民期望巴黎和会主持公理的幻想破灭了，这样就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全国性的有广大群众参加的爱国运动就此发生。这运动，首先由北京学生五月四日在天安门前爆发，不久就波及到天津、上海等大城市。六月中旬全国学生联合会在上海成立。此后，运动就更深入地遍及到全国各地。在杭州，这个运动大约到六月下旬进入高潮。全市学生罢课，在一起集会、游行，商人罢市。这样大规模的政治性的群众运动，我们可从没经历过；把全市的中等以上学生组织起来，成立学生联合会，并且参加全国学联会，与全国学生采取一致行动，也是第一次。这次还成立了日货检查队，严密检查奸商贩卖或囤积日本货。日货一经查获，就在湖滨公众运动场当众焚毁。检查的工作所以能够获得成绩，主要由于有店员参加。学生的活动，除了本身的组织和推动店员、工人之外，还知道向社会上有声望的人士去做访问、联系的工作了。我在学生联合会里，除了编辑过会刊以外，就做过这个工作。

五四运动刚开始的时候，北京的反动政府还想采取高压政策，后来一见到广大的群众运动起来，就不得不表示屈服，下令罢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个卖国贼的官职。六月二十八日，巴黎和会对德和约签字。北京政府不敢违反人民的意志，打电报给出席和会的中

国代表，拒绝签字。这一举动，不但表示了中国人民的胜利，对全世界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五四运动，作为政治性的爱国运动，大致到了七、八月间，高潮渐渐平息下去了。但是作为新文化运动来看，这个运动并没有平息，而且还在继续扩大、深入。自从《新青年》倡导新文化，抨击旧思想，中国固有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受到了沉重地打击。十月革命成功，更使进步的知识分子感到莫大的兴奋，知识青年的求知欲更加旺盛起来。1918年到“五四”之前，出版的进步刊物，除了《新青年》之外，已经有《每周评论》、《新潮》等。“五四”以后，新的刊物更像雨后春笋般篷勃生长出来。当时我们经常阅读的，除了上述几种刊物之外，有《星期评论》、《建设》、《解放与改造》、《少年中国》、《觉悟》（上海《民国日报》副刊）、《学灯》（上海《时事新报》副刊）等。这一类的刊物里所载介绍新思想的文章，我们不加选择，什么都贪婪地拿来看。介绍巴枯宁、克鲁泡特金、托尔斯泰、易卜生、哥德，以至杜威、罗素的文章都看。介绍苏俄情况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当然更爱看。在这样的新形势下，学校生活也不能不有所改变。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为例，我们有少数同学，在“五四”以前，就组织了小团体，响应《新青年》的号召，提倡新文学。“五四”这一年夏秋之间，全部力量投入了爱国运动。到秋季开学，学校请来了好几位新教师，其中有陈望道等三人，他们和原来的夏丏尊，曾被守旧派称为新文化运动的“四大金刚”。在学生方面，由各班学生选派代表，成立学生自治会筹备会，起草自治会章程草案，经反复讨论了许多天，才由成立大会通过。当时曾向学校提出了废除考试制度的要求。我们也曾向个别教师要求教学改革。例如英语教师，一向只是用他们自己以前从教会学校读过的书本（如《莎士乐府本事》、《伊尔文见闻杂记》、《纳斯菲尔文法》之类）来教我们，我们要求改用新教材，来培养我们阅读新书的能力。我们有三五个平常比较接近的同学，还经常到一位在省教育会编《教育潮》的沈仲九那里去谈谈。沈仲九介绍关于无政府主义的书刊给我们看，这也影响了我们的思想。当时全国还在实行“丁祭”。所谓“丁祭”，是每年春秋两季第二个月上旬的丁日，到孔庙里去祭请孔子。向来每逢丁祭，第一师范的学

生要被派去“司乐”的。祭孔的仪式很隆重，有职司的人，都要穿上像道袍那样的制服。由地方最高级长官主祭，全城地方长官、士绅、学校校长都要与祭。我们参加这种仪式已经好几次了。到了这年秋季，我们受了新文化的洗礼，已经觉悟到孔子原来不应该那样崇拜，作为偶像的孔子更应该打倒，那就没有理由再去参与“丁祭”了。于是先跟沈仲九去商量，他非常赞成。我们回校就一面向同学宣传，一面向学校提出。我们知道学校是不会反对的。夏丏尊听到了我们的要求，只是微笑着说：“牛痘苗发作了！”意思是说，新思想转化为实际行动了。由于我们拒绝去参加祭孔，第一师范就此招来了“非孔”的罪名。当时各地方青年学生办刊物的很多，其中以毛主席主编的在长沙出版的《湘江评论》最为突出。我们的看法，这个刊物有文字简练、密切联系实际、战斗性强几个特点。我们感到杭州的言论界，除了《教育潮》和《双十》周刊以外，死气沉沉，就是学生联合会会刊，也不好。我们提了意见，得不到反应。于是我们自己就想办个刊物，后来决定和原有的《双十》周刊联合，改组为《浙江新潮》。《双十》周刊原来是由第一中学几个学生和甲种工业学校夏衍等创办的。（夏衍原名沈乃熙，在《双十》和《浙江新潮》上曾用宰白的笔名写了许多短文。后来常用的笔名是沈端先。）浙江第一师范同学参加的，有俞秀松（原名俞松寿）、施存统、周伯棣和我等。至于由《双十》改组为《浙江新潮》的经过情形，完全忘记了。《浙江新潮》创刊号于十一月一日出版，在发刊词里，指出人生最后“的鹄”的是“生活”、“幸福”、“进化”，实现的条件是“自由”、“互助”和“劳动”。这就需要改造社会。改造的主要责任应由劳动者来负担。从这个发刊词看来，多少带有无政府主义思想色彩。发刊词的内容原来早就忘了，前几个月，一位在做编集五四时期刊物的同志送给我一份打字复印的《浙江新潮》创刊号，才给摘录下来的。记得我们这个刊物的内容主要还是反对封建道德和提倡“从青年联合到劳动者联合”。我在创刊号里写的谈关于今后学生运动方针的文章，就主张改造人生观，提倡民众联合，监督报纸等等。在讲到民众联合时，就有“《湘江评论》第二、三、四号有民众大联合一篇，讨论很详”的话。《浙江新潮》看起来很幼稚，但是它反映了我们这一群刚从封建思想的禁

锢中解放出来的小伙子的敢想、敢说、敢做的精神。我们写的文字尽管不成熟，但不能不使守旧派感到头痛以至仇视。刊物出版不久，第一师范一个姓凌的同学（他是二部生，进学校还不久）单独出了一个名为《独见》的刊物，词锋就是针对着我们的。他的背后，当然有旧派教师或校外什么人在支持着的。《浙江新潮》大概只出了三期，第二期里发表了施存统一篇标题“非孝”的文章，这篇文章内容其实平常。他所以写这篇文章，是由于他父亲只知喝酒赌钱，不关心孩子，并且还虐待他的母亲而引起的。其实第一师范里参加浙江新潮社的我们几个人，以前都是“规行矩步”的“书生”，向来被同学们视为“道学先生”的。但是“非孝”两字，正好给顽固派抓住了借口，跟以前的“非孔”联系起来，“非孔”、“非孝”，那就“大逆不道”，这还了得！于是旧势力就集中火力，向第一师范进行“围剿”，一时真闹得满城风雨。不久，《浙江新潮》被反动政府通令查禁，校长经子渊也就被迫离校，陈望道、夏丏尊等也都离去了。第二年，第一师范学校因为更换校长，发生了风潮，全市学生联合向省政府当局请愿，造成军队枪伤学生的惨案。最后因为第一师范同学拒绝新校长金某到任，给大批军警包围在操场上。地方当局企图把同学分别押解回籍。全市男女同学闻讯，都前来援助，连日相持不下。有一个一师同学，激于义情，夺取警察厅督察长的刺刀，企图用自杀表示抗议。他虽然被人救住，可已引起了全场的悲愤，怒声、哭声震天，连军警也不能不表示同情。最后反动统治者押解同学回籍的企图始终没有实现。这次斗争，对第一师范同学，是一次很好的实际斗争锻炼。当时学生会的领导者，有好几个成为早期的共产党员，1927 年蒋介石“四一二”叛变以后，在上海龙华被捕牺牲的宣中华（原名宣钟华），就是其中的一个。

1920 年因浙江第一师范更调校长而产生的杭州学生对反动势力的斗争，我们参加《浙江新潮》的几个同学没有亲身经历，因为那时我们已去北京了。上述情况，是从当时报纸上的记载和同学给我们的来信中知道的。看到了记载最后军警围困全体同学一段文字的时候，我也曾流了泪。回头再来追叙我们参加《浙江新潮》的几个人的情形。大概在《浙江新潮》被查禁之前，我们就从报刊上看到北京创办工读

互助团的消息，这消息引起了我们极大的兴趣。一则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我们向往已久；二则我们早就受了从西方介绍进来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想，更由于受了伟大的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工读互助”的生活，正是我们渴望实现的理想。因此我们就和北京大学的有关学生联系，要求参加，结果居然获得了同意。于是《浙江新潮》被查封以后，俞秀松、施存统、周伯棣和我，就离杭去北京。当时我已经是本科四年级生，离毕业只有半年了。到了北京，“工读互助团”已经成立，我们参加的第一团，地址在北京东城骑河楼斗鸡坑七号。已有团员十余人，有些原来是北大学生。其中有何孟雄（后来参加党，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在上海被捕牺牲）、无名（陈公培）、张树荣等。我们的到来，颇得到各方面的关心。初到的时候，陈独秀等特地来看我们，询问第一师范和整个浙江五四运动的情况。当我们谈到姓凌的同学单独创办《独见》周刊的事，他就愤愤地把瓜皮帽脱下来向桌子上一掷，说：“这当然是顽固派教师在捣鬼，你们为什么不反对！”

过了几天，我们就上北京大学去注册、听课。我们原来并不希望得什么“学位”，更不准备参加考试得到什么“学分”，各人只选择自己喜爱的功课去听。我选读的是哲学、教育学、伦理学、心理学和英文等课。其实这些学科，有用现成书本的，有发讲义的。教师多只根据书本、讲义讲课，并没有多少发挥，除了英语之外，大都可以自修的。我们一面去北大听课，一面还在团里请人教我们世界语。

以上谈了“工读互助团”的“读”，其次谈谈“工”。我们做的工，起初是洗衣服、刷信纸信封之类，但是收入都很少。后来在骑河楼街上开了一所名称叫“俭节食堂”的饭铺，来吃饭的主要是北大同学和教师。整个食堂的工作，除了请一位厨工做菜以外，其他如掌柜、采购、煮饭、跑堂、洗碗及其他清洁工作，都由团员轮值。食堂的墙壁上曾贴着一副对联：“宁流额上汗，毋染手中血。”这是对当时打内战，敲剥人民骨髓以自肥的军阀的一种抗议。食堂办了几个月，收入比前虽然增多一些，可是要维持二十多人的消费，还是应付不了的。原来募集来的钱逐渐短少，于是又在团内开设英文补习班，但学生来的并不多。后来有几个人去学印刷，我也在内。先去西城晨报馆

印刷厂学排字，记得有一本翻译书《爱的成年》（英国嘉本特原著）一大半是我检的字。接着又到北大新成立的英文排字部学习过若干天。后来大概考虑到即使成为熟练的排字工人，用半天时间工作，也未必能维持个人生活，于是又由互助团登报征求业余教师的工作。我曾到西城一个姓熊的大官僚家庭去为他的孩子补习过英文、数学。

最后谈一下工读团的生活。工读团的生活也许就可以用“自由”、“互助”两个词儿来概括吧！记得团里有经全体团员共同商定的不成文的公约，“公约”这个名称可不一定有。经济的工作由一个团员总管比较固定外，别的工作随时视需要推定负责的人。日常生活如清洁卫生等工作，都轮流值日，作息时间也有规定。有一个时期，曾经把团员的衣服都集中起来，分类放置，只要谁爱穿，谁就可以自由检来穿。这是我们对所憧憬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美好理想的尝试。来自各地的团员，多数是“少不更事”、天真率直的青年，性格、习惯各不相同。由于对某个问题的看法不一致，有时会争得面红耳赤，但是吵架的事儿，似乎没有发生过。曾经来过一个女团员，名叫群仙，国会议员易夔龙的女儿，脱离了家庭来参加的。团员，除了我们初到时的十几个人以外，后来又从杭州来了两三个第一师范的学生。已故小说家王鲁彦，原来是上海一家洋纸行的小伙计，白天替老板做事，晚上参加爱国活动，贴标语反对奸商贩卖日本纸，大概被老板发觉了，这才投奔来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在上海浦东被捕牺牲的共产党员恽代英，曾经到团里来过。大概他也想参加工读团，先来了解情况的。我和另外一个团员跟他谈了一两个钟头，以后没有重来。他略带瘦长的脸孔上那种坚毅果敢的表情，至今还历历在目。

当时我们和各方面的人物接触相当多，除上文已提到的陈独秀之外，还有李大钊、蔡元培、胡适、罗家伦、王光祈等等。最使我们敬佩的是李大钊，他穿的是浅灰布长袍，玄色细布马褂，态度那么朴质、慈祥，对我们说话不多，可是爱护青年之心是溢于言表的。听说他的薪金收入用来帮助青年的不少。胡适的态度，那时在我们看来还不觉得怎么坏，可是就他对工读互助团的看法一点而论，已经充分表现出庸俗的资产阶级观点。当时对工读团，大多数发起人和团员都把这个组织当作新生活的试验园地，胡适却仅仅把它看作帮助解决穷学

生经济困难的一种手段，跟美国大学里的所谓工读生活完全相同。罗家伦当时还是学生，住的公寓却相当宽敞。我们去看他，爱谈政治上的内幕新闻，表示他消息灵通。我们告辞时，总要高喊听差开门送客。足见他在那时，官僚政客气就很浓厚了。

工读互助团的大致情况有如上述。记得除了我们这一团外，还有第二团和女子团。这两团和我们这一团极少联系，印象几乎完全消失了。只还依稀记得女子团的地址在北河沿。我们这一团的经济情况，前面已经说过，大抵到快近暑假的时候，已经维持不下去了。暑假前后，团员中有的回原校去，有的找到别的工作做，陆续离去。由于杭州一位教师函召，我也于暑假中回浙江去了。

后　记

一、这篇文章写成以后，忽然想到《新青年》杂志里可能有记述北京工读互助团的文字。经找来一看，果然有。第7卷3期（1921年2月号）里载有“北京工读团消息”，记述北京工读团的情形。7卷5期（同年4月号）里有“工读互助团问题”特辑，有陈独秀、胡适等人的文章。那几篇文章里，已经在探讨工读互助团失败的原因了。我说当时有个女子团，记载里说“第三组未成立”，但是我记得女子团是有的，也许成立较迟，或者和第一、二两组在经费上没有联系的缘故罢。讲到第一组（就是我们的那一组）团员之间内部有意见等等，我的脑子里没有留下印象。少数团员有个人打算，记得是有的。至于工读互助失败的原因，那几篇文章谈到的都不全面。从今天看来，没有坚强的领导，没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只有民主而没有集中，该是失败的一种重大原因了。

再补充说一点五四时期工读运动的情形。那时候，确有不少知识青年，把工读生活当作理想生活，或当作实现理想生活的途径。记得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出版过一种叫《工读》的期刊。工读团的组织，北京之外，别的地方也有。杭州第一师范学生曾办过一个女子工读团，团员多数是知识程度不高的青年女子。成批青年去法国“勤工俭学”，也是“五四”前后的事。知识分子，还有个别上工厂劳动的，结伴到

乡下去建立“新村”的，这情形在杭州也都有过，别地方也会有。当时知识青年那种追求理想的愿望是好的。可是，在那时候的中国，在无产阶级还没有掌握政权的任何地方，任何美好的理想，都只能是无法实现的空中楼阁。这个道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输入中国，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后，早就给指出来了。

二、碰到了当时一起办《浙江新潮》的夏衍同志。他也在写回忆“五四”的文章。有些情形他记不清楚了，我还记得；有的我忘记了，他可知道。例如关于从《双十》改组成《浙江新潮》的经过，他完全知道。他会写入他的文章里去的，我就不在这里补充。但有一点很重要，他纠正了我的看法的不全面。我以为《浙江新潮》的主导思想是无政府主义思想，他认为并不如此。他带着一份《浙江新潮》创刊号原版，里面就刊载着一幅转载日本《赤杂志》第四号的“新社会路线”图。这幅图里就指出了向“新社会”前进的途径，最后的归宿是“波尔塞维克”（原图写的是英文）。夏衍同志还记得《浙江新潮》第二期里，就有一篇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文章。他的话是对的。此外，他还带着一本《浙潮第一声》，是浙江第一师范出版的特刊，专门记载着1920年第一师范由更换校长所引起的风潮的全部经过。根据这册特刊我把原来写的作些小的补正。

1959年3月29日

“五四”在杭州

施复亮

五四运动已经四十年了。

五四运动是在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之下，直接因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行为而引起的，它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起点。在当时，它促使新文化运动进一步发展起来，对浙江的新思潮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也起了深刻的影响。

五四运动爆发的时候，我正在杭州第一师范学校读书。在这以前，我们学校里就有“新生学社”的组织，有傅彬然、周伯棣等十余人参加。这个学社的宗旨是提倡新思潮，主要是提倡新文学、白话文，反对文言文，而这也是新文化运动的内容之一，因此它在思想上替杭州的五四运动作了启蒙准备。

当北京学生掀起反帝爱国运动的消息传来，我们立即响应，在杭州成立学生联合会，向市民进行了各种抗日爱国的宣传，并且劝告他们抵制日货。我们还在第一师范学校里组织了“书报贩卖部”，每天到西湖边公共体育场去贩卖各种进步书刊。传播新思潮的刊物有十几种之多，销行最广的是《新青年》杂志和《星期评论》周刊。杭州第一师范学校有学生四百人左右，有一个时期，校内就销行《新青年》和《星期评论》四百几十份。当时所谓新思潮含义很广，是指一切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思想而言。主要内容是反对封建旧礼教、旧道德，反对君主政治和军阀政治，提倡民主；反对旧教条、旧八股，反对迷信、盲从，提倡科学。同时又反对旧文学和文言文，提

倡新文学和白话文，提倡新文字。在新思潮的传播中，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则是主流，它的唯物史观和无产阶级专政等观点，在一部分进步青年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所以杭州第一师范学校成了浙江新思潮运动的中心。

当年秋天，我们一师同学想办一个刊物，后来和原有的《双十》周刊联合，组成浙江新潮社，出版《浙江新潮》月刊。杭州第一师范学生参加的有傅彬然、周伯棣、俞秀松和我，还有浙江甲种工业学校的学生沈端先（夏衍）等。

《浙江新潮》创刊号的发刊辞里，提出人生最后的“鹄的”是生活、幸福、进化，实现条件是自由、互助和劳动，这就需要改造社会。改造社会的方法在于自由、和平。改造的主要责任应由劳动者来负担。这个刊物的主要内容，是反对封建道德，提倡从青年联合到劳动者联合。刊物出版后，还有人出了个叫《独见》的刊物，来反对《浙江新潮》。

我在《浙江新潮》第二期上，用施存统署名发表了一篇题为“非孝”的文章，引起浙江当局极大的不满。北洋军阀政府段祺瑞内阁还通令全国禁止《浙江新潮》发行，这样才引起全国人民的注意。我在写了“非孝”以后，本来打算还有一篇“我为什么做不孝的儿子”，以说明我的家庭生活和反抗孝道的原因，可是那篇文章再没有机会发表了。那时我的意思很简单，就是反对不平等的“孝道”，主张平等的“爱”。对于这个问题我并没有用历史观点来分析说明，只是一种对封建礼教的反抗。“孝”是封建道德的代表，它是巩固封建家族制度的主要支柱，而封建的家族制度又是封建专制政治的基础。“孝”字教条，造成家长对子女的独裁统治，并且最终驱使人民做封建统治者的忠实奴才。军阀政府为维持封建势力，无怪要痛恨“非孝”而加以查禁，《浙江新潮》出了三期也就停刊了。

特别是当年夏秋间，我们第一师范曾拒绝参加“丁祭”。“丁祭”是每年春秋两季第二个月上旬的丁日，到孔庙里祭敬孔子。我们认识到孔子及其维护封建制度的学说应该被打倒，所以拒绝参加。为此第一师范曾招来“非孔”的罪名。顽固派把这两者联系起来，叫嚷“非孔”、“非孝”，大逆不道，于是向第一师范大肆进攻。不久，校长经

子渊就被迫离开学校。次年第一师范学校因更换校长发生风潮，杭州学生联合向省政府当局请愿，造成军队枪伤学生的惨案。

我们还写过一些文章，反对父母之命媒灼之言的封建婚姻制度，主张婚姻自由，主张婚姻要建筑在爱情基础上，要男女双方同意。我们对封建宗法制度特别是家族制度及传统礼教，都采取怀疑态度，予以否定。矛头指向了维持封建社会的孔子学说，“打倒孔家店”这一战斗口号，也注入在浙江青年的思想和行动之中。

五四运动已经过去四十年了。五四运动的历史任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声中完成了。今天的青年是幸福的，吃人的封建礼教不再束缚他们的思想，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已成陈迹。现今青年的目标比较单纯，主要是学好本领，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但是，资产阶级的影响还是有的，应该勇敢地破除自已脑子里的资产阶级思想，树立无产阶级思想。五四时期进步知识分子提出的与工农结合的思想，今天在现实生活中已有普遍的可能。青年们，要在党的领导下认真参加劳动锻炼，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把自己改造成真正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

五四运动在四川的回忆

张秀熟

一、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这个运动，在当时最直接、最突出的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勾结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压迫中国人民的北京卖国政府。

自1894年日帝国主义继英法等国对中国进行武装侵略后，中国人民对日帝国主义早已种下血海深仇。欧战刚起，1915年日帝国主义竟又乘机向我提出承认五项二十一条的最后通牒，又强占了我青岛和胶州湾，更引起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掀起了普遍全国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反对以北洋军阀为首的卖国政府的爱国运动。四川青年学生一开始就站在这个运动的最前线。记得1915年我还在偏僻的江油县城住中学，我们就已行动起来，游行讲演，抵制日货，并组织“一钱救国会”，每天捐钱一文，表示“每饭不忘”的坚决意志。以后每年五七纪念国耻，在青年中是一直没有停止过。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军阀的连年混战，官僚政治的黑暗贪污，地主阶级的压迫剥削，这一切交织起来所给予四川人民倾家荡产、室破人亡的灾难，四川青年都占了一份，许多青年更是亲身受着这种灾难。在这种情况下，打破现状、改造环境，就成为广大四川青年的迫切要求。1915年后，又不断受到《新青年》这一类进步刊物的影响，部分青年更还受到俄国十月

革命所带来的影响。因此，五四运动一到来，四川青年就高举大旗，走在前头，投入战斗。

（1）运动的展开

当时四川较进步的报纸，重庆有《商务日报》，成都有《川报》。“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王光祈正担任《川报》的北京通信员，“巴黎和会”期间，他经常给《川报》写长篇报道，分析国际形势，痛论中国政局，文章敏锐而富有煽动性。每天并有几条专电，吸引着人们对巴黎和会的注视，更燃起了青年们脑子里久已潜炽着的火焰。

五月五日午前七时，我正在学校——成都高等师范的大食堂吃早饭，忽有一人登上桌子，大声宣读《川报》上所登载的关于“五四”的专电。顿时似乎火山爆发了，几百个同学嚷成一片，食堂变成了会场，一致通过立刻拟发电报，声援北京学生，声讨卖国政府，拒绝“巴黎和会”签字，要求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亲日派卖国贼。饭后，成都各大中校学生数千人不约而同地已齐集在高师校至公堂前，略经酝酿，即整队出发，游行讲演，向督军署、省长公署（督军熊克武、省长杨庶堪系广东军政府任命的）请愿，要求声援，并通电各省和全省各县一致奋起，反日救国，并加强抵制日货运动。

几天以后，在成都成立了四川学生联合会，接着重庆成立了川东学生联合会，不少的县也成立了学生联合会。这是四川青年学生第一次在革命运动中组织起来，而且成为五四运动最坚强的核心。六月三日后，在省学联号召下，展开了全成都和一些较大城市学校的大罢课，抗议北京政府大捕学生，压迫爱国运动。

（2）抵制仇货与成渝两地的流血斗争

反对日帝国主义最直接最突出的行动是抵制日货，当时四川人民都称日货为仇货。仇货在欧战后突出地渗透到四川各个角落，由较大宗的洋纱、洋布、西药、搪磁、海菜等类，琐细到如洋针、洋线、牙粉、牙刷、毛巾、纽扣、文具、玩具、调味品、化妆品……许多是非生活必需品，有的原来还是四川手工业的输出品。仇货的大量输入，不仅影响我国刚刚抬头的民族工业的发展，而且大大破坏我国原有的

手工业。为了抵制仇货，许多青年学生砸破了自己所使用的搪磁面盆，从身上脱下洋布衣服，连同别的仇货一齐焚毁。当时具有两面性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学生罢课、工人罢工的推动下，在上海等埠也举行了罢市。四川被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压得喘不过气来的资产阶级，对这运动也有所期望。在这个基础上，省学联就主动团结四川总商会，联合组织商学联合会，统一领导抵制仇货的工作。目标是宣传各界人民拒用仇货，商人不再进仇货，撤销订货，就地登记并封存仇货，不再运输，不出卖，并统一组织仇货检查队，限期完成登记封存等手续。一般工商业者特别是手工业者和爱国商人，很感兴奋，表示支持。但少数一贯经营仇货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买办资产阶级——当时群众称为奸商——则百般阻挠，进行破坏，诬蔑学生，抗拒检查，不断与学生发生口角冲突。

是年十一月间，一天下午，总商会正在开会，有几个手持检查队小旗的中学生，进到会场，想接洽一个问题。参加会议的奸商以为得到向学生挑衅的机会，立即关闭大门，想把这几个学生抓住拷问，有的学生见势不妙，翻墙跑出，留下的学生严词质问，被奸商拳棒打击而受伤。各校学生闻讯，立时蜂涌到商会，打开大门，救出被扣和受伤的学生。当凭警察抓得肇事和行凶的奸商十九人，押到至公堂，决议第二日罢课游行，押解奸商示众，掀起反对日帝国主义，反对卖国政府和抵制仇货的更高潮。第二天一早，全城万余学生涌到皇城（高师校），省长杨庶堪带领省会警察厅长也马上赶到，要求把奸商交给政府处理，不要押解游街。经过两小时的斗争，浩浩荡荡的游行大队终于出发了，奸商被戴上尖尖帽，押在行列当中，传单纷飞，口号震天，满城商店仍然照常营业，道旁观众不断鼓掌响应，最后仍将奸商押回至公堂。这次的斗争，充分表现出革命群众的威力，成为五四运动在成都的最高潮。

由于反对日帝国主义和抵制仇货在当时是完全符合中国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利益，以及当时成都在政治方面的较有利条件，奸商们孤立了，广大中小商人更积极表示支持这一运动，因而投入运动的力量是更加强了。吴玉章同志当时正在成都，在他的指导下，通过商学联合会继续协商，由总商会负责保证，限期登记并缴出所有仇货，这一工

作在短期就胜利完成。奸商们根据受伤学生的控诉，被拘押到法院，在封缴仇货告一段落时，才陆续得到开释。

成都这一斗争，很快就影响到各地，掀起了各地的抵制仇货高潮。特别是重庆，由于民族工商业已较发展，又直接在帝国主义军舰、商轮、租界、洋行的威胁和控制下，工人阶级不仅有相当的力量，而且也已有相当的觉悟，在同学生配合下，斗争规模更是壮大。码头工人经常拒绝起卸仇货上岸，与海关展开斗争，第一次在四川表现出工人阶级革命的伟大力量。

1921 年 5 月，重庆学生为了彻底消灭仇货，对仇货进行了集中的焚毁。五月二十日这一天，即在打枪坝、夫子池、东水门外等地同时燃起熊熊的消灭仇货的火焰。单是棉纱和棉布一项，德和恒即被毁四十余件，吴义昌被毁四十包，义亨昌被毁四十六包，仅从这几个数字，就可看到仇货之惊人。奸商们在重庆反动军阀的支持下，向学生展开反攻，学生重伤者数人，轻伤者数十人，失踪者百余人，甚至有的人被沉入江底。这一流血事件，立时引起全市工人的怒吼，各地青年和爱国人民一致提出了抗议。重庆反动军阀为了坚持他的反动立场，下了戒严令，派兵沿街警戒，禁止学生和工人结队游行，禁止报纸刊载有关消息，严密检查邮电，妄图用暴力把群众革命运动镇压下去。但这一切反动防线，结果都被革命力量冲破了。人民要求惩办凶手，支援学联，救护受伤学生；垫江、梁山、璧山、綦江等县学生通电罢课，璧山中学生甚至突破重重封锁，到重庆参加斗争；江津县视学、农校校长、教育会副会长亦通电要求“凶犯依法惩办，学生加意扶植”。在这样广大群众爱国正义的压力下，重庆反动军阀终于被屈服。反帝反封建斗争就这样密切结合着，一浪一浪，推向前进。

(3) 反军阀斗志昂扬

在上述的反重庆军阀事件以前，成都学生即爆发过一次直接面向军阀的反军阀斗争。

正当四川人民反对北京卖国政府，痛恶军阀混战，情绪如火如荼的时候，北京政府又在四川制造混战，支持四川反动军阀刘存厚组织靖川军，1920 年冬打进成都。四川青年已是满怀愤怒，警惕着北京卖

国政府对学生爱国运动所采取的反动手段的重演。一个星期日下午，学生们在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打球，刘部士兵来了，对学生进行干扰，引起冲突，学生受伤。大概不到一个钟头，全城学生即已齐集皇城，在学生联合会领导下，整队游行，赴刘的驻地北较场示威，要求惩凶道歉，保证不再发生军队肇事事件。在风雪交加下，学生在北较场露天中怒吼了一个通宵，军阀终于全部接受了学生所提条件。五四运动中，四川青年就这样在反帝反封建战线上，经历着每一个战斗的锻炼。

二、广泛深入地反封建文化斗争

五四运动在四川所起的影响最大、最广泛又最深刻的，如同全国各地一样，是在文化思想战线上的革命。这一革命，正如毛主席所说：

“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1]

新文化运动在当时主要的具体内容，就封建统治阶级所给予的罪名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2] 这大概可代表破的一面；在立的一面，可扼要地总结为提倡资产阶级民主，提倡科学精神，用当时的话来说就是“拥护那德莫克拉西和赛因斯”。[3] 这正如毛主席所说：“五四运动的成为文化革新运动，不过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种表现形式。”[4]

（1）封建顽固派的垂死挣扎

在四川，封建文化思想集中表现在学校教育方面。辛亥革命后，

[1] 《毛泽东选集》第2卷693页，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二版。
[2] 《新青年》第6卷第1号，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
[3] 同上。
[4] 《毛泽东选集》第2卷545页，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二版。

以"五老七贤"为代表的大小清朝遗老，在各地掌握着学校作地盘，他们本身就是封建地主阶级，自命掌握着封建"道统"，成为封建军阀官僚地主的灵魂。自1915年《新青年》出版，第一卷即发表了易白沙的《孔子平议》，接着在第二卷各期，连续发表了陈独秀的《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政治生活》、《再论孔教问题》，吴虞并发表了《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源》。文学革命问题、妇女问题也都陆续提出了。新文化运动针对着封建文化的根本核心进行了攻击，地主阶级和这一阶级的知识分子震动了。骆承骧、宋育仁、方旭、曾学传、林思进……这些遗老，在高师校教员准备室一唱百和，如临大敌，要驱逐吴虞出成都教育界（吴虞当时在四川外国语专门学校教书）。十月革命后，1918年李大钊同志陆续在《言治周刊》、《新青年》等刊物上作了宣传介绍，他们更恐怖了，天天叫嚷洪水猛兽，教课时间也要来个政治附和，做到他们的"辞而辟之"。我班的主任教师龚煦春，给我们出了一道《新潮流之捍御策》的作文题，要我们捍御。

当时学校已没有读经课，但中小学有修身课，高等学校有伦理学，这些课实际也等于读经。没有男女合校，男女学生不得交际，女子不得剪发；省女师校更禁止学生请假，不准会男客，来往信件要检查；许多学校更不让学生读新书报。有几个比较开明活跃的学校，但经常受到排斥。军阀地主的代表刊物成都《国民公报》，更天天捏造新闻，发表谬论，无耻地对十月革命、对学生的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进行攻击。

就在五四运动已经发生，反帝反封建斗争在四川已大规模展开后，有的学校仍顽固地保持其封建堡垒。1920年1月，成都《星期日》周报第26期载有成都联中学生这样的通信：

> "图书室中，关于新思潮的杂志报章一本也没有，并且说：你们求学时代，很年青，容易感受恶习，那些违背圣训、不依正规的东西，读它做什么？"
>
> "修身课用他（按指该校校长张铮——笔者）的选本，是《管子弟子职》、《曲礼》、《内则》、《少仪》等篇。"

该报五月份第34期，又载有女师学生的通信：

> "国文、修身的教本，便是讲三从四德、贞操节烈最多最重

的本子。”

该报同期还载有达县读者的通信：

“达县有几位留学京沪的苦学生，集资买了许多杂志，寄回本县学校中，不料被办事人没收了。”

封建地主阶级对于保卫它的封建文化，是这样的费尽心力，但也只是垂死的挣扎。

（2）尖锐的斗争与四川学生潮

四川青年学生，身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阶级压迫和剥削的痛苦，在没有受到新文化的影响以前，对封建文化已感觉是桎梏；对这些遗老、绅士们，在脑子里更没有好的印象。青年痛恨帝国主义，但他们（编者按：此处系指遗老、绅士等人）的态度是忍让屈服；青年要反对袁世凯称帝，反对张勋复辟，但他们多曾列名劝进，有的同情康有为，有的还一直蓄发（如宋育仁）；青年们痛恨军阀，反对混战，但他们被称为军阀的军乐队，包办欢送欢迎；青年们要求男女平等，但他们拥护三妻四妾；青年们要解放，但他们给予青年的是窒息。封建文化思想，由于新文化运动的冲击，早已成了脱了榫的牢笼。

五四运动前后，成都恰有一个华阳书报流通处，专门代办进步的书报刊物，《新青年》、《每周评论》、《上海星期评论》、《湘江评论》、《浙江潮》等，通过这个书店，及时地涌进四川，成为青年最喜爱的读物。军阀、遗老们愈是认为洪水猛兽，青年们愈感觉它是灯塔。

五四运动这一火山爆发，和反日帝国主义、反卖国政府一样，反封建文化的战斗也立刻展开了。首先冲破了学校大门，统治最强的省女师校，也选举了四个女生代表，参加学联的评议会。男女学生开始有了社交。许多学校的学生组织了读书会，研究时事及新旧思想问题；组织了贩卖部，推销新的书报刊物。高师等校的校刊，容许了学生发表个人的议论和见解。外语专校的学生还出版了自己的刊物。学生批判教师，选择教师也展开了。女子实业学校的学生首先拒绝了省政府新委的校长。当时学生最普遍的要求是：废除不合理的学校管理制度；改变国文、伦理、修身等课程的内容，男女社交公开，实行男女合校；允许女子剪发；图书室订置进步书报刊物，改进成绩考核办

法等等。这一斗争，到《四川学生潮》的出版达到最高潮。

1920年初，四川学生联合会为了加强反帝、反封建斗争，宣传新文化革命运动，出版了自己的刊物《四川学生潮》周报，自己撰稿、编辑、校对、发行，并自己沿街贩卖。内容除坚持反日斗争、抵制仇货、介绍学术思想、批评学校教育外，旁涉当时国内政治、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问题，笔锋犀利，胸无忌惮。比如曾有一篇文章论《地方间的绅士》，给绅士下的定义是："逢迎官兵匪，搕诈农工商。"因此这张报纸一出版就引起社会的震动。但封建统治阶级最受震动的，是学生公开直接地掀翻了他们的"道统"。特别是高师校学生袁诗荛、刘砚僧、王维彻、杨砺坚等在周报上发表文章，系统地批判了宋育仁、曾学传、祝彦和这一类遗老的讲义，驳得体无完肤，把"大经师"(宋)、"大圣人"(曾)弄得权威扫地。这就引起封建统治阶级赫然震怒，群向学联反扑。高师校的学生也有以吴天爵为代表的少数落后分子，起而为遗老们辩护，学生间展开了斗争。但封建权威，在真理面前，结果只有倒下。这年双十节，高师校学生又在至公堂演了三天以反对封建文化为主题的话剧，没有女同学，剧中女角就全由男生担任，遗老们对学生演剧已大有感慨，对学生男扮女角思想更是抵触，但他们已不敢公开反对，只有暗中讽刺和叹息。话剧运动从此在男女学校都展开了。

(3) 风起云涌的新刊物

除《四川学生潮》外，仅就成都一地，当时就先后出版了《星期日》、《新空气》、《威克烈》、《直觉》、《半月刊》、《平民之声》等刊物，齐向封建文化冲击，从多方面反映出时代思潮。

《星期日》周报是几个住在成都的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所创办的，在1919年秋天开始发行。它的旨趣，在1920年第26期新年号上是这样写道：

> "星期日的目的是光明的世界，星期日的希望是人人自觉"。"人人应该摆脱的是什么？（一）现世界一切束缚的、阶级的、掠夺的、残酷的有形制度、无形学说、风俗习惯等；（二）自己旧生活里一切不自由、不平等、不道德、不经济的种种日常生活、

精神生活”。“途是从这黑暗世界里，促起人人的觉悟，解脱了眼前的一切束缚，根据着人生的究竟，创作人类共同享受的最高幸福的世界”。

从这里可以看到，该刊不是以鲜明的战斗姿态出现，着重于新文化的介绍和研究，对当时中间性的群众确起了很大的宣传作用。该刊影响较大的是第26期的社会问题专号，出版五张，载有李大钊同志的《什么是新文学》、陈独秀的《男子制与遗产制》、吴虞的《说孝》、高一涵的《言论自由的问题》，这些都是当时未在他处发表的特写专稿。该刊第33、34两期，出版了妇女问题专号，集中讨论女子剪发、男女同校等问题。第35期出版了劳动号，在成都的刊物中首先提出劳动问题。在1920年，该刊实际上已成为成都青年学生自己的阵地了。

《威克烈》周报是外国语专门学校学术讲演会主编的，1920年初出版，由于是学生自己主编的刊物，所以一开始也就富有锋芒。该刊主要谈的是关于学校教育及男女平等等问题，突出地要求学校改革，废止女学校，要求学校招女生，改造国文教员，废除学期考试，怀疑操行考核，拥护女子剪发，与《四川学生潮》互相呼应，深受学生欢迎。该刊1920年5月22日第23期，载有下面两个短评：

“昨见报载我们上海学生联合总会，被北京政府借洋大人的力量给我们封闭了，真是奇怪！你们自己当卖国贼，难道还要估着别人不爱国吗？你们禁得了上海的学生总会，难道你们压迫得着全国的民气吗？”

“前天报载，北京政府明令禁止公然宣言神圣劳工，我看了非常惊怪！……你们这些鬼鬼祟祟的伎俩……不过是混帐东西罢了！”

这是代表当时爱国青年和爱国人民的声音。

《新空气》差不多同《星期日》同时创刊，以工商界为宣传对象，主要谈盐岸、工厂、市政及一些有关人民生计问题，影响不大。《直觉》系一部分青年学生所主编，是一种文艺性刊物，着重谈男女恋爱问题，公开发表爱情书札，在当时受攻击很大。

《半月刊》系信仰无政府主义的青年所办。于1920年创刊，从第

11期起，侧重宣传无政府主义。在被查封后（原因见后段），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出版了机关刊物《平民之声》，专事宣传无政府主义。五四运动解放了青年的思想，世界各种思潮都在向中国奔流，封建文化、封建思想被彻底反对和动摇了，青年正在斗争中伸手向各方面追寻真理，最后是树起了马克思主义大旗，无政府主义思想在四川也就只是昙花一现便消失了。

（4）斗争最尖锐的是有关女子问题

女子剪发的斗争，从《威克烈》1920年5月第19期所载小燕女士所写《我剪发的经过》一文中，可看出斗争的激烈：

> "第二天，我母亲已经把舅父请来了，把这件事向他商量。他是满清一个举人，当然照着本人所见的道理，先就大骂我一阵，然后同我母亲一路到我房里，质问我。他问的话，我记不清了，不过本诸孔孟之道罢了。我也不让他，一一的把他驳了。后来他道理穷了，只好站起发作道：又不是我的女儿，我管你做什么？说了一抽身走了。我母亲又骂我一会子，最终还说：无论如何我不准……
>
> "我回家，我母亲见我剪了发，果然大哭大骂，并且辞别神主，要去自杀……"

当时成都首先突破剪发禁关的，是益州女学、蓉城女校、女子实业学校的几个女生，接着响应的女生渐渐多了，封建统治阶级不让女子头上有毫发的自由，用尽了百般手段来威胁禁止。1921年，军阀刘存厚统治的省会警察厅竟张贴皇皇布告，禁止剪发。《半月报》写文章表示反对，警厅竟把它明令查封了。五四运动中查封报馆，在四川这还是第一次，而罪状是为了反对禁止剪发。但剪发已从成都向全省蔓延开了。

男女同学的斗争，在当时如剪发一样的激烈。封建统治阶级的喉舌《国民公报》，竟无耻地发出这样的污蔑：

> "既可同板凳而坐，安可不同床而觉，什么是男女同校，明明是送子娘娘庙。"

这不仅看出封建统治阶级他们心灵的一片肮脏龌龊，更表现出他

们对于封建文化崩溃所感觉的恐怖。

1921年，部分高等学校开始试招女生了。似乎帝国主义比中国人自己还特别关心中国的封建“道统”，几个教会联合办的华西协合大学竟订了几条招女生的办法：第一期只招收女生十名，只许教会办的华英、华美两个女子中学保送；女生不能和男生说话；上课坐在洋婆子前面（特为间隔男女生而设的）；进出教室由洋婆子跟随；三人才能同行离校。这正表现出毛主席所说的“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1]

婚姻自由、恋爱自由的斗争，比剪发和男女同学更为激烈，但仍首先被高师、高师附中、益州、觉群等男女学校的学生所冲破了。他们组织了一个“人生活学会”，出版了刊物《直觉》，有好几个会员都自由结了婚。但有的家长驱逐了他们，有的在成都已不能立足，双双逃到上海。尽管如此，男女婚姻自主不能不为社会所公认了，女子在这一斗争中得到最后的胜利。

三、劳动组织的兴起与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

“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当时“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因此，“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2] 但五四以后，资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已“绝无领导作用”，“盟长资格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肩上”。[3] 我们若果把时间划一段落，从1915年《新青年》出版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作一深刻的分析，便可见十月革命对中国所发生的巨大影响，更认识到毛主席如以上所举的经典

---

[1] 《毛泽东选集》第2卷690页，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二版。
[2] 同上书，693页。
[3] 同上书，第691页。

性的总结的正确。

十月革命后十个月，即是1918年7月，李大钊同志在《言治季刊》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接着是年十一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塞维主义的胜利》，使当时的新文化运动发出了崭新的光彩。在这以前，主持新文化盟坛的神经中枢的《新青年》和它的主将陈独秀，在学术思想的介绍上是对世界资产阶级的东西兼容并包，茫无中心；对帝国主义（即当时所谓列强）在政治上、在对欧战结束后的世界形势问题上，还存在着许多依赖和幻想；虽然反对中国封建文化，但却避免公开涉及实际政治，并宣称"批评时政，非其旨也"。[1] 这正可代表当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思想，还不曾鲜明地意识到反帝反封建革命。十月革命和它带来的世界第一次大战的结束，震醒了也更鼓舞了长期被压迫的中国民族和中国人民，李大钊同志恰在是时鲜明地提出："在这世界的群众运动的中间，历史上残余的东西——什么皇帝咧、贵族咧、军阀咧、官僚咧、军国主义咧、资本主义咧——凡可以障阻这新运动的进路的，必挟雷霆万钧的力量摧拉他们。他们遇见这种不可当的潮流，都像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的飞落在地。"[2] "这次战局终结的真因……乃是德国的社会主义战胜德国的军国主义……乃是德国的皇帝、军阀、军国主义降服在世界新潮流的面前。"[3] "社会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失败，劳工主义战胜。"[4] 这不仅代表了当时中国民族和中国人民内心的要求，也指出了一条应走的光明大道。由李大钊同志这样开始的关于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宣传，给新文化运动带来了全新的质量。新文化运动，在无产阶级思想领导之下，注入了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革命内容，这样才发展成为轰轰烈烈的五四革命运动。在五四运动展开后，群众思想解放，革命热情高涨，宣传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介绍国际工人运动、介绍

---

[1] 《新青年》第1卷第1号，《通信》。
[2] 《新青年》第5卷第5号，李大钊：《布尔塞维主义的胜利》。
[3] 同上。
[4] 《新青年》第5卷第5号，李大钊：《庶民的胜利》。

苏联法规制度的著作，风起云涌，居于压倒优势，盟长资格更不属于资产阶级了。最鲜明的例证，便是1920年正当反帝反封建斗争普遍深入到全国各个角落的时候，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时北京学生会的重要负责人，《新潮》杂志的主编罗家伦，竟在《新潮》2卷4期上这样写道："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最不忍说的结果是：全国的青年破产！全国的教育破产！全国的一切新运动破产！"是的，在失掉领导地位的资产阶级看来，什么都破产了，事实上革命运动不断高涨着，破产的正是罗家伦，一直破产到作了人民的叛徒。

四川青年学生，在这几年当中，思想也是不断发展变化。在开始一个时期，虽然迫切地要求反帝国主义，反封建文化思想，但在政治上认为中国能做到德莫克拉西便也比封建统治好；在学术思想上，认为杜威的哲学、罗素的哲学也总比孔家店先进。换句话说，认为如像《新青年》这类刊物所介绍的东西可能都好。十月革命发生后，思想上起了新的波动，感觉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对沙皇、贵族、地主的被推翻联系到中国人民的实际表示庆幸；由于封建军阀遗老对苏联的恶毒攻击，引起思想上一种抗拒性的相反的反应，对劳农政权更表示同情。随着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深入，从斗争中所得的切身经验，从李大钊同志这一类代表无产阶级思想的著作的启发，渐渐对什么德莫克拉西怀疑了，对胡适的反动主张"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怀疑了，对他所宣传的杜威实验主义哲学怀疑了，对罗素所主张的"中国第一宜讲教育，第二宜开发实业，不必提倡社会主义"，以及他的应声虫张东荪"用资本主义办实业"的主张[1]表示反感了。这时渐认识到：问题不是枝枝节节可以解决的，因而迫切要求明确什么才是中国应走的光明大道。思想先进的，当时就感觉到要像俄国十月革命才能真真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愈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感觉深厚和伟大，虽然认识还很幼稚，还极不完备，但已种下了无产阶级思想的幼苗。

[1] 《新青年》第8卷第4号，陈独秀：《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

（1）劳动组织的兴起

十月革命，给深受压迫剥削的中国工人阶级带来很大的鼓舞。五四运动发生后，上海、唐山、长辛店等地的工人都举行了“六三”的罢工和示威游行。香港工人，1920年3月展开了反英帝国主义的罢工。❶ 重庆工人和成都工人也积极参加了抵制仇货的斗争。值得提出的是以手工业为主、工业生产还相当落后的成都，工人也开始自发地有了组织萌芽。

1920年3月，《星期日》周报劳动号载有两则消息：

“劳动自治会传单：我们劳动界的弟兄们啊！请你们想一想，我们是不是民国的主人翁呢？是不是四万万中的一分子呢？别界的人受新潮的影响，一天比一天进步，完全他们为国民的分子，我们岂可看自己是劳动的人就自暴自弃么？我们的五官百骸，那一样的组织不同别界的人呢？为什么仍安于恶劣的社会，受主雇不美的呼唤，驱使像牛马，应用像机械呢？我们若不急早起来想一个法儿，改造我们的旧环境，寻求我们的新生活，增进我们的人格，我们岂不为万国劳动会所耻笑么？我们应该组织一个团体……名叫南门劳动自治会……阴历正月十五日午后一点钟在小天竺开一个临时的会议……接倒开正式大会。——成都南台寺劳动界同启”。（字句保存原文——笔者）

“民八年十二月廿六日，成都印刷界工人约百余人，并有代表，在双柳村渡春楼上开临时大会，公推郭敏为临时主席。该会宗旨：印刷界铅石两业的工人，划除隔阂，不分畛域，通同组织一个坚硬永久的团体，叫做印刷界劳工互助团……我们所抱的宗旨，就是互助两个字，就是大家提携，彼此联络，简单说就是同盟……是要我们大家共苦共甜，同休同戚。譬如资本家刻待我们，我们要抵抗，当然一律，就叫互助……又推理事、文书、交际、会计、评议等……”

此外还有劳动界爱国十人团等组织。这些组织和四川学生联合会

❶《新青年》第7卷第6号，《香港罢工纪略》。

都有联系，当时由学联领导的平民教育运动，以劳动人民为主要对象。星罗棋布的夜校，一面教文化，一面做爱国宣传，对工人起了很大的影响，不过我们在那时还没有工人运动的明确意识。这些组织虽还很幼稚，但已为1923年在社会主义青年团领导下成立成都劳工联合会作了准备。

（2）《人声》周刊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四川支部的建立

1920年秋，王右木同志由日本回到成都，在高师和附中任教，组织当时各校思想前进的青年成立了马克思读书会，这是四川青年有组织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开始。1921年11月，右木同志以读书会基本会员十余人作基础，组成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四川支部，并创办《人声》周刊，专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对曾在成都起过一些影响的无政府主义运动进行了坚决的驳斥。《人声》周刊的出版，一开始就强调阶级斗争，大胆向当前政治社会现状开火，引起的影响极大。当时吴玉章同志适在南充，他在南充中学作了若干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专题讲演，把马克思主义介绍到川北。恽代英同志也正在泸州任川南师范的教务长和校长，马克思主义思想又深入到川南。正如毛主席所说："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1] 在四川也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不久后党在四川的建立。

1959年3月28日

[1] 《毛泽东选集》第2卷693页，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二版

“五四”的浪花

艾　芜

五四运动那个时候，我还是个小学生，读书的地方，是清代留下来的繁江书院，环境非常清静，窗外立着成排的梅花和桂花，院子里的青苔，简直绿到阶上来了。每个月最激动我们的事情，便是月终考试，要发榜给奖品那几天，其余的日子，总是很平静的过去。

五四运动的浪潮，怎样冲了来的，一点也不知道。《新青年》、《新潮》这类杂志，已经来到学校图书室了，教师里面已有人在看《每周评论》、《星期评论》了，但我们做学生的却还没有注意到，晚上菜油灯下，自习的时候，仍然是在读教科书上的文言文章。

繁江书院是在新繁县城内，离我乡下的家，约有二十里路。星期天若不回去，便和同学爬上城墙去玩，绕着城墙圈子走，真是观赏不尽。近处绿色的竹树村庄上头，有成群的鸽子在绕圈子地飞。明亮的小河蜿蜒在开着油菜花胡豆花的田野里面。天空和原野都特别显得宽阔，远处的回澜塔也仿佛近了一些。晴朗的阳光一被小块的浮云遮住，就有一大片蓝色的阴影在原野里掠过。我们家乡没有山，登上城墙这样的高地方，真是说不出的快乐。有一次望见远处一片青色的稻田中，有队灰衣的兵在走着。一个家在城里的同学，忽然异想天开的说：

“该不是日本兵吧?”

立刻就有人责备他：

“乱讲，日本兵怎个会来我们这里？你看，地理书上，日本隔我

们多远去了。”

自然他也看出了，那不是日本兵。但他还是反驳：“他要来，他怕你远？”并且责问我们：“日本要占我们的山东，你们晓不晓得？”随又像告诉稀奇故事那样的说：“我哥哥前回来信，说他们成都的学生，在反对日本，不准铺子里卖日货，还打架哩。”

“有这样的事情吗？”我们都惊异了，觉得那个住在城里的同学，实在多见多闻，我们虽然怀疑，但又不能不相信他的话。

从这个时候起，开始对成都的学生怀起了很大的敬意，原因就是由于他们敢于反对日本侵略者。我在乡里小学读书的时候（当时小学是七年制，乡下小学只有四年，后三年得在城内小学去读），曾听见一个同学告诉我好多关于日本的故事。他说日本官蛮不讲理，同李鸿章讲着讲着的时候，一下子手枪从袖子里摸了出来，抵着李鸿章的胸口，这样台湾就拿给日本占去了，琉球也占去了。他还说，清朝的兵最不行，在东三省守着一个关口，看见几十个日本兵走来，他们几百人，不放一枪，都全逃了。这些故事，显然带着他自己的许多想象和夸张，但在当时却不能不使我们相信，甚至相信那所有的细节。因为他的父亲和哥哥都是在清流场街上做理发师傅的，他的故事，都有根据，不说是他父亲讲的，就是他哥哥讲的。我们越相信他的故事，心里就越气。那时候我们在乡下读书，都带一根比身子长三倍的竹棍子，作为万能的武器。春天遍田遍地长满了黄色油菜花，夏天又遍田遍地长满了青色的禾苗，都比我们小孩子高，仿佛高人走进了森林一样，我们最怕迎头忽然来只狗，就得举起棍子，大声喊叫，把他吓走。河边上的芭茅丛中，总有蛇逯了出来，睡在路上晒太阳，也非把它打走不可。另外，有些学生又照哥老会的形式，暗中组织棒棒会，专门同路上的野孩子作战。有时又把竹棍子当马骑，一群孩子在路上飞跑，真是威武得很，大有所向无敌之势。我们也自以为天地间没有什么可怕的事。谁知竟然还有日本官日本兵在欺负中国人，占中国的地方，怎的不生气呢？我们乱画图的时候，就在图画上发泄我们的气愤，尽管没有看见过日本兵，但把那些拼命逃走的，写上“日本”两个字，勇敢在后面追的，就写上“中国”两个字。这还不够，还要在中国号兵吹的喇叭口子上，打上两条线，写出“我军胜”。日本号兵

那面，则在喇叭口子写上“我军败”。虽是画过这样的图画，但对日本侵略者的气愤，却仍是埋在心里的，并不能因为这样就发泄无余了。因此听见成都的学生，在反对日本侵略者，不能不深深地激动起来。于是就开始注意成都学生联合会出的刊物《学生潮》，这个刊物立刻给我们很大的欢喜，因为文字全是白话，一念就明白，用不着像读文言一样，一面嘴上读，一面还要心里翻译了。刊物里面不仅讲怎样在反对日本侵略者，还讲我们自己好多不对的事情，须要大力改革，我们觉得句句都说的对，连看不懂的，也觉得好。比如说文言难懂，传达新思想困难，必须改成白话文，这就首先打动了我们。我们如梦初醒似的，一下子恨透了文言，觉得读书的时候，要把文言翻成白话，作文的时候，又要把心里的话翻成文言，真是多么冤枉。还有刊物里的白话诗，也非常吸引人的，那么几句，一下就看懂了，心里还冲动地想：“这样的诗，我也敢写哪。”

小学校的校长把全国的新刊物都订了，这给我们作学生的，带来很大的好处。

我们一从热爱《学生潮》开始，就更进一步找寻学校图书室内的白话书刊了。成都出的《星期日》，北京出的《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上海出的《星期评论》、《少年中国》，就成为以后课余经常的读物。那时候并不注意刊物是哪年哪月出的，只觉得它们是白话写的就新得很，每份杂志每张周刊，都像树上初发的嫩叶、刚开的花朵，叫人感到兴奋、快乐。老实说，刊物上有好多文章是读不懂的，但因为是白话写成，还是使我们喜欢念它，想尽量从里面吸收一些东西，即使懂得一句话，一个新名词，也是好的。那时候，窗外梅花树上的叶子，也许已经枯黄了，在冷风的吹拂中，一片一片地落了下来，但心里却一直感到了温暖，仿佛面临着人类的春天。

有一次，到国文教员曾海门的寝室里去，忽然看见他也在看《新青年》，不知怎的，这一发现，使我们学生对他的感情，格外亲近了好些，仿佛有什么东西，把师生间的距离缩短了。他很诚恳，教书非常热心，只是不大会讲话，学生听他的课，常常感到沉闷。他看到学生打盹，就气得满脸通红，大声叹气。他改作文过为严厉，往往把一页作文，删改得一塌糊涂，使学生气馁，对作文毫无兴趣。他讲课，

往往下课铃摇了好久了，还不晓得下堂，学生很不高兴，就用鞋子擦地板。他有时下课的时候，还忘乎其境地，把教鞭当成烟袋杆子，和点名簿一道挟出教室去，害得值日生要追去取了回来。这些都是惹得我们又好笑又好气的。自从发现他在看《新青年》，我们就觉得他是同我们站在一道的，便从心里有了尊敬的萌芽，对他的一切举动再不觉得有什么可笑可气的了，他忘记了什么事情，马上告诉他就是。我们主动去向他请教的次数也逐渐多了，知道他写祭文也使用了白话，更使我们高兴。有一回就问他，作文的时候，可不可以用白话写，他沉思了一会，才回答我们：

"可以写的，就是不容易呵！你们要晓得，北京那些写白话文的，写的那样好，就是他们有个底子，古文研究得很好，也写得很好。"

想起我们写的文言文，每次都改来剩不到好多字，的确是要脸红的，但我们，也许由于是小学生吧，就特别富有勇气，不管有没有底子，只要教师答应了，便要在作文簿上写上白话，而且从此不再写文言。学生都感到白话文好写些，先前一个题目用文言文只写几百字，现在用白话，就是上千的字。

学生写白话文，造成风气之后，一些不喜欢白话，也不读《新青年》、《新潮》的教师，就大为不满起来，他们并不公开反对，只是说讽刺话。他们说："叫花子打莲花落的话，都拿来写文章，太不像样了。"我们做学生的，不当面去同他们辩论，只是暗中给他们带上一顶帽子：老腐败。

这些教师的讽刺话，直到县中劝学所的所长叶殿云来考试学生以后，才不再讲了。叶殿云给学校学生出一个作文题目"我们的租税应该给予怎样的官吏与军人"。这不仅助长了我们学生作白话文的兴趣，而且也鼓舞起了我们反抗现实社会的精神。当时城内驻军有一团人，横行霸道，人人害怕，我们小学生一看见街上有几个穿灰衣的走过，就要赶快让开。团长姓张，有一次抓了一个同学的父亲，诬他通匪，天天上刑，常常都有消息传了出来：吊过鸭儿凫水了，坐了老虎凳了，背了洋油桶子了，闹得满城风雨，全校为之不安。刚好这个时候，出了这样的题目，真是再合我们的心意没有了。叶殿云给我们讲过话，那种慷慨激昂的声音，使我们印象极深。后来我到成都读书的

时候，才知道他是我们县中第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我曾经听见信奉安那其的青年说："叶松石（即叶殿云）说我们很浅薄，读一本《告少年》就自以为是无政府主义者。难道你叶松石读一两本《新青年》的马克思主义专号，就自以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不浅薄呢?"大约在1927年大革命以前，他在成都即被国民党暗杀了。

学校中没有什么教员说讽刺话了，他们也在开始研究白话文了，但我们心目中最好的教师还是那些在报纸杂志上写白话文的作者，不管他有名无名，只要他的名字和他的文章，出现在我们所欢喜的刊物上，他就变成了我们最喜欢的人物。从一个同学口中，知道成都省立第一师范的学生刘达是我们县里人，常在《学生潮》、《星期日》上投稿，写白话诗，作论文鼓吹男女平等、男女同校，还受到官方报纸的反对。反对男女同校的文章，至今还记得的，有这样的话："若言男女可以同校，罗汉岂不要塑在观音庙。"我们不管提倡者反对者各有什么理由，但在我们小学生看来，提倡者的文章，是出现在我们所喜欢的刊物上，它就是值得我们热烈地拥护。别的作者离我们很远，只有这个作者离我们很近，在未进小学读书以前，就看见过他。我很想同他通信，恰好我的外祖母死了，他去吊孝，因他同我外祖母是同族的，我便约他到田野去散步，作了一次最愉快的谈话。那时候是冬末，但田野里却是一片青色，麦子菜子苕子胡豆豌豆，都正在发芽生叶。成群的小鸟，叫着追赶着，在半阴半晴的空中掠过。刘达身材不高，身体很结实，脸上露出果断的神色，说话声音坚决有力。我问到成都一个宣传新文化最有力的作者穆某，他就冷冷地说：

"这个人头脑不清，给《直觉》的新诗专号写一篇序言，用文言文写，已经不伦不类了，开头第一句，'上帝惠福吾人'这成什么话!"

经过这次谈话后，我对他就更加佩服了，觉得他是最有新思想的青年，以后还写白话诗寄到成都去，找他修改，成为我最初学写新诗的教师。

就在祭吊我外祖母的第二天，我又遇见了一个小学教师吴实秋。他穿西装，着长统皮鞋，手里拿着手杖，打扮使人惊奇。更使我惊异的，是他坐着休息的时候，居然摸出新诗专号的《直觉》来看。我是

第一次看见他，但在人丛中，他却变为我最亲近的人，我老坐在他的旁边，同他一道阅读新诗，并向他请教，要怎样才把新诗写的好，成半天地问个不休。我家里人都很诧异，认为我是个不爱讲话的孩子，怎么一下子变成话匣子一样了。另一个客人，贺印根，是在军队里作文书的，一向还很熟识，但因他在吴实秋走后，痛骂写白话文的人，还说用白话写诗，简直是把中国诗糟蹋完了，我就恨他起来，看见他就把头掉开，认为他思想腐败，值不得一顾。

现在想起来，童年时候那种拥护新文化爱好新文艺的心情，真可说是达到了狂热的地步，谁是该亲近的人，谁是该疏远的人，都重新划分出了界限。先前划界限，完全凭感情，他对我好我就对他好，等到读了新刊物后，却用的是思想了，而这思想却是全从新刊物上得来的。有些思想，可能是一知半解，又可能是读不懂，看错了，变成了误会，因为一个小学生的理解力是有限的，但在当时却一律看成神圣不可侵犯，而且还要实际做去，绝不留在口上，变成空谈，终天一心一意只想做新青年。白话文白话新诗，从此永远做下去。而且既然刊物上都说劳工是神圣的，寒暑假回家，岂能打空手走路，必得要自己来挑行李。后来抱着半工半读的理想，离家远去云南、缅甸，也就在这个时候，种下了种子。五四运动的潮流真是洪大，有着排山倒海的威力，流到四川边远地方的时候，应该说是业已变成细流了，但它所起的浪花，还是把我卷了进去，卷进了广阔的生活海洋。到今天，回忆起来，我可以真诚地说一句：五四运动对我实在有过巨大的影响。

（原载《人民文学》1954年5月7日第55期，第109~112页）

一个教会中学的学生爱国活动

顾仲彝

1919年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后，全国各地纷起响应。那时我在浙江嘉兴一个美国教会办的旧制中学（嘉兴秀州中学）三年级读书。全国风起云涌的爱国学生运动也冲进了美国人统治的教会学校。我们几次发动罢课都没成功。我们秘密组织学生会，但美国校长知道了，他出布告命令解散，禁止活动。有一次晨祷集会完毕后，学生要求召开学生大会，美国校长不许，命令学生离开礼堂，学生们坐着不动。那位美国校长就大发雷霆，说这是美国人办的学校，不准我们爱中国，并且逼着坐在门口的学生先走出礼堂，不然马上开除学籍。我们僵持了好几分钟，没法解决。美国校长气得破口大骂，暴跳如雷。正当这时，一位同学站起来喊道："我们到操场上去开会！"于是一哄而出，在操场上我们通过了罢课宣言。正在热烈高呼口号时，美国校长拿着手枪赶来，逼迫我们到课室里去上课，我们不理他，他就用手枪朝天开了两枪，还厉声说道："如果你们不上课统统开除。"并且要我们马上搬出学校去，我们全体同学就决定离开学校，外地的住宿生有组织地分开暂住在本地同学家里。

罢课期间，除了组织宣传队到大街上去贴标语讲演以外，我们还组织了一个爱国剧团，有二三十人参加，其中有四五个一向爱好文艺的同学就着手编写剧本，并主持排练、演出。我们排演了《朝鲜亡国恨》、《云南起义》、《中国魂》、《打倒卖国贼》等几个戏。我们不编台词，只把剧情分幕编成纲要，按照纲要在台上临时编台词，这样到

了台上可以比较灵活，如果观众情绪非常热烈，我们的台词也就可以更激动热情。

当我们在校外日夜排戏，筹备演出工作非常紧张的时候，那位美国校长看我们如此坚决，他便软了下来，自动地收回了开除成命，准许了我们罢课，让我们回校。于是我们的学生会和剧团都迁回学校，成了学校里的合法团体。

我们第一次演出是在学校的礼堂里，受到同学们和同学家属们的热烈欢迎。以后又在学校操场上演了几次，请学校附近的群众来看，于是我们演戏的名声就传开了。不久嘉兴教育会（那时教育界联合会性质的组织）派人来和我们接洽，要我们到新建的县的大礼堂演几天戏，开支由他们包，票也由他们发。紧接着这次演出之后，嘉兴附近四乡城镇的教育会都派人来邀请我们去演出，旅途费用、伙食开支由他们负责供应，于是我们这个剧团又变成了旅行剧团。我们雇了一条大船，装上全部简单布景、道具和服装，全体演员等 20 余人到处流浪。一群不满二十岁的孩子们在爱国热情鼓舞下，不辞辛苦到处演戏的那种集体活动，回忆起来颇有意思。我就这样爱好起戏剧来，和它结上了不解之缘。

我们到四乡农村去演出一般都坐大木船去的，因为嘉兴四周的水路极为便利，在大舱里我们还经常排戏、对台词，到了目的地，就有当地的教育会代表来迎接，把我们迎到学校里或庙宇里去休息，吃过饭，就搭台挂布景。有时晚上演出，就用汽油灯挂在台的两边。上演前二三小时广场上就挤满了人，大半是农民和工人，各种饭食摊贩的叫卖声，就像赶庙会一样。那时天气热，我们喜欢在晚上演出，比较凉爽，也比较安静。戏一开场，台下站得满满的看不到边，台前树上也攀满了人。在汽油灯底下，我们看到台前睁大的眼睛和兴奋的油光光的脸，不由得我们在台上演戏的人精神抖擞，不知不觉加添了不少的新台词，听见观众们的鼓掌更恨不得把全副力都使出来。我记得演《朝鲜亡国恨》一戏，演到最沉痛的时候，台上台下哭成一片，台下高呼口号，全场响应。其激动与热烈的场面，虽然事隔四十年，我还能记得清清楚楚，像昨天发生的事一样。我们从晚上七时演起，往往要演到半夜后十二时才散戏。

我们巡迴演出走了不少地方，我们到过新塍、王店、乌镇、新市、桐乡、平湖、嘉善，甚至于最远到沪杭铁路沿线的长安，到处都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和优厚的招待。后来我们又排演了《中国魂》和《打倒卖国贼》两个戏。我们这样巡回演出了两个多月，实在因为过于劳累，天气又热，病倒了好几个演员，不得不谢绝各方面的盛情，回到嘉兴。

我们这样的演出，事实上幼稚得可笑，既无丝毫演戏经验，也没有人给我们作最基本的指导，但我们能为群众所喜爱，能受群众这样热烈的欢迎，主要的原因是我们的演出紧密结合着当前的政治，我们唾骂北洋政府的卖国罪行，我们演出做亡国奴的痛苦生活，我们说出了老百姓心里的话，我们歌颂了为国家奋斗牺牲的英雄烈士，我们在台上痛哭流涕，在台上慷慨陈辞，使观众激动得热泪纵横，高呼口号。从观众热情的反应里，我们看到当时的工农劳动人民的爱国热情是非常高的，反帝反封建的情绪是非常激烈的。他们热烈地反应深深地教育了我们，使我们认识到爱国运动只有在广大群众的支持下才能轰轰烈烈的展开来，使我们认识到广大群众的力量，使我们认识到觉醒了的中国劳动人民的可爱和伟大。每演完一场戏我们的爱国热情就高涨一次。我们深深体会到五四运动的伟大意义。

回忆五四时期的李大钊同志

高一涵

我和守常认识是在日本东京留学时期。因袁世凯背叛民国称帝，引起全国人民反对。那时东京留学生反对袁世凯的斗争，可分为两个阶段："二十一条"签定以前，反对是秘密进行的，守常组织神州学会，秘密进行反袁活动，这个学会我参加过；"二十一条"签定后，人心愤怒，我们留日学生组织起留日学生总会，公开反对袁世凯。留日学生总会办了一个机关刊物《民彝》，守常任主编。我们在上面都发表过文章。

中国受帝国主义的侵略日甚一日，外患叠起，而内政又日趋腐败，爱国志士义愤填膺。守常为了拯救国家，毅然决然丢下学业，甚至拿不到大学毕业文凭也毫不顾惜，不等学期终了，就在1916年上半年返回祖国，做社会革命运动。

守常回国后，汤化龙请他主编《晨钟报》，这个报纸后来改名《晨报》。7月，我也回国。守常约我同编《晨钟报》。汤化龙是研究系，当然与我们合不拢，不到两个月，我们就辞而不干了。

北洋政府内政部长孙洪伊在那时可算是一位急进的民主派，他认识守常。1917年，孙找人起草地方自治法规，把守常和我找去，我们负责起草工作，经过三个月，草成。我们主张分权，旧派则站在集权方面，这个草案终于被北洋政府否决。

那时，章士钊在北京创办《甲寅日报》，约我们替他写社论。今天由守常写，明天由我写，后天由守常写，再后天由我写，如此轮

流，每人隔一天给《甲寅日报》写一篇论文。我们在文章中攻击研究系，攻击现政府，而章士钊是维护他们的，他不赞成我们的主张。守常又只顾真理，不顾什么情面，不合心意的，他就要痛骂。章士钊不敢去和守常交涉，便托我去和他商量。这怎么行呢？一个人的主张是不能够随便更改的。后来，彼此谈妥：不谈内政，只写国外新闻。那时，十月革命已经胜利。于是，守常便连续介绍俄国革命。我们把各报上主张较新的消息综合起来，介绍给国人。后来又遭到章士钊的反对。到张勋复辟时，我们便登报申明，脱离了《甲寅日报》。

1918 年是守常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的关键。早在东京留学时，他就接触到马克思的学说了。那时，日本西京帝国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河上肇博士已将马克思的《资本论》译成日文，河上肇博士本人也有介绍马克思学说的著作。守常接触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河上肇博士的著作。1917 年，十月革命的消息不断传来，守常又认识了俄国的外交人员。同时，布哈林的著作《共产主义 ABC》的英文译本也有了。这种种因素，加深了守常对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认识。就在这年十一月，他第一个撰文颂扬布尔什维克的胜利，那已是明确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了。

“五四”前不到半年，守常在北京大学组织了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会。我们不是用马克思，而是用马尔克斯这个名字，为的是要欺骗警察。他们回去报告，上司一听研究马尔萨斯（与马尔克斯相混），认为这是研究人口论的，也就不来干涉了。这个学会，先是公开的，后来就秘密起来。它的对内活动是研究马克思学说，对外则是举办一些讲演会。

1918 年 11 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蔡元培先生为庆祝“公理战胜”，组织演讲会，在中央公园（现在的中山公园）里面讲，在天安门内搭台讲演，一连讲了三天。首先上台讲演的是蔡先生，接着，守常和我也上了台去。我记得，那是初次上台讲演，两腿直打颤，还是硬坚持讲完。

1918 年底我们办一个《每周评论》，经常是我们几个人写稿。

“五四”游行，守常和学生一道参加。

有一次，为了救援被捕学生，大家集队往政府请愿。队伍走到国

务院门前，只见铁门紧闭，门内架着机关枪。守常愤怒异常，一个人跑出队伍冲将上去，大家赶忙上前把他拖住。真是又英勇、又危险。

"五四"前，大家都对现政府不满，彼此的区别不明显。五四后，出现明显的分化现象：胡适派后退了。青年学生中，落后的加入国家主义派，中间的加入国民党，最先进的加入共产党。

1919年6月，我们散发《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主张推翻段祺瑞政府，并宣布京师卫戍司令段芝贵死刑。守常与陈独秀都去散发。当场，陈独秀被捕，三个月左右，释出，仍受监视。守常设法送他逃走。他们扮作商人，带账簿，套一辆骡车，守常坐在外面，陈独秀坐在里面，悄悄地把陈独秀送到天津，乘船回到上海。

守常从五四运动以后，经常领导青年学生和工人们进行革命活动，遭受北洋政府的注意，在他的住宅门外设下一个警察岗位。从此我们交谈都是在北大学校里。

1924年后，守常负责领导华北革命的实际行动，为避免反动军阀迫害，转入地下工作，我们会面的时机就少了。1926年冬，北伐军到达武汉，守常劝我往武汉参加革命工作，我在武汉中山大学任教。到了1927年4月底听到守常光荣牺牲的消息，不胜悲愤，自此与守常永别了！守常虽然死了，守常的革命精神永远活在广大人民的心中！

（摘自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高一涵先生谈李大钊同志的历史》，手稿本）

从五四运动中看究竟是谁领导革命

高一涵

五四运动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是从旧民主主义转变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这个伟大的革命运动到底是谁领导起来的，至今还有人不大了解。还有人相信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胡适等也算是运动的领导人，这是完全与历史事实不符的，必须予以纠正。

本来，在五四运动以前，就有了提倡科学、民主和新文学的新文化运动。倡导这一运动的进步知识分子，是小资产阶级急进民主主义者，像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人，也有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胡适等。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一部分急进民主主义者开始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出现了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因此，在五四运动开始时，这三部分人——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形成了统一战线。但是，在运动的进程中，这三部分知识分子表现出两种不同的态度。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这个革命运动的主力，他们亲身参加和组织了这个运动，他们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向往着俄国十月革命所指出的社会主义道路；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却是动摇的，他们中途退却，甚至阻挠运动的开展。

我们且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胡适作为例证来谈谈吧。

那时我与胡适同住一宅，对他的情况比较清楚。在北京学生举行示威游行之前，他就去上海欢迎杜威去了。五四运动的爆发，他事前

并不知道。当他听说在这次游行时，火烧了曹汝霖的住宅，痛打了躲在曹宅内的章宗祥，直到段祺瑞政府出动军警弹压，捕去大批学生等等消息，他的软弱性就彻底暴露。说什么“搞得太过火，没有英美式的政治家风度，出乎英美式群众运动的范围”。正在全国各省市学生纷纷起而响应时，北京的学生总会和北大的学生会开始组织起来。乘机夺取学生会的领导权的，就是胡适的得意门生和后来加入国民党的投机分子北京学生总会的主席段锡朋霸占去了，新潮社的编辑部也被傅斯年、罗家伦等钻进去了。到了6月3日，这个运动转入一个新的阶段，上海的工人先后罢工，商人实行罢市，全国各地又纷纷响应。胡适看到由青年学生掀起的运动，影响了全国各地，成为全国范围的工商学联合的革命运动，大吃一惊。他就想方设法地为段锡朋、傅斯年、罗家伦等划策，说什么“罢工罢市是很笨拙的消极武器，很难使用，很难持久”；说什么“排队游街，高喊打倒英日强盗，算不得救国事业”；说什么“国家的纷扰，外间的刺激，只应该增加你求学的热心与兴趣”。胡适回到北京，看到北大和其他学校学生还在罢课，就大为不满，嗾使段锡朋等力劝学生复课，作釜底抽薪之计，来瓦解这个革命运动。从这些事实上看来，胡适在那时并不是支持这个革命运动的，只是破坏这个革命运动的。

再看以李大钊、陈独秀等为首的具有共产主义思想和革命意志的知识分子的态度，则完全相反。陈独秀虽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在五四运动时，却是一位急进的民主主义者——他以北大文学院院长、《新青年》杂志主编人的资格，在新文化运动的宣传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尤其是李大钊同志，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下思想上起了极其深刻的变化，开始从急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自1917年，陆续宣传马列主义，庆祝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介绍苏维埃俄罗斯的革命新闻。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在五四运动以前，就已经取得了新文化运动的领导地位。五四运动爆发时，李大钊同志是一位亲身参加者，并且是一位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到了6月3日运动进入了新的阶段，参加斗争的就不以知识分子为限，广大无产阶级群众这时走上了政治斗争的舞台，形成了革命运动的骨干和主人。自此以后，五四运动就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在列宁的号召

下，转变为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就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为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胜利的条件。

正因为自五四运动后，马列主义传播的深入和影响的扩大，更引起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恐慌。胡适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右翼，便不得不揭开假面具，利用以唯心主义和改良主义为骨髓的实用主义，彰明昭著地向马列主义进攻，公开地反对革命。正在陈独秀被捕之后和《每周评论》被封之前，胡适被革命潮流冲击，吓得发抖，丑态毕露，他移居到受帝国主义保护的北京饭店。为表明他自己反动的态度，对李大钊同志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作为他自己的反动宣言，向当时反动透顶的段政府投降。

五四运动的史实证明：代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胡适等人，在参加运动时，是以资产阶级代言人身份出现，在政治上和思想上与资本主义者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他们反对日本，是想用美帝国主义来代替日本帝国主义；他们反对封建文化，是想用西方文化来代替中国的文化。迄今还有人不曾弄清史实，认为胡适与陈独秀、李大钊等同是五四运动的领导人，这是彻底违反历史事实的错误说法。我们要看到：五四运动后期，大部分右翼分子早已和敌人妥协，站到反革命方面去了。

五四运动的真正领导者只是具有共产主义思想和革命意志的知识分子。他们一同工农民众相结合，就站到革命运动的最前线，确信这个革命运动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确信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一定会得到胜利。

孙中山先生对五四学生运动的同情和支持

许德珩

孙中山先生是一位忘我的爱国主义者，在他的一生中，不断地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卖国军阀作斗争的事迹，是大家所知道的。在先生生前，我与他的接触不多，知道的事迹很少，现在仅就五四运动这一片段的接触，来作为我个人的回忆。

当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因反帝、反卖国军阀的示威运动，我们三十一个学生和一个市民被逮捕的事件发生以后，孙中山先生是支持这个运动的，他曾经打过电报给当时的北洋军阀头子段祺瑞，要他从速释放被捕学生。由于孙中山先生和社会上其他人士的支持以及人民群众自己的团结努力，被捕学生才能够很快的出狱。当这年的五六月间，各地学生代表聚集在上海组织全国学生联合会，扩大学生运动的时候，孙中山先生也是支持学生的，他曾经多次邀集我们到他的上海住宅谈过话，我个人曾经两次参加过这样的谈话。他每次都是很亲切的、慈爱的帮助我们，鼓舞我们。1919年6月16日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就在这以后不久的一天，我们邀请了孙中山先生到学生会来讲演，讲演的地址是借的上海环球学生会。孙中山先生那天为我们分析了当时的巴黎和会，讲到了俄国革命，鼓舞了我们学生。就是在这一时期，北京大学出版了《新青年》等刊物，上海方面由先生领导也出版了《建设》月刊，北京方面出版了战斗性的《星期评论》。这就可以说明孙中山先生当时的思想是站在青年方面的，是站在进步方面

的。五四运动是反帝反军阀的爱国运动，而这个运动是受了当时俄国革命的影响的。“以俄为师”的孙中山先生，要“顺乎天理，应乎人情，合乎世界之潮流，本乎人群之需要”，当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就很快的与中共合作起来进行中国革命，当然也不是偶然的。

（原载《九三社讯》1956年11月12日，第2页，原题《纪念与回忆》）

回忆五四运动中的鲁迅先生

孙伏园

5月4日，我参加天安门大会以后，又参加了示威游行。游行完了，我便到南半截胡同找鲁迅先生去了，我并不知道后面还有“火烧赵家楼”的一幕。晚上回到宿舍，才知道当天这后一幕是轰轰烈烈的，而且有一大批同学被反动军警捕去了，运动这才开始呢。

鲁迅先生详细问我天安门大会场的情形，还详细问我游行时大街上的情形，他对于青年们的一举一动是无时无刻不关怀着的。1919年他并没有在大学兼任教课，到他那里走动的青年大抵是他旧日的学生。他并不只是关怀某些个别青年学生的一举一动，他所无时无刻不关怀着的是全体进步青年，大部分是他所不认识的、也是大部分不认识他的那些进步青年的一举一动。他怕青年上当，怕青年吃亏，怕青年不懂得反动势力的狡猾与凶残，因而敌不过反动势力。

鲁迅先生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给予青年的印象是十分深刻的。青年们常常互相询问：“唐俟到底是谁呢？谁的文章有这样深刻呢？”陈独秀、胡适之写文章，主张用真名字，决不会再用笔名发表文章的。钱玄同、刘半侬虽然都爱弄玄虚，但文章的格调都不像。于是在文科教授名单中，从本科找到预科，又在法科和理科的教授名单中去想，都没有一个相象的。有人说这一定是蔡元培的笔名，因为他身居校长地位，不便轻率发表文章，所以只好把真名隐去，但文章的格调也完全不像。

还有一个问题是“唐俟”和“鲁迅”会不会是一个人？唐俟大

抵写论文、写新诗、写随感；鲁迅则写小说、也写随感，而两个人的用词造句和思想内容又很有相象之处，也许这两个人只是一个人的笔名吧？那么这一个人到底是谁呢？

这种问题在青年们的头脑中转动，足见这一个人的文字已经在青年的心理上起了共鸣，青年们已经接受了他的思想领导。我是早已知道这秘密的了，但我决不随便对人说。那时我是一个头脑简单的毫无革命经验的学生，决不会了解“保密”的意义有何等重大，也决不会了解一个革命的同志在敌人营垒里面工作又有何等重大的意义，只是直觉地知道万一传播开去一定要出岔子，所以最好不说。但我从青年同学的谈论中知道他们对于这位隐名的作家真是五体投地的佩服和信赖了。

在1919年5月4日以前，鲁迅先生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字一共有三十一篇，其中论文一篇、诗六篇、小说三篇、随感二十一篇。这些文字都是内容十分饱满，文笔十分精练，革命性十分强烈，每一篇都在青年思想上发生影响的。随感二十一篇后来都收到《热风》中，小说三篇（《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收在《呐喊》中，诗六篇收在《集外集》中，论文一篇（《我之节烈观》）收在《坟》中，这些文字，反映了当时鲁迅先生的坚韧的斗争精神。鲁迅先生在《热风》的《题记》中讲到这几十篇随感时说：“我在《新青年》的随感录中做些短评。还在这（按指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对于山东问题的示威运动）前一年，因为所评论的多是小问题，所以无可道，原因也大都忘却了。但就现在的文字看起来，除几条泛论之外，有的是对于扶乩、静坐、打拳而发的，有的是对于所谓‘保存国粹’而发的，有的是对于那时旧官僚的以经验自豪而发的，有的是对于上海《时报》的讽刺画而发的。”

等到后来，“唐俟即鲁迅”、“鲁迅即周树人”这两个秘密被发现，那时鲁迅先生已没有再行隐蔽的必要，索性从敌人的反动营垒中撤退，到南方做革命工作去了。但在五四运动前后，用唐埃和鲁迅两个笔名所发表的几十篇文字，在青年思想界所起的影响是深远而广大的。

（原载《中国青年》1953年第9期，第25页，
原题《五四运动中的鲁迅先生》）

回忆五四时期的方志敏同志

缪　敏

1918年，全国掀起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志敏在学校里特别关心国事。以前他已听到了不少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军阀政府卖国求荣的事情。当时学校里的历史课程，又恰恰讲的是中日之战。大家越听越气愤，讲堂上顿时形成了一种沉重紧张的空气，学生们都要哭出来。讲课的是一位青年教师，他并且把“二十一条”逐字念了一遍，最后归结道：

“……这二十一条约，把一切立国的政治、经济、交通、警察、土地等主权，统统卖光了。这是个彻头彻尾的卖国条约！是一纸中国的卖身契！”

志敏听到这里，再也忍耐不住，猛的把桌子一拍，高呼道：“我们打日本去！”

“对！我们要打日本去！”

学生们都站起来一齐嚷着，课也不听了，都涌出教室。各寝室里马上响起一片响声，拉抽屉的，开箱笼的，劈哩啪啦，摔起东西来。

“这是日货，打了去！”志敏把一瓶金刚石牌的日本牙粉，从大开着的门里扔了出来。玻璃瓶子在门外二十几层的大石阶上磕碎了，淡红色的牙粉，洒在台阶上，黑胶木的瓶盖，顺着台阶一层一层地滚下去。

“好呀！方志敏够痛快！”旁边的学生喊着。

“我愿与日本偕亡！”当的一声，他又把一只日货的洋磁脸盆摔在

地上。“这也是日货！”他用脚狠狠地踩着。

又一个学生，也把一只东洋脸盆摔在地上，照样踩了几脚，脸盆凹下去了，一脚飞起，把脸盆直踢到墙角里。白色的磁片，落了一地。

接着，志敏又把自己买的日本席子等日货都拿到学校揭晓处底下烧了，并在揭晓处墙上贴了一张纸条，上面写道：

“我方志敏誓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中国独立解放而奋斗！”

接着，很多同学都将自己所用的日货拿到揭晓处去烧，学生都不上课了，大家乱嘈嘈地喊叫着，焚毁着身边的日货，揭晓处前和学生宿舍里，到处是破烂东西。在一些青年教师的支持下，大家又议论着去游行，去街头演讲，去查禁日货。整个学校沸腾起来，这座“叠山书院”几百年来的沉寂空气，第一次被打破了。

这一切行动，引起了那些豪绅的恼恨，他们把这些学生看成是“祸胎”，是“怪物”，他们辱骂学生，说学生们的行动是“祸国殃民”，特别是对方志敏等几个为首的人，更是恨之入骨，他们动员学生们的家长出来，不让学生再“闹”。但是志敏不顾这些压迫，仍旧干下去，他对邵式平说道：

“我们痛恨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更痛恨我们，结果是要决斗的，我们准备吧！最后的胜利总是我们的！”

志敏白天游行、演讲，晚上写标语、印传单，他顾不得吃，顾不得睡，身体累垮了。他本来自幼多病，五岁时腿还软得不能走路，平日只用心读书，不注意锻炼身体，一经连日劳累，病魔就乘虚而入，到暑假毕业的时候，他吐了血，而且，从此种下病根，在以后艰难的日子里，肺病总是缠绕着他，一劳累过度就大口地吐血不止。

志敏回到家里，全家都很高兴。他的堂弟志纯，也特地跑来欢迎他。那时候，一个高小毕业生，被看成是中了秀才，在湖塘村里，还没有过这样的事情，亲戚、族人听说“志敏秀才毕了业”，也都跑来看他。父亲虽没请客收礼，也邀了几个至亲，吃了一顿酒饭。叔叔伯伯们都称赞志敏聪明，有才干，并劝父亲再送志敏到南昌去升学。亲戚们说：“多让他读些书吧，将来漆工镇上的绅士是你家的。”父亲被说得心动了，于是在当年秋天，借了笔钱，又送志敏到南昌，考进了江西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

次年，五四运动爆发了。志敏同志参加了南昌学联的工作，终日去街头讲演，查禁日货。他穿着一件长衫，手里拿了一面写着“查禁日货”的旗子上街了。和他一起的有万义生同志。

太阳当头，天气酷热。但到处是一圈子一圈子的人，人们用惊异的眼光，看着这些拿小红旗的人，听着他们演讲。志敏和万义生走出学校不远，一个人穿着一件灰色羽纱长衫，从他们面前走过去。志敏看着那件长衫说道：

“这人穿的长衫是日本货，撕他一块下来……”，

万义生跑上去，拽住那人的长衫，嗤，撕掉了一大块。那人吃了一惊，回头一看，见方志敏手里拿着“查禁日货”的小旗子，脸立刻红了，便陪笑道：

“撕的好！你们不撕，我自己也要撕的……”

他们走到河边上，一只大木船靠在码头边，船上堆着三十多纸箱飞燕牌的香烟，船工正替一个胖胖的商人往岸上搬运。志敏不会吸烟，但他知道，飞燕牌是目前最流行的日本纸烟。

“我们是来查日货的，你这烟是日本货，不能卖了，你们交出来，我们烧毁它，以示警诫！”

胖商人向他们看了看，理也不理。志敏又和他讲了一番抵制日货的道理，那商人却冷冷地反问道：

“你有官府的谕子么？”

志敏恼火起来，身上摸出几个铜板，向万义生说道：

“去买点洋油来，都烧了他的！”

商人一怔，但仍然挺着肚子嚷道：

“你敢烧么？烧了，就全卖给你了！”

“好得很，我们大家会赔你的。”志敏用手指了指远处听讲演的一大群人说。这时，有些人也凑过来，围了个圈子嚷道：

“烧了他的日本货！奸商！”

“又是东洋货呀！奸商定是私通外国的！”

胖商人见势不妙，扇子不摇了，抱起十多个方方的纸箱子就跑。万义生正好赶来，半碗洋油泼在剩下的十多箱上，用火柴燃着了。虽然只十多箱纸烟，在河沿上也烧得火光熊熊。

“好呀！看烧东洋货哩!”小孩子们快乐地喊着。看热闹的人，好像都得到了满足。

志敏和万义生又走进一家京果店。这店里摆了许多罐头、香烟、葡萄干、洋蜡烛……都是日本货。志敏便对店老板说道：

“这些东西都是仇货，不能再卖了……”

“我们这是将本图利，不让卖，我们吃什么?”店老板强硬地说。

“你爱不爱国？你是不是中国人?”万义生向他嚷着。

志敏和他讲了讲时局情况，最后劝他说道：

“做生意，可以贩些国货，这一次，你每样拿出一点来，我们拿去销毁，作为警诫吧!”

那商人却说道：

“做生意，我们给官府纳税，什么仇货不仇货，爱国不爱国，我们买卖人管不了这许多!”

志敏两人一定要拿一些，店老板一定不肯，双方争执不下。看热闹的人，听见吵嚷，都围过来，挤了一门口。店老板破口大骂，撵志敏他们走。志敏火了，把手里的小旗子倒过来，用旗子棍把架上的玻璃瓶子全打碎了。

“叫巡警来，你们砸我的店！白昼打抢，一个也走不脱!”老板咆哮着，叫人去找警察。

警察来了，志敏拿出“查禁日货”的证件，警察看了看，便对店老板说道：

“你什么货不好卖，单卖日本货？叫你拿出一点来，你还不干！你以为学生子是好惹的吗！告诉你，日本货全部没收。”

店主人愕然了，瞪着两眼看着这两个青年人，他不知道，何以世界变得这么快，官府竟会听起学生子的话来。

两人把洋酒罐头装了一筐，兴高采烈地走出来，到河沿上，他们坐了一只船渡河回去。

两个人都还没有吃午饭，饿得肚子直叫。万义生便打开一盒葡萄干要吃，志敏连忙制止他，说道：“这是查禁来的日货，我们又怎么能吃呢！再忍耐一会儿吧。”

上岸以后，走到车站旁边，看见沙滩上竖着一块日本“仁丹”的

广告大牌子，两个人放下筐，又把牌子给拆掉了。

学生、青年教师们，每天都是这样废寝忘食地干着，志敏更是干得起劲，后来又分派他去街头讲演，他成了这次斗争中的骨干。

不久，志敏又干出一件事情来。

漆工镇上的警察派出所，有个姓余的巡官。照官职来说，这巡官不过是芝麻小官，可是他一身却包办了立法、司法、行政三权，竟成了漆工镇上的一个独裁者。他搜刮民财的办法，也极巧妙，如果没有诉讼，案件清淡，他就派出警察，像商人招揽生意一样四出招揽诉讼。人民的禀帖一上门，他不问曲直，谁出的钱多，谁就有理，谁出的钱少就得坐拘留所，脱了裤子打屁股！打这一场冤枉官司，原告被告两方花的钱，多则一二百元，少的也有几十元。一个月内总有几十场官司，他来了不到半年，就刮了一万多元。土豪劣绅，更与他串通一气，为非作恶。害得九区民众叫苦连天，诉冤无门。志敏听说这事，满腔怒气，立时邀集了几个同学，写了张禀帖送到江西警察厅里，控告九区的那个巡官。当时志敏他们以为，一定是警察厅失察，只要打个禀帖，厅长知道了，还不立即下令将那混账巡官撤职拿办么！于是，他们满怀信心，下了课就跑到警察厅批示处去，看看他们的禀帖批示了没有。到了第十天，批示处果然贴出来了，几个人挤上去一看，只见上面写着："据禀悉，候查明办理可也，此批。"

"这是怎么回事，倒是准了咱们的状没有？"他的同学问。

志敏瞪着两只眼不作声，过了一会，突然握着拳头，照那批示牌一击，说道：

"完了。官样文章！当官的没一个好东西！"

禀帖果然是什么效力也没有发生，余巡官照旧在九区作恶，只不过是经过志敏他们这一告，警察厅长又凭空多得了那土皇帝的一大注赃银。

志敏在学校里读了一年预科，次年升入机械科一年级。志敏这次上学，本是靠父亲借债供应他的，因此他常常穷得没钱用，甚至交膳费也很困难，不得已将带的衣服、帐子也卖了。后来他的堂弟方志纯知道了，便瞒着父亲从家中偷出五亩田契卖了，把钱捎给志敏。志敏虽然这样穷困，他的学习并未受到影响。他读书很用心，上课时用心

听，下课后仍留在课堂上复习功课。晚上，他就到英数专修社去补习英文。因此，每次考试，他的英文、国文、应用力学成绩都很好。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这对志敏有着很大的影响。他一方面贪婪地读着《新青年》等刊物，吸取新思想、新知识，一方面自己也写白话文，写白话诗，反对旧礼教，反对复古，反对读死书。

甲工学校里黑幕重重，教员多是校长的亲戚朋友，不管有没有学识，也都来当教员，办事人员更是敷衍塞责，漠视学生生活。志敏选学的机械科，饭桶教员尤其多。志敏对这腐败情形自是不满，又加从《新青年》里接受了一些革命影响，便团结了一部分热心的同学，酝酿组织学生自治会。

有一天，一位姓赵的教师来上课，他本是个不学无术的家伙，但因为是校长的哥哥，每月也鬼混几十元薪水。在课堂上，学生向他提出好多问题要他解答，他答不出来。志敏便说："好，让赵老师准备一下吧！"过了几天，赵老师又来上课了，还是答不出来。下课后，志敏便领着全班同学去找校长，说道：

"我们几次提的问题，赵老师都不能解答，我们要求换掉这个老师，不能叫他耽误我们的学业……"

校长不答应，并斥责学生不该在课堂上提问题。赵老师没有撵掉，可是谁也不尊敬他，背后管他叫"饭桶"。

教英文的教师也是个拆烂污的家伙，他教英语"水"字的时候，先是拖长声音念："打不油—呵—提—伊—而路—禾特儿（water）。"然后说道：这个水，就是鄱阳湖的水，也是太平洋的水，鄱阳湖的水同太平洋的水有什么分别呢？于是他就从这里大发议论，结果一个钟头的英语，只教了一个"打不油呵提伊而路—禾特儿"。学生们很气愤。志敏便编了一个戏，叫作"私塾的怪现象"，讽刺那些误人子弟的饭桶教员。这个戏演出后，英文教员和赵老师恼羞成怒，一定要校长惩办编剧本的这个学生。于是，风潮便开始了。

学校出了一个布告："着记方志敏大过一次。"

当时，学校机械科的实习工场开放三天，土木科测量仪器等也展览出来，叫市民参观。学生要组织起来做一些服务工作。志敏就趁此

机会，召开了全校学生大会，发起学校改革运动，并且组织了学生自治会，向学校当局提出改进校务的意见。但校长对这些意见置之不理。学生会便又开会，揭露学校种种黑暗腐败情形。这一下，把赵校长惹恼了，立即悬出牌来，开除方志敏等三个学生的学籍。学生机时就把牌子摘下，摔在地上，你一脚我一脚，一阵乱踏，把个牌子踏烂了。同学们喊道：

“走，找赵宝鸿算账去！”

“不收回开除的命令就不放过他。”

大家浩浩荡荡，跑到离学校有半里多路的大凌云巷，把校长赵宝鸿的公馆包围了。砖头像雨点一般投到院子里去，窗户上的玻璃打坏了不少。赵宝鸿吓得藏到床底下。学生们没有找到他，回到学校，学生自治会便另悬出一块牌子来，历数校长贪污公款、任用私人、漠视学生生活等等罪状，开除校长出校。志敏召开了全校学生会，发表演说，散发传单，随后游行示威，到教育厅请愿。足足闹了一个星期，但是毫无结果。原来，江西教育界是由所谓东洋系把持着，势力很大，教育厅长和这个甲工学校的校长，都是这个派系的重要人物。因此，闹尽管闹，校长也没有垮台。结果，校长使出一着毒计——悬牌提早放暑假，便把这场斗争给结束了。志敏仍然被开除学籍，赵宝鸿仍赖着做他的校长。但是，这次“驱赵运动”虽然失败了，志敏不只不气馁，倒觉得又长了一次经验。

南昌第二中学有十几个倾向革命的学生，组织了一个江西改造社。主持者是两个学生，一个叫袁玉冰，一个叫黄道。袁玉冰、黄道看中志敏是个革命青年，便介绍志敏加入了江西改造社。这是个研究性的团体，社员的思想信仰并不一致，志敏和袁玉冰、黄道等几个人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另有几个人，相信无政府主义，其余的人摇摆不定，无一定的政治见解。社内出了一种季刊《新江西》，什么问题都谈，影响并不大。此外，更没有什么作为了。后来袁玉冰、黄道和志敏都加入了共产党，一些有钱的社员升了大学，想作学者，这个团体也就无形解散了。

1921年秋，志敏又考上了九江的南伟烈大学（即同文书院）。这是美帝国主义办的教会学校，校舍富丽堂皇，又俯临着九江有名的甘

棠湖，风景是很幽美的。但是这个学校名义上虽是大学，实际上只有小学部和中学部。志敏即是在旧制中学的二年级。

这期间，志敏仍很重视时事，他终日埋头读新杂志，研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而且研究着俄国革命发展的情况。他赞成俄国的革命，他认为，社会主义在中国必然会实现。他把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当作终身追求的目标，平日跟同学们谈话，常常是“什么叫社会主义，要怎样才能实现？……”同学们笑他，给他起个绰号，叫“社会主义”，有时他一进门，同学们就喊道：“社会主义来了。”他不在乎，照样谈他的，同学们不愿听时，他就背诵一些旧诗：“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襟。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

过了三个多月，志敏到底团结了一些同学，他们成立了读书会，起初还只是看看新刊物，到后来，便成了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小组了。

（原载缪敏《方志敏战斗的一生》，第8～20页）

关于五四运动和邓中夏同志几点回忆

杨东莼

“五四”以前，北京各高等学校已经开始出现了新思想和新文化的活动，特别是十月革命以后，学术思想界的空气更为活跃。但是，除了李大钊同志等少数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以外，谁也对社会主义没有真正的认识，谁也不明白怎样才能真正挽救中国。那时，知识界有着一种狂热的追求真理的愿望，只要是一种比较新的学理，就会立刻有人把它介绍到中国来。除马克思主义外，还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等，也有人在介绍、在提倡，连武者小路实笃所理想的新村也被人作为主义来信仰了。

在马列主义的传播方面，有许多人曾经做过一些工作。我记得，李梅羹就翻译过不少列宁的著作，他是湖南浏阳人，笔名墨耕。但最重要的还是李大钊同志，他除了经常在《新青年》杂志（以前叫《青年》杂志）上发表文章，极力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列主义以外，1920年（?）起，每周在北大还正式开过两小时唯物史观的课。这对于青年有着重大的影响。当时，李大钊、邓中夏等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创办了劳动补习学校和《先驱报》，由学术性的探讨转而进入革命的实际行动。

我是1918年暑天才到北大的。除了最初几个月住在西斋学生宿舍外，之后我一直和邓中夏同志住在一起。起先，我们两人在西斋对

门中老胡同二号合租了三间南屋，之后又一同搬到达教胡同四号。我们朝夕相处，先后几达三年。

邓中夏字仲澥，又名邓康，年纪比我大了五六岁。他是湖南宜章人，家里大约是一个小地主。来北京以后，他即和家庭断绝了联系。在我的印象中，邓中夏是一个非常朴素、勇敢和热情的人。他爱帮助别人，在同学中，他享有很高的威信。

邓中夏在北大念的是中文系，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较早。当时他不懂外国文，学习马克思主义时曾遇到了不少困难。他学过日文，但因工作忙，没有学成功。

"五四"以前，邓中夏曾经组织过平民教育讲演团，宣传过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在群众中起过很大的作用。他平日很注意实际的革命行动，不爱表现自己，"五四"以后许多重要的组织工作几乎都是在李大钊同志的指导下，由他一手搞起来的。我常常见他整天都在找人谈话、研究和处理问题，很少看见他休息。那时，他除了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活动以外，还积极地从事了铁路工人的组织和教育工作。在他的领导下，在长辛店成立了一个劳动补习学校。这个学校表面上以补习为名，实际上却是对铁路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教育的。此外，还秘密地创办了工人刊物——即前页提到的《先驱报》，主要也是对工人进行宣传和教育用的。这个报当时系在北大地下印刷厂秘密地印刷，我记得报头上在"先驱"两字的下面还有 Vorwärts 这个德文字。先后出过好几期，撰稿人就是以他为首的许多同学。

当时少年中国学会的情况很复杂，内中既有李大钊和邓中夏这样的革命派，也有反动的国家主义分子，彼此间的斗争是激烈的。邓中夏由于同国家主义分子的主张相反，终于离开了少年中国学会，全心全意地去致力于铁路工人的组织工作。他革命原则性之强，在这个问题上也可以充分地看出来。

那时，在邓中夏领导下有些同学经常去长辛店和南口铁路工人中工作。工人的生活很艰苦，邓中夏与工人同住、同吃，过得很自然。他是湖南宜章人，口音与长辛店南口的同志相差很远，然而他却能突破语言上的障碍，与他们谈笑自若。我曾亲眼见他在车辆修理厂中活

动，与工人同志打成一片，工人同志很主动地接近他，在他和他们之间，殆已结成了深厚的友谊。

以上这些，便是我当年和他相处时所留下的一点印象。

（杨东莼先生口述，何忠汉、康右铭记录、整理）

回忆四十年前的战斗英雄马骏烈士

刘清扬

青年朋友们！我们在今天回想起四十年前，生动活泼的青年马骏同志，他那种和蔼可亲的音容，那种坚强不屈的爱国意志，那种生龙活虎似的斗争精神，那种与人为善、最喜欢帮助人的热情，直到今天还像是生气勃勃地活跃在我们的眼前。我们回想起他在生前奋斗的事迹，实在是给我们现在的青年朋友们，树立了非常光荣的榜样。在今年我们不但要以兴奋的心情迎接五四运动四十周年的光辉节日，更要英勇的劳动，学习革命先辈们的革命精神。

马骏同志是黑龙江省（前吉林省）宁安县人，生于 1895 年。在五四运动的时候，他正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他是个品学兼优，勤苦好学，诚恳朴实的好学生。在十月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产生了强烈的爱国观念。在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爆发以后，天津的青年急起响应，发动了学生的示威游行，成立了天津学生联合会，马骏同志当选为副会长。由于马骏同志有高度的爱国热情、组织能力和演讲的天才，所以他成为天津反帝爱国运动中极受青年学生们爱敬的领袖之一。

一、马骏同志领导天津青年宣传讲演运动

他领导天津青年学生们的讲演队，每天散布在大街小巷，向全市的人民宣传爱国主义。他反对封建军阀卖国，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

对商人们贩卖日本货，更反对北京军阀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私订的卖国密约。要求取消二十一条亡国条约；要求收回山东的青岛，铁路、矿山，不能让日本占领；要求罢免并惩办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个卖国贼；要求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拒绝不合理条约的签字；他号召天津市全体人民，群起保卫祖国，坚决不当亡国奴；他更积极负责领导各商店店员，坚持抵制日货运动，给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经济侵略以严重打击。由于他的爱国忠心和讲演的天才，每当他讲演的时候，总是慷慨激昂，声音洪亮，口齿流利，语言坚强，使听众人人都深受感动！马骏同志就以这样英勇革命的姿态，领导天津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

当时的反动政府不给人民爱国的自由。天津学生联合会于5月14日成立后，在马骏同志领导学生讲演队进行热烈宣传的时候，天津警察厅派出军警，横加干涉，禁止他们在街市讲演。但爱国学生仍然不顾一切，大批的讲演队还是出发，沉痛地讲述日本帝国想灭亡我国的野心，以及讲说朝鲜人民在亡国后遭受的惨痛压迫。讲演的人和听讲的人们，都激愤的痛哭流涕。但天津警察厅压迫得更严厉了，不服从禁止的就被逮捕。因此5月23日经天津学生联合会决议，十五个中等以上的学校一律宣布罢课，发出宣言，反抗军警的压迫，争取爱国自由，并决定于6月5日举行请愿示威游行。

二、马骏同志领导爱国大会和公民大会

6月5日上午十点钟，在南开中学广场，召开了第一次爱国运动大会，马骏副会长领导全场学生群众，以气宇轩昂的姿态，春雷贯耳的洪亮声音，宣读六项誓言：（1）誓保国土。（2）誓挽国权。（3）誓雪国耻。（4）誓除国贼。（5）誓共安危。（6）誓同始终。马骏同志大声在宣读，广大群众随声在响应，马骏同志的声音真是气壮山河、震动环宇。读誓词后，宣布全体游行，齐向省长公署请愿，提出三项要求：（1）请对学生讲演勿加干涉；（2）请省长电中央释放北京被捕的学生，并将青岛争回，将二十一条取消；（3）请准开公民大会。到省长公署后，公推马骏等五位代表去见省长，但反动的省长曹锐，竟

完全拒绝了大会提出的三项要求。马骏同志出来愤怒地传达了请愿的失败，引起群众的激愤，一致宣布再接再厉请愿，并要求商界以罢市支援爱国运动，不达目的不止。

6月9日下午召开公民大会，盛况空前。由于学生爱国的意志坚定，在5日请愿失败后，又于8日，再接再厉地二次去见省长请愿。仍由马骏等前去力争上项要求，必须批准。马骏见到省长曹锐，以义正辞严、坚强的态度，表示了来意，说明爱国群众的合理要求，不达目的不止。曹锐看到代表声色俱厉，意志坚决，明知不能压制爱国热情，才勉强批准准予自由讲演和召开公民大会的要求。

公民大会的盛况，表示天津市民保卫祖国的热情和决心。大会在河北公园召开，下午1点钟开始，到会公民有两万多人，由各校学生组织讲演队，分设二十多处讲演台，经过头天晚上学生联合会以一夜的辛勤劳动，把大会场布置的严肃整齐，并在中心小亭子的抱柱上，贴着一付对联，上写："振民气合民力万众一心，御国敌除国贼匹夫有责！"在那样热烈的气氛中，看到这一付对联，特别振奋人心！

马骏同志宣布开会，并报告开会的意义说："同胞们！我们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已一个多月了！全国人民热血奔腾一致呼吁救国，反对军阀卖国，要求拒绝巴黎和会签字，但至今我国政府，在国际外交会议上，还未表示拒绝签字的决心；卖国贼曹、陆、章至今还未罢免惩办。他们都是官官相护，一鼻孔出气。要想达到我们救国的目的，只有靠我们人民大众团结起来，奋斗到底！"广大群众像潮涌般地高呼："誓死救国！""不当亡国奴！""取消二十一条！""还我山东！"激起了群众的怒吼，都自动登上讲台发表讲演。并有人断指写血书"睡狮已醒"四个大字，使群众受到了深刻的教育，表现爱国人民的力量是强大的。

公民大会公推马骏去商会董事会，要求立即罢市，支援学生爱国的要求。当时商会董事会议，正在犹疑不决，马骏去了痛切陈述公民大会对罢市的希望，并声言：如不能立即罢市，便立即回报公民大会，全体公民将全来商会要求。商会董事深怕两万人的包围，只好接受公民的要求，决定从10日起，以全体实行罢市，要求北京政府罢免三个卖国贼，并拒签和约。

10 日罢市后，学生联合会组织临时纠察队，协助维持秩序，所以整天社会秩序都很好。但到次日，唯利是图的商人，在提要求尚无结果的情况下，竟公然开市。学生会得到报告，当天上午又推马骏带领多人前去质问商界开市的原因。马骏质问商会董事说："日前大会全体公民一致表示'誓死救国'，并要求商界一致行动立即罢市。昨天罢市情况良好，何以今天竟无故开市？商界诸君的爱国良心何在？既然罢市而又开市，究竟是为什么这样自相矛盾？恐诸位也无法自解。"当时有一个商董，竟问马骏是何处人，天津有没有财产？马骏明白他的恶意，即愤然起立说："本人是吉林人，天津固无财产，我尚有生命热血可流于诸君面前，一死以谢同胞。"马骏说完话，挺身以头去碰大柱子，幸而旁边有人，两手把他抱住。原来昨晚曹锐竟欺骗说是大总统已批准曹、陆、章等的辞职，而商界竟为自私自利，与他妥协，就开了市。经过马骏这样青年不惜牺牲生命以救国的决心，竟感动了多数的董事，又决议从 12 日起，再继续罢市，直到北京政府迫不得已，下了罢免令，14 日才一律开市。由于马骏同志的坚决斗争，教育和团结了各界爱国人氏，所以在 6 月 18 日，便组织成立了天津各界联合会，就更加强了天津爱国运动的群众基础。并在 6 月 27 日，由天津各界联合会派代表进京，联合北京代表，共同向徐世昌总统请愿。经过两日的斗争要求，代表们见到徐世昌总统，当面坚决要求政府必须去电巴黎，制止中国代表签字，徐世昌才被迫拍出电报。凡这一切，都同马骏同志英勇机智的领导分不开。

三、反对民族罪人马良的斗争

在反动军阀统治下的国家，爱国救国运动，并不仅仅是罢免几个卖国贼，或拒绝和约签字就算得到最后胜利。卖国军阀和官僚，他们都一气相通。而且日本帝国主义欺侮我国的阴谋，虽拒绝了签字，他们也不会甘心罢手，还会出新的花样来侵略我们。所以大家在斗争的运动中逐渐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觉悟。

各地的爱国运动都一天比一天高涨。尤其山东是直接受害的地区，爱国运动就更加热烈。北京反动政府，想镇压爱国运动，竟从地

方上下手。山东省镇守使马良，原就是反动亲日派，更加北京政府委任他为山东戒严司令，于是他就执行屠杀任务，竟杀害了回教救国会领导人马云亭等三人，并更残酷镇压爱国运动，禁止活动，引起全国爱国人民的公愤。山东省派人到天津各界联合会报告惨案真相，要求给山东爱国运动以支援。马骏同志听到报告之后，非常愤怒，认为马良是回民中的民族罪人，不能容忍。他立即联合郭隆真和我，因为我们都是回民，就在回民中掀起反对马良的宣传。因为马良有声望地位，所以他在回民中很有威信。因此马骏首先带头，联合我们一同到回民小学去宣传马良杀害回民爱国同胞的罪行，激起公愤，便在回民聚居的地带，作了广泛深入的宣传，然后又到清真大寺门前，召开回民大会，作了激烈沉痛的讲演以后，由于群众的愤怒，就群起把马良给清真寺所写的金字大匾，摘下来，劈碎了，既洗刷了民族的耻辱，也横扫了马良在回民中的威信。马骏是一个回族的爱国青年，他对马良的反动卖国行为，能敌我立场分明，他的坚决斗争精神，使人们对他特别敬佩。

四、翻天覆地的天安门请愿运动

津、京代表，为要求惩办马良，第二次向徐世昌总统请愿，于8月23日，在新华门前，25位代表竟全体被捕，拘押在京师警察厅。当时的反动警察总监吴炳湘，竟扬言枪毙25位代表，以“杀一儆百”，好消灭爱国运动。

代表被捕的消息，即日从电话中报告天津学生联合会。学生日报的号外，在全街叫卖：“学生日报号外！号外！”“同胞们！京津请愿代表被捕了！我们要群起反对！要营救他们！”卖报的人们都成了宣传员，引起全市人民的义愤，人手一张号外，大骂卖国政府。

学生、妇女、各界人士都自告奋勇，要再接再厉进京参加请愿，营救被捕代表。谁也未被枪毙代表的消息吓倒，反而更加斗志昂扬，绝不屈服。报名进京的有一千多人，被批准了半数。这是一场尖锐的斗争，关系着爱国运动的发展。这一伟大艰巨任务的领导就落在马骏等人身上。马骏所以未参加前一次的请愿代表团，正是由于考虑到运

动的发展。这一次他带领天津的代表团分批进京，与北京学生群众会合有三四千人。8 月 26 日开始请愿行动，临行以前，数千学生公推马骏为总指挥。马骏便以慷慨激昂、坚决勇敢的气概，说明了这一次请愿的艰巨任务，要求大家以万众一心、团结成铜墙铁壁，准备战斗，准备牺牲，必须达到释放代表和惩办马良的目的。大家一致高呼响应："不达目的不止，完全听马骏的指挥！"就以整齐的队伍，走向反抗卖国政府的战场。

请愿代表先到新华门前，已是警卫森严，枪刀林立，如临大敌。吴炳湘竟调动了全城的军警包围了代表大请愿的数千群众，企图把学生大队驱散。但学生群众在马骏同志的领导下，指挥有方，进退一致，几千人团结成为一座坚固不破的长城。军警的压迫驱逐，完全不能解散他们，只有更加强包围他们，直斗争到第三天，竟把大队学生压缩到天安门前。而马骏到天安门，更加生龙活虎，把天安门变成了宣传讲演的战场。后来反动的军警看清了马骏同志的领导能力，学生群众团结在他的周围是无法解散的。因而更进一步，把大家都挤进天安门里边去，然后就声张要逮捕马骏。同学们为了爱护他，不允许他出面。反动统治者，竟羞恼成怒，用皮鞭、枪托乱打学生。马骏同志不忍同学挨打，挺身而出，大声喊道："我就是马骏，你们不要打人，要逮，就逮我好了！"警察把马骏同志逮捕了。大家仍在力争要求释放马骏同志，他们为要解散学生，当然不肯释放马骏同志。马骏同志坦然自若，向大家告别说："同学们！不必害怕，我们这次请愿是抱着牺牲决心而来的，他们是逮不尽爱国青年的，我们还要坚持奋斗下去！我们爱国无罪，早晚总会释放被捕的代表！"群众被驱逐分散后，仍高呼"打倒卖国军阀"、"要求释放被捕代表"，声音震荡北京的夜空。经过这一场的英勇奋斗，得到全国的声援，终于在 8 月 30 日全体被捕代表都被释放了。为了纪念这场斗争，大家都称马骏为"马天安"。

五、坚持革命救国直到最后牺牲

马骏同志从北京释放以后，回到天津，和学生会、女界爱国同志

会的领导骨干成立了革命先进的小组织觉悟社，然后又被公推去上海，协同三人代表发起组织成立全国各界联合会，并被选为驻沪常任理事，掌握领导全国各界的爱国运动，对运动起了很大推进作用。1920年1月他被调回津，参加天津抵制日货的斗争，与各界联合会副会长马千里共同为营救被捕学生也相继被捕，天津爱国运动受到严重压迫。为了作最后的抗拒斗争，在1920年1月29日的大请愿运动中，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四位代表也均被捕。天津先后被捕代表共27人，拘禁将近半年，直到全国人民爱国斗争取得最后胜利，大家才于7月17日一同释放出来。马骏同志蓄起了很长的胡须，朋友们又称他为“美髯公”。

马骏同志是五四青年反帝爱国运动中杰出的领导者，于1921年我国建立共产党后，在天津成为第一批入党的先进党员。后回到家乡，在育文中学教书三年，兼作地下革命活动，1925年党派他去莫斯科学习。因为他是回族青年，特别重视党的民族政策，并努力学习苏联革命斗争经验和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

1927年，因北京党的工作受到重大损失，马骏同志被调回国，党派他到北京任市委书记工作。当他路过天津时，会到五四运动时的知交，大家知道他去北京作地下活动，非常替他担心，有人劝他不要到北京，因为北京的军警对他认识，恐怕不易隐藏下去。但他对党交给的工作，以无限的忠诚，虽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依然坚决到京。他为了避开探狗的逮捕，用种种化装掩护，并居住在贫民区，致使反动侦探到处寻觅竟无所获。不幸有人不慎，泄露了秘密，终归在市委开会时，同时和许多人都被逮捕。马骏同志被捕后，虽受尽惨酷的非刑，始终坚贞不屈，终于在1928年2月15日英勇牺牲。

马骏同志是党的好干部，是人民的好儿女，是革命的好战士，更是后一代青年学习的好榜样。我们今天回忆他和纪念他，正是为鼓励我们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祖国而奋斗。

五四期间的郭隆真同志

刘清扬

1919年5月4日，中国知识分子和男女青年学生，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阴谋侵略我国，在北京爆发了反帝爱国运动。郭隆真烈士首先在天津女师学校响应，号召全体同学参加救国运动，并发起组织成立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向校外发展，广泛动员各界爱国妇女入会，扩大团结奋斗的力量。全体会员有六百多人，从十三四岁的小学生，以至六十多岁的老太太，都是热情高涨，积极投入爱国运动。郭隆真烈士，更对奔走联络，宣传呼吁，不遗余力。

在五四运动高潮中，北京与天津的学生联合会经常联合行动。如两次向当时的大总统徐世昌请愿，要求拒绝巴黎和平会议的签字，郭隆真烈士都积极晋京参加斗争。第二次，竟因要求惩办枪杀爱国群众领袖的山东省长马良，全体请愿代表二十五人都被北洋军阀政府逮捕，隆真烈士是四位女代表之一。拘捕后，虽然几乎被判处死刑，但她始终欢欣鼓舞，毫不畏惧，时常高声欢唱。在开来的菜饭中发现有日本产品，如洋粉、海带等物，甚至斥责监所警察，拿回去调换别的食物。四位女代表中，有二人是回族。因当时警察厅长常朗斋也是回教徒，所以饭菜是从他的厨房开来的。虽然饭菜还不错，但被捕代表绝不被软化屈服，依然坚决抗拒、斗争，对反动统治者毫不宽容。

在天津进行多次的群众大游行，常首先由女界同志会的妇女队伍作前驱。郭隆真烈士英勇领导，一遇阻碍或发生冲突，她便带领妇女群众冲上前去，以防军警殴打男同学。在作冲锋前卫的斗争中，忍受

枪托和木棍欧打，以及冷水浇头的摧残打击，隆真烈士坚持苦斗，绝不后退。直到天津爱国运动受到严重压迫，各界爱国人民进行最后一次巨大的请愿运动时，郭隆真烈士和周恩来同志等，同时被拘禁，半年之后，始得开释。

（原载《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2期，第125～126页，
原题《郭隆真烈士传》）

杂谈“五四”

许德珩

谈起“五四”，我想先谈一下五四时代的北京大学。

一、“五四”以前的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前清称京师大学堂，它是中国一所较老的大学，到“五四”那年已经有了二十一年的历史了，它有文、法、理、工、商五科和预科，学生约一千八九百人。1916 年以前，校风还很腐败，学生年纪大的相当多，举人秀才在里面讲书的也还有。学生寄宿舍只有马神庙西垒、沙滩东垒和北河沿八旗先贤祠三处，大部分学生在外面寄宿，住公寓。学生不穿制服，也没有制服，一般是长袍马褂，时髦一点的穿长衫西装裤。整个的学校没有图书馆，只马神庙理科有一座古老的藏书楼。学生除读死书的外，打麻将牌、捧戏子、逛八大胡同，成为风气。当时北京社会上有“两院一堂”之称，“两院”就是参议院、众议院，“一堂”就是京师大学堂。生活自由散漫，谁也不管谁，偶一发生问题，就写了贴出来，赞成的，反对的，你唱我和，花花绿绿，贴满墙壁，这是当时的一般情况。

二、蔡元培来校与北大的思想情况

1916 年冬，蔡元培被任命为北大校长。蔡是清末的一位翰林。辛

亥革命，参加过孙中山先生的南京临时政府，做教育总长，癸丑年国民党反袁失败后，流亡海外，袁世凯死后回国，1916 年各被任命，1917 年 1 月到北大任职。他到校不久，宣布了他的办学宗旨，有“兼容并包和学术思想自由……”等等，这当然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作法，可是对封建型的北京大学当时却起了不小的影响。在他的“兼容并包”之下，聘请了陈独秀做北大文科学长（文学院长）、李大钊做图书馆馆长，也聘请了胡适、王星拱、刘半侬、徐宝璜这些“新人”到校当教员。因为“兼容并包”，最顽固的旧教员复辟分子，拖着一条大辫子的辜鸿铭也包了下来，还聘请了拥护袁世凯做皇帝的筹安会人物刘师培到文科当教员，投考北大未取、年仅二十二三岁的顽固分子梁漱溟到校教印度哲学。在“学术思想自由”的口号下，发起了许多学会，如哲学会、雄辩会、音乐研究会、新闻学会、书法研究会、画法研究会、消费公社、健德会等等，当时国内著名的书画家陈师曾、音乐家萧友梅、新闻记者邵飘萍等都在这些学会之中，一时学校的空气活跃。这里特别来谈一下他发起的进德会。进德会以不嫖、不赌、不娶妾为基本戒条，遵守这三个戒条而入会的称甲种会员，加上不做官、不做议员为乙种会员，再加上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三条的为丙种会员，这个组织以消极的“不参加的”办法来抗议旧社会，表现了蔡元培的“道德救国”和知识分子“超政治”的资产阶级幻想。

陈独秀原办《青年杂志》，之后改为《新青年》，主张白话作文，宣传文学革命。胡适以文学改良论，附和陈独秀的白话作文。刘半侬、王星拱及旧教员钱玄同等加入，李大钊、鲁迅两先生也加入了。这就集中了新文化运动的人物，形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基本营垒，在这个营垒中，有无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新的文化阵营在北大建立起来了，旧的势力也很大，以黄季刚（侃）、刘申叔（师培）等人为领导的“卫道派”，反对白话作文，1919 年 1 月，刊行了《国故月刊》。

另一个方面无政府主义思想在北大也很活跃。蔡元培校长到校后，聘请了清末一个大官僚的儿子李石曾到北大教生物学，聘请了当时伪装进步的反动分子吴稚晖当学监，李只来了一个很短的时期。吴

稚晖到了学校未正式就职。但是，无政府主义思想却由他们传播到了北大来。李、吴这班人，欧战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法国巴黎开豆腐店，办了一个刊物叫做《旅欧周刊》，常常介绍蒲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人的思想，鼓吹无政府主义，同时也有人翻译了克鲁泡特金、蒲鲁东的著作。蔡校长本人当时也有无政府主义的倾向，这就助长了他们的这类宣传。由于当时中国的政治太坏，学生们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水平太低，又有社会上这些“知名之士”来鼓吹提倡，所以北大在最初一个时期，倾向于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学生还不少，其最活跃的，我记得有凌霜（黄）、声白（区）这些人，他们当时主张不要国家，不要政府，不要家庭，把“爱国”、“救国”看成是落后的思想行为，他们不赞成，也不参加。因为不要家庭，所以他们的名字上多半不冠姓，如“凌霜”、“声白”之类。

1917 年伟大的苏联十月革命成功，振奋了当时北京大学一部分教员和学生，李大钊同志是接受十月革命影响的代表人物，他欢呼“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不过当时社会上介绍这一方面的东西还不够多，报纸上报导也不详实，反动派常把“布尔什维克”译成“过激党”。接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918 年 11 月），“协约国胜利了”，德国失败了，中国因为参加了协约国，有些人做梦把自己看成是什么“胜利国”，一时“公理战胜强权”的口号高唱入云。受美、英资产阶级教育的知识分子如胡适等人大事宣传美国的“民主”，美帝总统威尔逊骗人的“和平十四条”被宣传成了“民主”的象征，一个投机分子的学生傅斯年因为要讨好胡适，据说他可以把“和平十四条”一字不差的背诵得出来。这时，新文化运动里面，除《新青年》外，还创办了《新潮月刊》。

三、五四运动的前奏

上面我简略地谈了一下蔡元培校长到北大以后和五四运动以前北京大学思想的一般情况。苏联十月革命成功，资本主义世界大战结束，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思想深入人心，而国内军阀和帝国主义压迫剥削加强，这就构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五四运动产生的直接原因，

但我在这里还要来谈谈下面的几个问题。

第一是“五四”前一年的学生爱国示威运动

1918 年春间，中国留日学生因反对北洋军阀与日本签订“中日军事协定”把德国侵占我们山东的权利转让给日本，在东京开会，被日本警察打伤并拘捕了好几十人，因此激起全体留日学生的愤怒，他们罢课归国。国内学生界也因日军侵占山东，在山东无耻的暴行，感到愤怒。5 月中旬，归国学生代表到了北京，与我们见面，经过几天的奔走酝酿，于 5 月 21 日北京学生发动了向统治者示威请愿运动。这是一次空前未有的运动，参加这次运动的有北大、高师、高工等学校学生二千多人。

这次运动没有结果。但是学生们感觉到有组织起来之必要。先是北大一部分学生组织了学生爱国会，有些人受了当时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以为“爱国”是落后的思想，为得适应环境，学生爱国会改名为“学生救国会”。参加的不限于北京大学，有北京各学校的学生。暑假中这个会派了代表到天津、济南、南京、上海等地联络，各地学生因之也都加入了学生救国会，而这个学生救国会就几乎成为全国性的学生团体了。

为着加强联系，做好宣传工作，救国会筹备出版一个刊物叫《国民》杂志，经费是由南北各地学生自己凑集的，他们每人出五块大洋，共凑集了一千三百多块钱，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因为这个杂志的目的是宣传爱国、反帝、反军阀，不是谈文学革命，参加的人又不限于北大的学生，所以北大当局不让我们在北大挂牌子（虽然北大的同学参加这杂志的很多），于是我们只有在校外租房子了。我们在北池子骑河楼路南一栋房子里租了一大间房子，通信、开会、讨论问题都在那里。担任编辑的同志据我现在所能记忆的，有邓中夏、黄日葵等。我们还邀请了李大钊先生做我们的指导，邀请了新闻记者邵飘萍先生做我们的顾问，也邀请了杨昌济先生替我们写文章，这些先生们也常常为杂志写文章，尤其是李大钊先生是经常的写，他有两篇批评胡适的文章就是在《国民》月刊上发表的。邓中夏同志用“大壑”的笔名，每期都为杂志撰述“国内外大事”，介绍国际新闻。《国民》某一期上，还刊登了《共产党宣言》译文。

第二应当提到的是平民教育讲演团

平民教育讲演团是北大学生的一个组织，1919 年 3 月成立，事前酝酿了很久。先是北大学生有校役夜班（工人夜校）之设立，它的目的是为校内工友补习文化，讲解时事，成效良好；以后扩大到校外。讲演团的宗旨是“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自觉心”，北大学生有很多人都参加了，我们敬爱的毛主席也参加了这个组织来指导我们。在成立会上推选了职员，邓中夏同志被选为总务干事。这年的 3、4 月间，讲演团常到街头讲演，出发时两三个人或三五个人一组，事前拟好题目，选定地点（有时也不事先选地点），打着讲演团的白布小旗，有时仿照基督教救世军的宣传办法，携带一面小铜锣，到达一个人多适当的地方，主讲人站到高一点的场所，另一个人打起锣来，这就讲起来了。庙会是我们很好的讲演场所，可是常常被警察干涉。这个讲演团到五四运动就成了学生会的一个组织，参加的人多了，几乎每天都要到街头去讲演或贩卖国货书报。北洋军阀的军警常常抓，他们抓一批，我们就增加一批。这样，人数越来越多。到了 6 月 3 日那天，北京因街头讲演被抓的学生达一两千人，牢里关不下，把北河沿北大三院礼堂做了临时监狱。当时，整个的城市几乎都要动起来了，真是始料所不及的。总之，平民教育讲演团对五四运动发挥了很大的群众宣传作用，邓中夏同志等也常常因此到长辛店去讲演，把运动扩大到工人群众中去。因为参加的人多了，组织也复杂了，以后讲演也就渐渐地少了。

第三应当提到的是少年中国学会

少年中国学会是一个学术性的政治团体，1918 年 6、7 月间由李大钊同志等人发起，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另有“奋斗，实践，坚忍，俭朴”四个信条。参加这个组织的主要有这几种人：（一）向往苏联十月革命的一些人；（二）因反对日本侵占山东而归国的一小部分留日学生；（三）从事爱国运动的国内各学校少数学生。“五四”前，会员不到六七十人，团结精神相当紧密，革命的先烈如邓中夏、恽代英、赵世炎等人，参加了这个组织，反动的国家主义分子、后来堕落成为青年党的曾琦等也混进了这个组织。会员发展到一百零八人，出版了《少年中国》月刊，由李

大钊同志主编，另外出版了《少年世界》，邓中夏同志是负责人之一。这个学会的会员，因为散在国内各大城市，都同情或直接参加五四运动，之后虽因认识不同走向分裂，但在五四运动当时，在联系社会人士方面，却起了一定的作用。

另外，对五四运动起推动指导作用的，还有《每周评论》，在此就不多讲了。

谈少年中国学会

周太玄

少年中国学会这个团体，它的酝酿地点是两个地方：国内是北京，我和王光祈在这里；国外是东京，曾琦等人在那里。后来东京同人回国。1918 年 6 月 30 日在北京召开筹备会议。“学会”的发起人是李大钊（守常先生）、王光祈、曾琦、陈淯、雷宝菁和我等 6 人。早在民国成立前后，王光祈、曾琦、我，都在成都一个中学读书。“学会”的结合，那时主要因为大家都是青年，想奋发有为的精神一致，但也和这种同乡朋友之谊有关。

守常先生比我们年长七、八岁，听说他在东京时就很“爱才”，见到小兄弟辈奋发向上，他是很高兴的，并给予鼓励。守常先生喜欢“英发之人”，他为人很宽厚，我们很尊敬他。我们决定干什么，都要和他商量。又因为他任编辑主任，《少年中国》月刊上的重要文字都经他看过。我们把他当老大哥看待，大家把他视为道德上的最高典范。守常先生在东京对马克思主义已很有研究，但遇着讨论问题时，总是说：大家一起研究研究嘛，研究学问总是好的。他总是综合别人的意见，对我们启发很大。

在这次筹备会上，大家公推王光祈为筹备处主任，李守常先生为编辑部主任，我当文牍。大家商定“学会”的四条规约是：“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气。”

我们为什么要组织这个团体呢？从我们的规约中可以看出，大家是想在当时那个黑暗社会中，奋发有为，充实自己，改造社会。学会

的主要精神表现在这几个口号上："奋斗、实践、坚忍、俭朴。"大家认为还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纯洁。"因为一个心地不纯的人也能做到奋斗、实践、坚忍、俭朴，而那样就更坏了。会章规定得很严，要求入会者，需有五个会员介绍，经过评议部审查通过，方成为会员。会员须遵守"学会"的规约，违反者，就要请他退会（即开除）。如有位罗君，他与大家的感情还不错，其他方面也好。就是一点，他有一个小老婆。我们当时是主张男女平等反对纳妾的，因此，我们向他提出两条路：或是退掉小老婆，或是退会，由他选择。终于，他退会了。还有一位，他当了县长。做官是我们反对的。于是，我们也请他退会。还规定：可以自由退会。黄忏华就是自己退会的，他说："你们规定得太严，什么都要拿到会里来谈，我受不了。"那时，我们私人的一切活动，不管是经济，不管是婚姻问题，什么都得公开谈出。之后，"学会"发展起来，最盛时，有会员一〇八人。

少年中国学会很快就出现分裂现象。基本上形成三派：一派倾向共产主义，有守常先生领导；另一小撮是国家主义，有曾琦、李璜等人；还有一些人是既不赞成共产主义，也不赞成国家主义。后来倾向共产主义的人和国家主义派针锋相对，互相斗争，最后分裂。

（摘自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周太玄先生谈少年中国学会》，手稿本）

五四运动期间的少年中国学会

川　岛

如果有人还记得1919年7月间创刊的《少年中国》月刊，以及后来的《少年世界》，便会想起当时的少年中国学会来的。这个学会是由五四时代的一群“有志青年”组成的。开头只有七个会员，一年之后就有七十几个了。之后越来越多，散处在国内各大都市；在国外，也有分会的组织。不像同时期的新青年社和新潮社，社员只是几个北大的教员和学生。蔡孑民先生在当时曾说：“现在各种集会中，我觉得最有希望的是少年中国学会。因为他的言论，他的举动，都质实得很，没有一点浮动与夸张的态度。”（见《蔡孑民先生言行录》169页）

李大钊先生是这个学会的主要领导之一，自始至终的领导者。就我记忆所及，如：毛主席、恽代英、邓仲澥、杨贤江、高君宇、李达、黄日葵、缪伯英、蔡和森等诸位，都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而且这几位中有好些位在学会中是起重要的领导作用的。还有像左舜生、余家菊、曾琦、李璜等，以及当时新潮社的康白情、孟寿椿和徐彦之，现在北大任教的许德珩和周炳琳诸位，也都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他们有四条信约：（一）奋斗；（二）实践；（三）坚忍；（四）俭朴。他们要“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但是有宗教信仰的人，不能充作会员，即使已经做了会员的，也要请自动的退出学会。

如1920年的工读互助运动，以及后来的非宗教运动大同盟，民

权运动大同盟，都有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在里边做骨干的。

“俄国人曾经在几十个年头内，经历艰难困苦，方才找到马克思主义。中国有许多事情和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相同，或者近似……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这话是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过的。在“五四”初期，一般说来，还存在着这种现象。所以那时的“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对于国家主义、社会主义、安那其主义，极不一致，但各会员对他自己所信仰的主义非常坚强，非常彻底……少年中国学会的任务，便是从事各种主义共同必需的预备工夫。把这一段路程走完——即指各种主义共同必需的预备工夫——再商量走第二段的路程。”（见《少年中国》第1卷，第6期，王光祈的《少年中国学会之精神》）。

因之，像曾琦、李璜、左舜生、余家菊等也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他们是国家主义派，咱们就不用提了。

1920年8月，天津觉悟社、曙光社、青年互助团及人道社四个团体的领导和代表周恩来、刘清扬等人，与北京少年中国学会代表李大钊在北京陶然亭开会，决定这五个团体联合组织起来，称作改造联合。他们宣言：“到民间去。”并且要进行如下的工作：“（一）宣传事业之联络；（二）社会实况之调查；（三）平民教育之普及；（四）农工组织之运动；（五）妇女独立之促进。”

少年中国学会在成立一年之后，不但和别的社团联合起来，形成了统一战线，在任务和工作方面，也渐渐的由朦胧而显明，比先前更实际更具体了。在学会中李大钊先生又提出“主义”来。学会中的最高领导机构是评议会，李大钊、恽代英、杨贤江、黄日葵四位都是评议员，全部评议员的名额记得好像一共是五个。

到了1921年7月以后的情形，我就知道的更少了。大抵会员们思想进步得更前进，落伍得更落后，到后来就分裂了吧？以后，在《向导》上，还常常看见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中共产党人的文字，李璜、曾琦们就变成了《醒狮》派。

在现在看来，少年中国学会的分子是相当的杂，但是在会员中有这许多共产主义者，而且这许多共产主义者的会员们领导着这个学

会，也许这就是蔡孑民先生以为“最有希望”、压过当时各种集会的道理吧。

少年中国学会所发行的《少年中国》月刊，在当时，至少我有这样的感觉：是和《新青年》、《新潮》两个杂志鼎足而三的。说不定有人不以我为然吧？

（原载《北大周刊》1950 年 5 月 4 日第 4 版，
原题《少年中国学会》）

“五四”与妇女解放运动

陈　素

第一次的世界大战，带给了全人类以极大的灾害，成千成万的人民都无辜地被驱向死亡，因之各交战国的劳动力感到缺乏，使欧洲各国妇女不得不都来参加生产事宜及前后方各种工作。在工作成绩中，显示了妇女伟大的力量，给了自法国革命以来妇女解放的理论一个事实的证明。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妇女之被重视，妇女地位之被提高，更振动了全世界，影响了世界各国的妇女运动。这种影响也很快的传到了中国的思想界与妇女界。

另一方面，因为当时资本主义已在中国抬头，纺织工业以及其他轻工业工厂，已在吸收大批妇女离开家庭，去参加生产，自谋生路，打破了几千年的成规。

因此，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起来的时候，民主思想，“博爱”、“平等”、“自由”的口号，给予被奴役了几千年的妇女特别深的启示，科学思想，“打破迷信”、“打倒礼教”的口号，对在礼教践踏下的妇女，也来得更亲切，妇女运动也就用着英勇的姿态出现了。

在五四运动中，知识妇女以勇往直前的精神，高举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汉奸的旗帜。当时在北京以及全国各地，无论哪一个示威运动中，女学生从不后人。在军阀的逮捕威迫之下，军警的鞭笞之下，她们和男青年一样地英勇斗争，不得不使军阀卖国贼胆寒，帝国主义者震惊。她们也和男学生一样的成群结队到民间去唤醒民众，使五四运动的种子，如燎原之火，蔓延全国。

在反对宗法社会的黑暗束缚上，妇女来得更关切、更勇敢。

她们要求和男子受同等的教育。要求“大学开女禁”的运动，从上海至北京、天津等地，广泛地展开了。妇女们一方面从事宣传，一方面向各大学一再呈文请求。私立岭南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北京大学等校，在 1918 年至 1919 年间，先后招收女生，实行男女同校。1920 年秋，各大学及专门学校都已开放女禁，北京女子师范学校也升为女子高等师范。女子求学的机会，从此大为增加。运动所及，女子入学人数的增加，也有“一日千里”之势。

而且，当时的思想界、教育界认为男女才智既无差异，教育即不应因男女而别。因此，女校重美术、轻科学的风习为之大变，家政科也降低了它的地位，慢慢由必修科变成选科了。

她们更要求“社交公开”与“婚姻自决”。因为“礼法”是几千年来桎梏妇女的枷锁，奴役妇女的教条，妇女要求解救自己，必须打破这种枷锁。当时到处上演《娜拉》，高叫着“不做玩物”、“要人格”、“要自由”的呼声。她们从事宣传鼓动，许多先进的妇女以行动勇敢地冲破了旧有的藩篱。风气所及，使那些“士大夫”、“道德家”也只能向隅叹息。1920 年的杂志上这样报导着女校的情形：自五四运动以来，男女同学交际的机会很多，外面同学来会人的，校内办事人也不能阻止。所以以前那种奴隶式的校规，到了后来也就无形取消了。由毛坑里逃走，摆脱买卖式的旧婚姻，反抗封建家庭的故事也发生了。

由此，更提出了“改造家庭”的任务。因为封建的旧家庭，的确是妇女解放的障碍之一，尤其在婚姻与社交上，对妇女的压力来得更大。当时北京、上海等地，有了家庭研究社的组织，企图以合理的方法，讨论关于家庭的各项问题，以谋具体改造。

在这许多实际的斗争中，妇女更步上了组织的道路，跟着学联的产生而产生了妇女联合会。向来是各不相干的妇女们，此时已有集体的组织，为着共同的利益而奋斗。

在这次运动中，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空前的获得了新的革命的生力军——妇女参加。这无可否认的是五四运动中的收获之一，也是中国妇女最大的光荣。

这光荣传统，给予以后妇女运动的影响，也是相当伟大的。

1921 年的妇女参政运动，妇女组织参政同盟会，要求与男子享有同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广东的妇女曾为此举行示威运动。北京妇女为争取在宪法上加上男女平等的条文而进行了斗争，各地响应，声势颇为浩大。虽然当时除湖南已获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四川仅获选举权而外，以全国范围来说，尚没有多大收获，但在这种斗争中，一方面已种下妇女参政的理论的种子，另一方面也教育了广大群众，尤其是妇女本身。以至有后来 1924 年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中“于法律上、教育上、社会上确认男女平等的原则”的规定，以及在北伐中妇女参加战斗的普遍与积极，这都是“五四”中妇女运动的承继与前进。

（原载《群众》1942 年 5 月第 7 卷第 8 期，第 179 ~ 184 页）

近代史資料专刊

鸦片战争时期思想史资料选辑
太平天国资料
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
太平军北伐资料选编
山东义和团案卷（上、下）
义和团史料（上、下）
筹笔偶存
庚子纪事
杨儒庚辛存稿
辛亥革命先著记
鄂州血史
云南杂志选辑
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
辛亥革命资料类编
华侨与辛亥革命
徐树铮电稿
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
秘笈录存
五四爱国运动（上、下）
五四运动回忆录
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选编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辑

近代史資料专刊（22种25册）由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结集出版。